

都市问题研究论丛

主编：杨生平 副主编：强乃社

刘怀玉 张笑夷 郑劲超 译

La Révolution urbaine

Henri Lefebvre

「法」亨利·列斐伏尔
——著

都市革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都市问题研究论丛

主编：杨生平 副主编：强乃社

都市革命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

刘怀玉 张笑夷 郑劲超 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革命 /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656-3714-8

I. ①都… II. ①亨… ②刘… ③张… ④郑… III. ①城市管理—研究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5388 号

La Révolution urbaine

by Henri Lefebvre

©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17-8651

DUSHI GEMING

都市革命

[法]亨利·列斐伏尔 著 刘怀玉 张笑夷 郑劲超 译

项目统筹 罗菁

责任编辑 孙琳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编 100048

电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址 <http://cnpupn.cnu.edu.cn>

印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910mm×640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175千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总 序

近年来中国在城镇化方面进展很快，城镇居民迅速增加，城镇化比例不断攀升。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城市社会或者都市社会（urban society）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在整个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何理解都市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状况，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需要关注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探讨已经逐渐达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整体考虑甚至反思的程度，形成了从都市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即有些学者所谓的都市马克思主义（metromarxism, urban Marxism）。和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影响减弱的悲观论调不同，我们认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当代都市社会中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推进。

从时代背景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不同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随后出现了不同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的“复数”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定的角度分析，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更多的研究、传播和发展。这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一定的时代与一定的地域相联系和相结合的结果。各种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甚至政治事件中亮相，从欧洲到非洲，

从亚洲到拉美，都是如此。这些马克思主义，有些直面当代现实，反映现实问题，切中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肯綮，赢得了很多听众。都市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都市马克思主义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众多经典作家和学者努力的结果。从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来看，随着时代的变化，城市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在马克思那里，城市和乡村的二分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现象。这种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资本逻辑形成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只要资本的问题解决了，那么社会的各种重要问题和矛盾将获解决，包括城市和乡村关系也将进入良性状态。

第一位对城市进行洞察并系统探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是恩格斯。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早期现代城市的发展做出了深刻的剖析。资本主义固然在当时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问题也同时存在。社会严重分化、工人阶级处境悲惨、城市病凸显等，至今依然在一些地方存在。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城乡差别往往和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分化联系在一起。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成为特别的关注对象。

到了20世纪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不同于苏联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了，对于城乡关系的理解有了变化。如葛兰西等对城乡的理解和恩格斯不同，他认为这些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城乡差距拉大等问题，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有联系，和国际范围内资本的流动也有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和现代性有密切的联系，现代性在城市游荡。城市是资本主义，尤其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窗口。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的城市重建，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也暴露了很多意识形态的因素，比如很多城市的规划将穷人赶到偏远郊区。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现代社会的主要形态之一就是城市社会或者其发展的较高阶段都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异常迅猛。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阶段和水平，有了另外一种比较明确的表现，那就是人类社会有一个从农村社会、城乡二元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都市社会的发展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时代产生了剧烈变化，如生产力发生重大发展，世界格局也发生深刻改变。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这个时候，地理、城市和空间因素在社会发展和变化中越来越重要。现代性的发展方式也遭遇到挑战，这在城市当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各种社会疾病和城市疾病大量涌现。

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认识，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对此进行了探讨，如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等。这些探讨往往和空间、地理研究有关，研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尤其是都市社会的发展问题。对于城市社会和都市社会的重视是这些研究的共性之一。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问题逐渐在社会理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按照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的理解，大概在19世纪末期以前，社会理论还是兼顾时间和空间因素的重要性的，但是到了后来，社会理论普遍重视时间、历史的维度，而忽视了空间的维度。这个认识直到列斐伏尔才彻底地扭转过来。

列斐伏尔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从1968年到1974年他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空间的著作。从整体上看，他不满意法国共产党跟随苏联的传统思想，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阐释；他认为时代已经经过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到了都市社会。都市社会是一个彻底城市化、都市化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有些地方已经进入都市社会，有些地方正在进入都市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坚持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但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做出了修正。

列斐伏尔的著作充满了启发，在表述上瑰丽多彩，他的论说是一道道的美味。但是，有时候人们对其确切含义很难精准判断，其主旨并不好掌握。后来的很多研究者也在这种思想的丛林中跋涉，并获得异常丰富的启发和收获。从一定角度看，哈维从左边继承了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被他彻底贯彻到空间批判和城市批判中。卡斯特从右边对列斐伏尔的理论进行了发展，他试图发展城市问题中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但是，他认为独立的空间和城市是不足的，比如城市问题取决于城市结构中的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城市社会运动和传统的运动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卡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不能应对当代问题。卡斯特认为，马克思的视角并不能解决当代城市问题，也不能解决当代社会问题。他反对列斐伏尔对空间近似拜物教的重视。他是第一位写出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城市问题研究著作的人，他晚近的研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说有些令人遗憾。那么，谁对列斐伏尔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继承？从大的线索看，可能是苏贾。

如何判断苏贾的学术线路？他经常将一种批判性的空间视

野作为自己著作的关键线索。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他坚持一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视野来进行城市和区域研究。他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所谓的空间重述，对大都市进行了后现代话语的分析，对空间进行了第三者视角的处理。他以洛杉矶为基础，试图形成后现代的洛杉矶城市与区域研究学派，从这个城市案例中形成一个对其他城市有意义的普遍的启发。

苏贾似乎更多地继承了列斐伏尔的思想。从整体上看，列斐伏尔的思想和坚持现代性的线路是不同的，他的日常生活批判，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揭露；他的空间研究，和现代性思想重视时间性的路线是不同的。在列斐伏尔那里，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后现代的感觉。他有解构，但是他也似乎努力做出建构，比如他在《都市革命》中对都市社会的展望。苏贾重视后现代主义对于城市理解的意义和价值。他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特别在《寻求空间正义》(2010)中，对洛杉矶发生的工薪阶层要求公共交通巴士系统增加投资而诉讼进行了深入探讨，将城市工薪阶层的空间斗争，从政治和空间的互动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总的来看，他对城市问题的理解是后现代视角的。甚至我们可以理解，在一个现代性的问题逐渐被揭露的时代，我们要解决现代性问题，除了重视后现代性，还能够有什么选择呢？

但是，后现代性的理解有多重取向。在列斐伏尔的一些著作中，现代性特征的城市和空间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可能需要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城市 and 空间的存在并发挥作用。在哈维那里，后现代性更多表现为资本主义问题在当代的显示。苏贾则认为，后现代性视角比现代性视角更加让我们容易理解当代社会特别是都市社会。苏贾提出的后现代城市研究中的不同话语，是对

现代性的固化、整体、标准化的社会生产的批判，是对明确的主客二分和对立的批评，是对工业时代确定的城市意象的变革。于是，后凯恩斯主义、后福特主义登场了，流动性、变化显著的城市发展和生产已经出现，真实的城市和虚拟的、信息化的城市已经很难截然区分，城市化中的单一中心的取向已经转向多中心、区域城市化的重构。但是，都市社会究竟走向何处？很多后现代主义者没有给我们提供纲要或者说明。批判性的、解构性的标签可能和这种思潮的内在要求有很大关联。但是，我们需要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性，需要一种建构性的后现代性。这种后现代主义至今依然幽暗不明。但有学者明确提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就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哈维不能给我们指出一条建构性的路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坚持都市革命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对寻求都市空间正义和争取城市权而言，我们目前能够寻求到的是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苏贾在自己的著作中，强调了寻求空间正义的重要性。而后现代主义者马歇尔·伯曼在关于纽约时代广场景观的著作的结尾，提醒我们要重视城市权的重要性，尤其是参与城市景观建构的权利的重要性。我们也意识到，即使是哈维也重视空间正义和城市权，虽然用正义和权利来解决资本的逻辑导致的问题固然重要，但在马克思那里并非如此。马克思对资本普照下的权利、正义，更多地采取了讽刺和批判的态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试图借助法律和权利摆脱困境，是找错了门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左派”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左派右转”。

但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确实直面当代很多问题。其中以当代都市社会为基础，围绕城市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当代阶级问题、社会主义与城市、空间辩证法等主要问题形成整体思想。当然有关研究远不止这些内容，比如性别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空间与存在、历史等问题，也逐渐进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步得到深化。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城市问题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表明城市其实已经成为革命的重大问题，而同时中国乡村建设派的失败原因主要是对城市和现代文明的忽视。有些国外研究者认为，在中国革命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所谓的反城市倾向，这是不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盘踞在城市中的反动统治阶级，但并不反对城市。进入21世纪，中国城镇化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展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进而言之，城市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其实，仔细考察，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发展上来了。都市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和都市自身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在当代政治中，都市政治、街头政治已经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方面和形式。在经济活动中，城市聚集形成的效应已经影响到经济整体。文化的形成、发展等基本以城市为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挑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有关都市社会

的研究，已经成为重要课题。

我们重视世界范围内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发展，重视都市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当下和未来社会的理解和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更重视当代中国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工作。“都市问题研究论丛”著作的选择，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进行的。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时代不断发展，空间频频变换。如今，信息化程度加速发展，赛博空间形成，深刻改变了当代的社会空间包括城市与农村的空间及其关系，同时也给我们的生存带来了新的希望和问题：在不平衡发展、空间关系方面，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不断增加；在观念、制度与行动方面，是从城市出发回到农村，还是离开乡土回归都市，这对很多人来说，做出取舍并不容易。众所周知，在日益全球化的过程中，回归地方已经成了一个并不容易的问题，甚至地方认同和乡愁等都难以落地，更不用说在很多国家的城市文化建设中，殖民活动的影响尚且若隐若现；都市社会中的人们在社会快速变化中、在空间多点位移动中能够找到自己并非易事；日益普遍化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走向智慧、绿色与生态之途，但城市顽疾也随之如影随形；对于城市发展形式而言，蔓延、紧缩并存，城市化和逆城市化互动。城市、农村、区域、空间、资本、市场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瑰丽画卷。

令人欣慰的是，在对城市、社会和空间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判性研究中，近年来有很多问题已经受到了重视，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所要做的，是要打开、创造一个空间，在那里，能够去体味真正的时代精神，领略那给时代涂抹上底色的空间精神；在那里，我们能够回归自身、回归社会，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社会主义如何让人栖居于现代都市？

——列斐伏尔《都市革命》中译本代译序

刘怀玉

一、都市空间问题域的发现与都市马克思主义^①的三位代表人物

尼尔·罗伯特·史密斯(Neil Robert Smith, 1954—2012), 这位过早故去的美国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是大卫·哈维最杰出的弟子, 也是哈维由英国去美国任教的关键引路人。他在2003年为都市马克思主义开山之作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一书英文版作了一个质量很高的译序。他这样写道: “列斐伏尔的这部会

^① 关于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名称与来历可参看 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引起争议的经典文本的英译本来得太迟了。”^①它印证了一部经典作品持久的生命力。《都市革命》初版于1970年^②，其时正值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刚刚结束。当时席卷全球的都市革命一浪高过一浪，从巴黎到底特律到东京、布拉格，再到墨西哥城。这是一场没有什么组织与目标、却有共鸣的多种多样的革命。这场革命于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了高潮，中心当然是巴黎。列斐伏尔就是这场风暴中心的参与者与见证人，而《都市革命》是他的思想本身的产物，是非常冷静的、超出时代与专业的一本预言都市社会到来的哲学著作。列斐伏尔在写此书之前有过一段漫长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经历，也有一段专门集中研究法国城市化设计的学术经历。该书与其著作《空间的生产》(1974)、《论城市权》(1968)等书一起构成了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化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系列与整体。

在列斐伏尔写此书的那个时代，占据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领航地位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功能主义与描述研究方法，而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关注仍然处于一种僵化的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之中。通过把焦点集中到“都市革命”这个概念之上，他推翻了这个研究现状。透过都市革命这个术语，列斐伏尔试图研究比街头革命事件要深层得多的社会问题。街头革命只是这个重大历史变化阶段的一种局部的表面的征兆而已。“都市革命”这里指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变迁与转移过程，这就是从农耕文明到工

① Neil Smith, “Foreword”, in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p. vii—xxiii.

②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业社会再到都市世界的巨型转变过程。按照列斐伏尔的论述，城市已经从原有的意义上走向了全新的时代。这是对正在到来的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预告：资本主义工业化问题框架作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资本主义主导力量，已经不断地被都市化所替代了。都市总问题式正在占据优势地位。1968年的政治危机是更深刻的都市社会危机，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危机。

尼尔·史密斯有云，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列斐伏尔此书的重要意义方面之一就在于，他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包括北美世界的一个新的、广泛的社会理论研究领域。^①借用一下阿尔都塞的语言来说，列斐伏尔发现了一个“知识新大陆”，而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则是发现了一个长期被遮蔽的领域或者说“盲域”(le champ aveuglé)。他像福柯那样在讨论一个异托邦。当然，福柯的“异位”或“异托邦”概念只是歪打误撞地把人们引向一个时间与空间的世界，诸如墓地、购物中心、地毯、走廊等，而列斐伏尔则用一种更具批判性的语言来识别与想象异托邦，并将其置于更为广阔而深刻的政治化与历史性意义背景之中。列斐伏尔从整体—混合—私人三个层面来思考城市空间问题，并通过研究布尔迪厄和海德格尔思想，把私人空间定义为一个栖居的空间，认为栖居要比定居或居住早得多或者优先得多。栖居并不是抽象的空间或地方。

《都市革命》一书大多数内容是列斐伏尔长期研究的产物，并在后来的著名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但

^①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p. xi—xii.

这本书强烈而直接的政治现实性经验想象与激情，与后面充满学理气的城市空间研究明显不同。

空间问题在 20 世纪相当一段时间只是先锋的艺术、科学如物理或数学的研究领域，哲学与社会理论长期对此退避三舍、充耳不闻的。正如福柯所说：空间长期被视为僵化、静止、安静的国度，空间本身也变成了一个盲区。^①

空间化转向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思想文化最基本的发展趋势之一。曾几何时，空间被当作死寂、固定、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而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福柯语）。但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空间开始取代时间成为诸多学科的重心。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甚至 19 世纪末，一些经典大师已经在空间问题并不时尚的年代就深入探讨过空间问题。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就对此在的上手状态的周围世界的空间性进行过存在论分析，而在其晚期著作中，他则围绕着存在的历史与真理问题，对所谓“本有”的敞开与遮蔽、世界与大地的争执、技术集置与天地人神的“四合”、筑居与栖居的关系进行过讨论。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代化关键时刻的意大利南部与北部关系进行了探讨，巴什拉尔在《空间诗学》中对抒情诗的空间现象学想象，巴赫金对一系列小说的时空交错、文学中时间与空间关系内在联系的详细探讨，也属于空间理论的经典之列。而本雅明则得益于西美尔对柏林街头空间的陌生化体验，以惊人的梦游式的想象力

^① [法]米歇尔·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地理学》，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06 页。

捕捉到了19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文化移动现象。

所有空间化转向思潮都向启蒙运动以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笛卡尔式与康德式空间概念发起了挑战。后者这种类似于牛顿力学的绝对空间概念把空间当作一个不同于主体即精神实体的客观的同质延伸(物质实体),或者把空间当作人类活动在其中展开的一个空洞的容器。与此类假设相反,那些形形色色的空间化转向的思想家们则以令人惊讶的多种方式证明,空间本身既非“自在之物”,也非一种主观精神,而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活动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与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西方的现代性因而被重新设想成为既是一种历史规划,又是一种地理与空间的规划,是对我们栖居于其中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持续的分解与重组过程。^①

而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掌握着解放的承诺与希望,是从极权专制中解放出来,即从时间专制以及部分地从任何其他部门中解放出来的所在。但反过来说,空间也是社会压迫与剥削之所在。只有当我们停止在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视野中思考空间与全球化问题,列斐伏尔的真知灼见才能被我们发现与理解。当《都市革命》一书最初写作之时,世界当然是等待着变革,但远没有开放到看见从空间角度空间方式理解政治的地步。从空间角度去政治性地思考这个被专业技术思想方式所深深包裹

^① [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载[法]热拉尔·热奈特等著,阎嘉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Literary Theory: An Essential Reader*),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47页。

着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与列斐伏尔所开辟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把都市想象为一个浓缩的全球或世界，同时把世界想象为一个都市，列斐伏尔当属其第一人。^①

当然，《都市革命》这本书刚刚开始的研究还很粗糙，且没有在人类实践与历史活动结果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空间，而只是从语言学等学科角度把城市空间简单地分为整体性、混合性与私人性，大体上与其所谓的国家、都市与栖居相对应。后来的《空间生产》一书则从更具体深刻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空间辩证法。这就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三位一体，还有超越抽象空间统治的差异性空间，以此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方式与途径。

但此书问世之际，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接受与理解，究其原因还是列斐伏尔后面提出的空间概念与思维方法还不为人知。换言之，这本书一经问世便遭遇到一个被广泛批判、“误解性接受”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其知名度在当初居然要比今天译成英文之时大得多，但这是一种被严重误解的命运。这本书遭批判之后被冷落，主要是因为它过早提出了两个概念——“都市化”与“全球化”，并欲以此取代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第一个批判这本书的是与他同时居住在巴黎的西班牙移民曼纽·卡斯特。当然，卡斯特的《城市问题》^②(1972)一书是对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一书的发展。该书首先承认，列斐

^①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Routledge, 1999, P. 141.

^② Manuel Castells, *La Question urbaine*, Maspero, 1972.

伏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卡斯特从三个方面批判了《都市革命》中的“全球化了”的“都市革命”概念。^①第一，他认为此书过于浪漫主义，是一种哲学乌托邦主义，而没有看到都市革命并非像列斐伏尔所想象的那样，是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压迫状态引向更加社会化的日常生活革命化的状态，而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运行方式。第二，卡斯特向列斐伏尔提出的一个特殊的假设发起了挑战，这就是都市代表着任何一种严密的科学对象以便于研究。而对卡斯特而言，都市至多不过是一个意识形态构成物，它要求的是揭露剥离而不是什么提升。第三，最为强烈的批判之辞是，卡斯特反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列斐伏尔所宣扬的都市革命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政治与经济学分析范式，但同时列斐伏尔无保留地恢复了马克思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党派性路线。卡斯特抱怨列斐伏尔把本来是对都市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化分析”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都市化分析”。这个批判最为著名。^②

这本书的第二个著名批判者来自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大卫·哈维 1973 年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③一书，作为英语世界第一部马克思主义都市研究著作，可以与列斐伏尔这本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平分秋色的。当哈维作为一个业已出名的地理学家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去研究都市社会问题时，他发现除了

① Neil Smith, "Foreword", in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p. xv—xvi.

②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s: A Marxist Approach*, Alan Sheridan trans, MIT Press, 1979, p. 87.

③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Edward Arnold, 1973.

列斐伏尔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有影响的人物关注都市问题，所以他给出的评价是，列斐伏尔的著作毫无疑问是已有的理解今日都市问题最深刻的思想尝试，但遗憾的是哈维自己在写作关于城市正义问题时却没有来得及参看列斐伏尔的著作。他的议题与自己的有相似并列之处，并且比自己的更加全面综合，但也并非没有问题。^① 尽管哈维高度重视与肯定列斐伏尔这本书的重要性，但也还是认为列斐伏尔的做法过于简单而不现实，这就是想用都市革命理论范式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批判方式研究都市问题。哈维认为工业化资本主义与都市化之间的矛盾决不可能通过都市理论就可以解决。就在卡斯特用一种结构主义批判方式来构造一幅马克思主义理论蓝图的地方，哈维则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来批判列斐伏尔。哈维当然同意列斐伏尔对传统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但认为都市化发展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进行，是其一种新的变种与表现，特别是都市化是资本主义积累与流通的产物。都市化在此是资本流通的一种赘生物性存在。都市化在全球的蔓延传播是真实的，但工业资本主义的流通仍然预先决定着地产资本的流通对都市化的驱动投资。

列斐伏尔这本书后来的影响确实没有卡斯特与哈维的这两本书成功与巨大，但并不是说这本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反而证明其具有更深层的与更具有预言性的意义。^② 第一，今天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Edward Arnold, 1973, pp. 302—303.

② Neil Smith, "Foreword", in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 xviii.

的世界确实已经进入到都市化全球化时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解释方法模式与资本积累新变化理论，并不比列斐伏尔的都市化理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第二，人类的未来是什么，乐观地估计一下，我们便会从这本书里得到很多的启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切，需要从新的角度理解今天人类的现实。这正是列斐伏尔从空间生产理论角度解释今天资本主义幸存现实的价值所在。

二、《都市革命》一书的基本结构、思路与观点：未来社会、总问题式与战略

列斐伏尔在其漫长的一生(1901—1991)中写出了数量众多且主题多变的著作，有其鲜明的周期性。按照著名的传记作家雷米·埃斯(Remi Hess)的说法^①，就是在1967—1974年这七年间，列斐伏尔集中研究了空间与都市问题。此前与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个主题上。《都市革命》无疑是其中的一部著作。在列斐伏尔于巴黎十大(楠特尔大学)工作这七年间，他先后写过六部相关的著作：这一系列以《论城市权》(1968)一书开始，之后是《从乡村到都市》(1970)、《都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空间与政治》(即《论城市权》的第二卷)(1973)，最后集大成者是《空间的生产》(1974)这样一部翔实而

^① 参见埃斯为第四版法文版的著作《空间的生产》所写序言《列斐伏尔和空间思想》，载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Anthropos, 2000, pp. viii—ix.

综合性的大部头不朽之作。

对于列斐伏尔而言,《都市革命》并不是字面上或者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街头游行暴动意义上的那种直观现象的革命,而是意味着人类新的历史阶段与生活方式想象的革命。该书共计十章。第一章是带有引论性质的《从城市到都市社会》。列斐伏尔严格区分了工业社会以及以往社会的城市与他心目中的未来新社会的都市。此书一上来就提出这样一个假设:都市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永恒的现象,而是非连续性的历史阶段或者关键阶段意义上的现象,一个潜在的未来的社会现实,一种设计、一种探索,乃至一种思想的构成。这种思想的运动接近于某种“具体”乃至接近于那个“具体现实”。都市社会作为可能的未来现实,要与工程师、设计师主观意义上的设计区别开来^①。

列斐伏尔通过一个从百分之零到百分之百这样演变的时间轴线来设想都市形成的过程。这条轴线表示我们所指涉的对象,都市(都市现实),它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谓其是“空间的”,是因为这一进程在空间中展开,它改造了空间;说其是“时间的”,是因为它在时间中发展,它一开始只是次要的方面,但在后来成了实践和历史的主导。“这样一部历史经历了从古代的政治城市到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商业城市,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城市,再到未来意义上的批判性空间。在近代之前,城市作为自然与农业世界的从属与边缘而存在,但自从资本主义社会以来,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原来是工业作为农业的一个部门,现在情况颠倒为农业成为工业的一个部门,土地完全从属于城

^①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 12.

市。除了对都市做了一个阶段性的假设定义以及历史阶段性的界定之外，列斐伏尔还提出了本书的研究核心问题，这就是都市总问题式(*problématique urbaine*)。^①都市不仅是工业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且也变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如何表达思考都市现象并将其归类，正是全书的研究课题，也就是其所谓的都市总问题式。

第二章是《盲域》，这样一个怪怪的名词表明列斐伏尔心目中的都市问题仍然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模糊不清的领域。未来的潜在的都市作为总问题式，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的盲域，就像在弗洛伊德之前“性”是一个黑暗的、禁忌的盲域一样。列斐伏尔认为，历史发展不是连续直线的，不能用类似于马克思的“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那样的类比来理解当代都市与过去的城市，不能用以往的城市的历史经验来想当然地看待当代都市。“我们的视而不见是怎么回事？我们聚精会神于新领域，即都市，我们用眼睛观察，以概念来理解，然而我们的眼睛和使用的概念已经被实践和工业化理论定型了，我们用在工业化时期就事先设计好的碎片化的分析工具，因此正在发生的现实被消解了。我们再也看不清现实；我们对抗它、厌恶它，与之斗争，阻止它的诞生和发展。”^②

都市现实，甚至在它开始和确立之前，就被农村(花园郊区，即所谓的开放空间)和工业(居所、社区、各种关系的功能性结构，单调乏味但却是必需的路线)的平日，即一种受制于企

①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 25.

②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 43.

业需要并按企业理性来对待的日常性所同化。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对都市“视而不见”“见而不解”，是因为我们还在用传统的政治城市与商业城市，乃至用工业城市的理念来把握它，结果导致了各种孤立的、混乱的看法。而实际上，“都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充满着张力的领域，一个潜在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吸引了那种已经完成的、某种曾经更新的且一直苛求的在场—不在场”^①。从历史角度与共时性角度来看，存在着三个领域、时期与层次，即农业、工业与都市。这类似于科学中的数学、物理与历史社会科学之相应的发现。它们之间并不具有连续性而是充满着裂缝与盲区。其中的农业是自然的、一个异质的循环着的世界，而工业是同质化的、设计的、管理的世界，而都市则是充满着差异的，包括异位的空间与具体的矛盾，具有不期而遇的同时性、聚合性这样的都市形式特征。这种时空是一种不同于农业时空（周而复始和并置的地域特殊性）和工业时空（趋向于同质性，趋向于合理的和被规划的强制统一性）的布局。一旦我们不用工业理性——它的同质性规划——去规定它，都市时空就表现为差异，每一处和每一时刻只在一个总体中存在，通过对比和对立使之与别处和其他时刻相连并与之相区别。

第三章《都市现象》作为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章，以现实的而不再是假设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都市现象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以及对所有专业化研究的挑战。列斐伏尔从一个基本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认为都市既是资本主义消费或第三部类得以展开的平台，更是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崭新舞台。都市的复杂性并

^①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 58.

不是可供专业研究的那种对象性复杂，而是必须通过辩证的总体想象才可以理解的那种不确定的不可归类与原始的混沌性。都市现象的现实性，与其说是一个可以通过深思来考察的对象，毋宁说应该是一个潜在的对象。都市现象是普遍的整体性、过程性存在，就是马克思当年所想象的那种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与形式，是任何实证科学都无能为力的现象。必须要用他心目中的那种与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元哲学”来解决。相形之下，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革命及其结构主义方法有助于我们去想象与解释都市这样的跨学科性质总体性的、既在场又不在场的矛盾的、辩证的现象特征。但总体而言，列斐伏尔认为虽然各门专业或碎片化的知识无法面对都市现象，但他提出了几个基本的研究都市现象的方法论假设，这就是趋同性、整合性、语用学、操作主义、等级化以及实验主义等。但最终结论是，专业科学解决不了都市现象问题，都市现象问题需要一种都市战略来解决。

第四章是《层次与维度》。列斐伏尔接着前面的都市总问题式以及都市现象，指出分析都市现象需要相应的范畴概念，这就是层次与维度这两个理论工具箱。从历史角度来看，社会可分为乡村、工业与都市三个阶段。而从共时性来看，都市社会则有三个层次，即整体性、混合性与私人性。其中整体性是国家制度层面的，混合性则是都市自身层面的，而私人性是建筑层面的。列斐伏尔最为关心的是私人的层次，即作为栖居的层次。正像利奥塔所做的“屋舍与大都市”二分法^①或海德格尔所说的栖居与筑居二分法，列斐伏尔认为微小并不等于简单，大型不能等同于复杂。抓

^①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罗国祥译：《非人——时间漫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7—221页。

住事物根本的革命并不是都市的规划而是肯定栖居的持久重要性。这让人想到了当年列斐伏尔所长期从事的单幢楼设计研究，以及与新巴比伦都市规划流派的密切关系。从历史角度来看，都市社会之前的工业社会是农业从属于工业，而第二个关键时期则是工业从属于都市，栖居占据主导。但目前仍然是国家占据主导的宏观结构层面。列斐伏尔所领导下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所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仅有的两个主要的城市研究机构之一。它承担了官方(国家设备部)所委托的研究课题，如居住区问题。列斐伏尔参考了巴什拉尔的《空间的诗学》(1957)。巴氏认为曾经为我们提供整体思想、记忆与梦想的房屋居住地消失了。海德格尔也反对仅仅从技术与经济学角度来建筑居所。居住地或生活方式乃是一个人的特质所在。居住就像穿衣打扮、娱乐、饮食，形成一个次生的开放的体系。独家小楼(pavillon)是列斐伏尔所渴望的一种空间的乌托邦。讲完了三个层次之后，列斐伏尔又讲了都市现象的“维度”，这就是从拓扑学角度来说，即私与公、高与底、开放与封闭、对称与不对称。

第五章是《都市神话与意识形态》。长期以来，西方有一个关于自身文明起源于城市这样一个神话，也有一个关于城市起源于自然的神话。既有都市的神话，也有神话的都市性。亚特兰蒂斯(Atlántida)是西方文明起源于都市、起源于城邦的一个象征。近代都市的自然神话被都市对自然破坏所取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法国巴黎奥斯曼建城规划。除此之外，还有自治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中国“文革”时期“消灭三大差别”的“去城市化”的城乡一体化神话。

第六章是《都市形式》。都市现象的本质在于其功能结构，特

别是形式。都市具有二重性功能，既有边界与管理网络之意，也有城市本身网络之意。结构具有二重性，这就是形态学意义上的与社会学意义上的。都市现象的形式具有集中性，借某种中心化，一切发生于城市的过程。城市始终是一道自己之为自己的风景线。“一切发生于都市现实之中的事物，好像可以比作是一切事物构成现实自身似的，且一直不断地就是这样似的。”“这是一个邂逅的地方，聚会的地方，共时性的地方，一个吸引与生活的中心”^①，是具体的抽象物（黑格尔语），交换价值形式（马克思语）。组合、汇聚、集会 is 社会实践的实质性要求。城市形式具有同位点、异位点与乌托邦。可用列斐伏尔在 1985 年《什么是思想》一书的一段话来叙述：

对城市的思考就是坚持与强调它的相互冲突的各个方面：其强制性与可能性，其和平性与暴力性，其聚集性与孤独性，其单调乏味与诗情画意，其致命的功能主义与令人吃惊的即兴创造性。城市的辩证法不能局限于中心—边界的对立，虽然它包括与暗含着这一点……对城市的思考要走向对世界的思考（虽然只是与世界的一种联系）……全球性作为总体性……宇宙、时空、能量、信息，但彼此间并不互相攀比、说长论短、厚此薄彼……我们可以希望它变得越来越好，但城市却成了残暴的中心、支配的中心、依附与剥削的中心……想想这些景象，让我们离开这是非之地、玩弄花招与计谋之地。所有的手段都还没有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假设历史

^①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p. 157—159.

的意义具有任何宿命或命中注定性。^①

第七章是《当议都市战略》。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局限性并提出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方案。列斐伏尔认为，今天我们要用辩证法批判都市形式及相应的专业化的技术思维，都市革命与具体的民主相一致，即以民众日常生活的都市实践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都市科技设计。在认识论上放弃理论帝国主义，在总问题式上用都市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目前不仅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也仍然是工业主义思维方式。都市现象的认识论要变成一门科学，唯有用都市实践及其理性化取代工业实践。颠覆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战略学。都市规划是一种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日常生活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都市规划包含一项重要内容，即最优与最大限度地使用技术来解决都市问题，从而改变都市社会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变革是可能的，包括技术与美学上的考虑。与都市规划不同，列斐伏尔所说的战略学要从适用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古典理性主义，走向与日常融为一体的元哲学。这种都市革命作为一种总体性战略，并不是居高临下的规划，而是遍及任何地方与时刻的微观实践活动。社会主义有三种可能性选择方案：第一种是用工业化管理取代城市化管理的体制化模式，即因袭传统工业化意识形态而都市总问题式被扼杀；第二种是都市革命的生活冲动将冲击传统计划管理体制模式的束缚，重建市民社会，即马克思所预言的“国家消亡”；第三种是建立合法机制突出都市的总问题式，用合法化

^① 转引自 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select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p. 53.

手段相应地提出各种解决之道。真正意义上的都市革命何在？政治战略是突出都市总问题，扩大城市自治形式与城市权力体系。^①

第八章是《都市幻象》。都市规划(urbanisme)有三种，第一种是古典的乌托邦式的人道主义，第二种是开发商设计与推销的，第三种是国家与技术官僚支配下的机器运转过程。列斐伏尔从左边对都市规划展开批判，而不是从右的角度即完善都市规划角度展开批评。自由主义的右倾批判是站在支持都市技术与产业开发创新角度，而作为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列斐伏尔则强调都市规划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一种消费社会。让我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都市幻象与阶级的哲学以及国家的幻象密不可分。欲摆脱都市幻象就必须明白空间的生产已经成为今天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现实力量。在其人道主义与技术决定论的善良愿望外表之下，都市规划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策略，即控制空间，为扼制利润率下降而斗争。这项战略压倒了住户参与者和单纯的居住者。都市意识形态夸大了规划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居住者的权利与要求。都市规划是资本主义社会房地产的扩张，即资本再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工业利润率严重下滑，房地产投机成为资本形成的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由此启发后来的哈维研究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哈维于1973年所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可看作是参考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一书这个观点而写成的。他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分析城市。

第九章是《都市社会》。以上研究均是从假设或认识论角度把都市社会作为一种如何可能的对象与过程来研究，现在列斐伏尔

^①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p. 196, 150.

把目光投向了现实，也就是说走向现实的地平线，以反对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错误。由此，某种批判性领域或者关键阶段进入我们的眼帘。都市是一种把各个方面与领域连接在一起的传导器，是不可能的可能性的研究领域。都市社会其中的全球性的广泛社会生活领域，使得社会越来越复杂，充斥着交换价值与各种次生体系。都市以其虚拟性或潜在性席卷全球，突破原有的各种固有的边界而使世界再区域化，出现了所谓的“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对立，出现了新的资本殖民化。总之，都市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体现着冲突，它颠倒了存在于那些没有表达、无声的隔离着的标志已经设立的场所之间的隔离状态，也是一个欲望之所。”^①第一，我们必须打破那些城市隔离状态，终止分离，包括信息的、人的与物的分离。第二，克服那些加剧不透明与对立的障碍。第三，实现区域统一性中的生产与企业的自治。都市规划归根结底不仅仅是国家行动的政治工具、利益工具，它创造的空间不仅仅是政治的技术的逻辑，而且是创造性的政治性的空间。^②

第十章是《结论》。本书已经从各个方面描述研究分析了都市总问题式。从历史地、阶段地看待都市形成，到跨学科地把握都市现象的秘密，再到理解分析都市现象的概念形式，一直到寻求对都市幻象之秘批判的现实道路以及对都市的生产与消费统治的批判之新实践变革。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都市革命的主力军即住户或用户为何没有上街进行革命，而是“一片沉默”^③？这是令所有左派苦恼与困惑的问题，也是都市革命的最

①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 232.

②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p. 235—238.

③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 239.

大问题。列斐伏尔的回答是，之所以一片沉默消极状态，首先是因为缺少相互沟通，也就是说没有了使用价值的抽象空间的统治，一种失明状态。消极原因就是人们漠不关心空间的使用价值而只关心消费。这种状态有其历史原因——虽然现实历史已经从乡村转向都市，但观念却仍然具有狭隘的地方性、民族性等。其次，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解决与导致社会主义空间。再次，与城市的碎片化有关，总体化无法立足。最后，是社会的原因即缺少参与。

三、列斐伏尔：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空想家与左派海德格尔主义者？

写到这里，我想进一步深化关于都市马克思主义“三圣”的区别与联系的理解。我不妨先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里形容重农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的话来说，科学史上的一个常见现象就是科学理论的复杂与发达部分往往要比其最基础部分产生得更早一些，比如重农学派或重商学派早在古典经济学发现资本主义一般剩余价值形式产生过程这个基础问题解决之前，已经在具体的细节上解决了剩余价值特殊形式来源与产生问题。打个比方来说，在真正的建筑屋地基打好之前，工程师们已经在头脑里把房子的上层盖好了。^①

实际上，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也是如此，列斐伏尔就好像重商主义者在古典经济学发现一般价值形式之前研究了更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第451页。

复杂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实现过程。在后来哈维与卡斯特们真正把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学核心逻辑具体化与改造成为空间化与城市化范畴之前，他已经在探讨资本主义城市化社会到来之后的人类解放的新可能想象问题。列斐伏尔的优点是，最早重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都市问题与都市革命的这种政治斗争可能性，此外从都市社会中提炼出一种新的辩证认识形式，提出了城市革命所预示的新的未来激进政治可能性。缺点是缺少对城市实证研究，特别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逻辑理论的关键性意义。

列斐伏尔与哈维以及卡斯特之间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重视空间与城市问题，这是他们的共同点。问题在于把城市与空间问题置于何种位置或从何种角度加以把握。对于列斐伏尔而言，都市问题出现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理论假设有些过时，城市化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必须形成新的研究视野，这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新的“人体解剖”，而工业化生产过程理论已经成为“猿体解剖”或者“猴体解剖”了。此外，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再现更为本质存在的“结构”，而是根基性的辩证总体性存在方式。空间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定的次生的具体特征与景观，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基础上层建筑各个部分的基本存在基础。在今天，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不通过空间化即都市化想象与实践方式便无法存在。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空间之内通过生产力高度发展而自行产生出来，而是通过从资本主义之外的那种差异化空间本身之中想象与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历史来的。这无疑在哈维与卡斯特看来是过于匪夷所思或者“空想”“思辨”了。

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观念。一种是启蒙运动历史观，这就是

纲领性概念，是德国哈贝马斯与韦伯式的；另外一种法国的波德莱尔的瞬间性概念。列斐伏尔的现代性就是这第二种现代性。他的都市革命观就是从“左边走”的海德格尔的栖居思想。海德格尔是想在旷野寻找诗意的栖居，而列斐伏尔还有城市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反其道而行之，想在热闹的都市寻找诗意的栖居。这可能吗？

我们不妨通过海德格尔在《筑居、栖居与思》一文中的观点来说明何谓筑居与栖居以及与列斐伏尔本人所理解所强调的栖居的重要性：在古高地德语中，筑造 *buan* 即意味着栖居。后者表示持留与逗留。动词筑造也即栖居的真正意义对我们而言已经失落了。说到栖居，我们通常以为是一种行为，是人类在其他许多行为之外也在做的一种行为。我们无所事事，我们还从事职业活动，我们经商旅行等，在途中居住。一会儿在此处，一会儿在别处。筑造原始地意味着栖居。筑造在原始德语中即 *buan*, *bhu*, *beo*，也就是现代德语的动词 *bin*，即存在或是。由此来看，“我是、你是即意味着我居住、你居住”。所谓人存在就是作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意思就是居住。海德格尔最终引出结论，即筑造乃是真正的栖居。栖居是作为终有一死者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作为栖居的筑造展开为那种保养生长的筑造与建立建筑物的筑造。^①

而列斐伏尔则想通过把现代都市的空间尺度界定为公共的、中间混合的以及私人的三个层面，来寻找私人的这种栖居如何与都市的公共与中间混合层面的融合的可能性。在《都市革命》这本

^①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演讲与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4—156页。

书中，列斐伏尔显然是在其所理解的一部从潜在到现实的都市历史观中来看待栖居的重要性的，这就是“第一个关键时期（农业从属于工业化），第二个关键时期先是第一步（a）工业化从属于都市化，而第二步则是（b）整体性从属于都市的和都市从属于栖居的”。“都市首要的优先之事乃让人栖居。”一直被认为并不重要的层次，即栖居，已经变成本质性的了。^①

毫无疑问，列斐伏尔的栖居的空间政治的灵感与激情首先深深地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海德格尔（还有巴什拉尔）对现代城市建筑虚无主义意识形态的猛烈抨击和对存在论意义上的诗性栖居理想的无限渴望。^②但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海德格尔的因脱离了社会历史与政治而显得过于玄奥的空间概念。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只是强调了空间的非几何学的诗化、身体化实践本质，而没有考虑空间的实践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海德格尔只是像荷尔德林那样让我们到林间空地“诗意地栖居”，却闭目不看今天的都市是如何在“此时与此地”被建构起来的，或者说人们是如何被迫流动地、流浪式地、孤苦伶仃地“栖居”在全球化的空间之中的。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思想是一种“右倾的”“怀旧的”都市社会批判立场。^③正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无政府的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模型一样，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批判则将都市化—国家—全球化的“三位一体”作为理解批判想象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他一方面把空间视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重要统治对象，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穿透后现代社会“无历史意识”神

①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 135, 122.

②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 111.

③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p. 111—112.

秘状态的一种辩证的历史想象方式。列斐伏尔发现，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已经成为今天资本最重要的统治工具，特别是现代国家的暴力统治成了一种绝对的政治空间。他发现，福柯倒是进一步把空间与政治和知识技术结合起来，然而却没有更具体地考虑空间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而，列斐伏尔没有像福柯那样，面对无孔不入的微观权力控制而悲观地认定现代人已经“无可反抗”或“无家可归”，而是认为，空间既是压迫的重灾区也是反抗的空隙处。正是从权力与权力范围的关键空隙处列斐伏尔看到了一种“新政治”的出现。^①

四、社会主义的城市权

整整一个世纪前，罗莎·卢森堡为解答资本主义积累理论难题，曾经提出过一个以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夺性积累为核心逻辑的理论模型。^② 在该假设中，资本主义克服生产过剩危机、扩大积累与再生产规模，追求新的剩余价值的根本途径是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即对非资本主义的落后农业国家与东方国家进行资源市场与劳动力的剥削掠夺，由此形成核心国与边缘落后国的二元对立格局。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挽救资本主义于危机之中的资本空间转移与空间生产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不再仅仅是海外殖民化而是资本主义内部殖民化，即

^① 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94.

^② [德]罗莎·卢森堡著，彭尘舜、吴纪先译：《资本积累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通过消费社会与城市化这两种基本的内部殖民化方式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与发展。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城市化已经是吸收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手段。由于城市化的周期很长，以及建筑环境中的大多投资都有很长的使用寿命，所以城市化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城市化还具有地理上的特殊性，如空间生产与空间垄断是积累过程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仅仅是单独地凭借改变商品在空间上的流动而推动积累，而且还凭借着不断创造与生产出的空间场所来推动积累。住宅成为一棵方便的摇钱树、一台属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款机。通过城市改造吸收剩余价值具有的“更加阴暗的一面”是“建设性破坏”引发了反反复复的城市重建，而受害者总是弱势群体。他们被越来越远地隔绝于城市之外，主要是城市权被剥夺殆尽。正像哈维所说，城市化在吸收剩余资本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在不断地扩大其地理范围，其代价就是一个不断地建设性摧毁的过程，这便意味着是对城市大众任何一种城市权的剥夺。^①

与哈维和列斐伏尔的远见卓识遥相呼应，我们从恩格斯的《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听到了最为经典的批判抗议声音，我们从巴黎公社、从孟买、从首尔、从南美、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等中，听到了一种新的民主化管理城市、参与城市建设的社会主义声音。

恩格斯曾经在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之后这样批判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城市化运动来刺激经济、转换社会矛盾、吸收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运动，这就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举世瞩目

^① [美]大卫·哈维著，叶齐茂、倪晓晖译：《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23页。

的巴黎城市改造计划：“实际上资产阶级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问题解决了，但又层出不穷。这就叫作‘奥斯曼计划’。”^①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奥斯曼计划”，并不单单是指“巴黎的奥斯曼所采取的那套特殊的波拿巴主义办法，即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这样做，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一个依赖于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②。恩格斯所说的“奥斯曼计划”，是指“把工人区，特别是把第二帝国大城市中心的工人区从中豁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这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大同小异：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③。

整整 100 年之后的 1972 年，列斐伏尔重复与更新了恩格斯以上的对奥斯曼计划的阶级本质的精辟论述。正像前面提到的列斐伏尔的那位弟子埃斯^④所概括的：在《空间与政治》一书的《资产阶级与空间》一章中，列斐伏尔强调了法国发展的不平衡，强调了巴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0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0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03 页。

④ 以下内容参看埃斯为第四版法文版的著作《空间的生产》所写序言《列斐伏尔和空间思想》，载 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Anthropos, 2000, pp. xviii—xix.

黎及其郊区之间的矛盾：“首都吸引了一切：人口、人才与财富。这是一个权力和智力中心。巴黎周围分布着附属性、等级化的空间；这些空间同时为巴黎所控制和剥削。帝国主义的法国已然失去了它的殖民地，但在法国国内又建立了一种新殖民主义。如今的法国有着一些超级发达、超级工业化、超级都市化的地区。但同时也有很多每况愈下的欠发达地区。”不仅如此，“今天，空间已然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其用途主要有：分散工人阶级，将他们发配到指定的地点，通过制度性的规则调控各种物资流动，由此将空间置于权力之下，在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控制空间并以技术官僚的治理方式控制整个社会。^①

在《工人阶级与空间》一章中，列斐伏尔梳理了城市中无产阶级的历史。他强调，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对欧斯曼所设计的都市控制政治的反抗。对于近一些发生的事件，列斐伏尔分析了其中的滨海福斯项目(le programme de Fos-sur-Mer)，对洛林的清理(la liquidation de la Lorraine)，敦刻尔克工人大流放(la déportation de la classe ouvrière à Dunkerque)。资产阶级这一新的实践使列斐伏尔开始反躬自问政治性反思之整体性的真正含义：这还算是企业行为吗？这难道不是空间的生产吗？在这个层面上产生一项新的社会运动是可能的吗？^② 列斐伏尔提出了如此多今天依然非常具有现实性的问题。

被列斐伏尔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城市权”问题，并非是像公民

①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129、139页。

②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152页。

权与人权这样的抽象权利，而是具体的事关社会群体的权利，诸如老人与妇女、工作条件、文化状况、居住状况。城市权变得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重要，它不像虚假的自然权利而表现为最高形式的权利：自由、社会化中的个人化，城郊与生活方式。这并不是一个回归到传统城市的问题，而是要“更新都市社会生活的权利”^①，通过一种革新过的中心，为节奏与时间的使用提供机会。这就是允许充分地使用时间与地点，也就是充分地参与城市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权利。

参与的权利和对使用价值的拥有就是城市权的体现。这个作品是独特的，尽管它可以被复制；它是对差异性的总体性的集聚，具有形式上同时性的特征，在这里所有部分都是整体，反之亦然。城市本身就是最高的作品，它以其组织性的形式而进入到冲突、含糊与辩证的联系之中。都市化诞生于城市的危机和 20 世纪初的参照系的危机过程中，但这种作品的对象是对分化的克服和对总体性的重新复归。^②

那么，到底何谓城市权呢？列斐伏尔在 1968 年革命前夕写了一篇题为《论城市权》的纪念性著作。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这是一个谁拥有城市的问题，拥有不是个人直接拥有一份物业意义上的拥有，而是每一个群体集体意义上是否能够获得就业与文化，居住在一个合适的住宅里，拥有适当的生活环境，获得满意的教育，获得个人的社会保险，参与城市管理。城市权并不是关于国

^① 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select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p. 158.

^② 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select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pp. 160—174, 特别是 pp. 173—174.

家公民的权利，而是关于城市的市民的权利，是在城市空间分配与创造中，提出声明与更新群体的权利。在这里，城市权利不仅仅涉及获得城市的形体空间，同时也涉及获得城市生活与参与城市生活的更为广泛的权利，涉及平等使用与塑造城市的权利、居住与生活在城市的权利。^①

在哈维看来，城市权就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与改造城市的集体的权利。建设一个不同种类的全球化与生机勃勃的反商品化政治，这是一个关键的希望空间。今天左翼如何能够把主动接洽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与创造这个规律的替代方案这两者结合起来，让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们能够民主地与集体地管理与决定他们生产什么与如何生产？^② 这是一个核心辩证关系，直到今天，雄心勃勃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还没有把握住这个辩证关系。

哈维在自己近年来的多部著作中集中思考了2008年美国房地产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本质。这就是资本主义通常把城市化发展作为克服积累过剩危机的手段，但到头来却导致新一轮房地产的泡沫经济及其危机的后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住宅市场与城市发展，通过投机活动吸收剩余及过度积累资本的压力增强。当时克林顿总统启动了国家合作伙伴项目，把设想的那种拥有住宅的好处馈赠给低收入与少数民族群体。包括房利美与房地美在内的大型金融机构迫于政治压力，降低了他们的贷款标准，以实现让低收入与少数民族群体拥有住宅的目标。结果导致了后来的不良

^① 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select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pp. 158—159.

^② [美]大卫·哈维著，叶齐茂、倪晓晖译：《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8页。

贷款所引起的金融危机。美国当局没有看到，历史经验不可复制，要知道二战后美国那段通过郊区化与住宅地产开发，实现积累与宏观经济稳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①

拥有住宅曾经被推崇为美国梦的核心，美国家庭拥有的住宅比例从20世纪40年代的40%上升为20世纪60年代的60%，在2004年的高峰时期接近70%。从表面上看，通过大规模的住宅建设与郊区化重振经济，以及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让拥有住宅且工资较高的工人就范于政治保守主义，可谓一箭双雕之举，但殊不知从合理使用土地与空间角度，以及城市权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场灾难。^②

（此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原文有改动）

① [美]大卫·哈维著，叶齐茂、倪晓晖译：《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4页。

② [美]大卫·哈维著，叶齐茂、倪晓晖译：《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2页。

目 录

社会主义如何让人栖居于现代都市？

——列斐伏尔《都市革命》中译本代译序	(I)
第一章 从城市到都市社会	(001)
第二章 盲 域	(025)
第三章 都市现象	(049)
第四章 层次与维度	(085)
第五章 都市神话与意识形态	(117)
第六章 都市形式	(131)
第七章 刍议都市战略	(153)
第八章 都市幻象	(171)
第九章 都市社会	(189)
第十章 结 论	(207)
译后记	(217)

第一章

从城市到都市社会*

* 列斐伏尔对城市和都市概念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他在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对 ville 和 urbain 做过详细的区分，参看《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城邑与都市”一章。在此书中，ville 翻译为“城邑”，主要有三个特征：其一，它是一种空间性的东西，处于一定的场所和位置；其二，它是近端秩序和远端秩序之间的中介，是社会矛盾的表现场所；其三，它是通过建筑物、公民等各个方面组织和塑造起来的一种“作品”。而 urbain 翻译为“都市”，它是一个反映社会实践矛盾的“构成性中心”，是列斐伏尔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一个理论概念。

本书依然沿用一般的译法，把 ville 翻译为“城市”，把 urbain 翻译为“都市的”或“都市”，理由如下：一方面与另一个容易混淆的词 cité“城邦”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从古汉语来讲，“城”与“都”的区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列斐伏尔的应有之意。清代知名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对“城”的解释是：“以盛民也。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也就是说，“城”首先是一种“器皿”，是人所处的空间和场所，而“盛民”中做动词的“盛”，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君民”之间独特的统治关系。而“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都”是存有已故君王的旧宗庙的城邑。“虽小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也就是说，“都”不是以空间、大小为最终判断依据的，而是看它是否为社会关系的“构成性中心”，列斐伏尔所说的都市 urbain，也是在这种反映社会关系“中心化”的抽象意义上来使用的，因此，列斐伏尔认为“没有中心，就不会有都市的存在”，构成性中心有其特殊的、自我构成和瓦解的辩证的运动（参看《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第50页）。——中译者注

让我们从社会的完全都市化^①这一假设出发。该假设自有其论据和证据来支撑，它包含了一个定义：我们所说的“都市社会”，是社会被完全都市化的结果，它在目前是潜在的(virtuelle)，但在未来却是现实的(réelle)。 F7/ EI^②

以上定义排除了我们所使用的术语的含糊性。事实上，人们经常用“都市社会”来指称任何城市或城邦(cité)：希腊城邦、东方或中世纪的城市、商业城市或工业城市、小城市或大都会(mégalopolis)。在极度混淆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忘记或忽略了那些把各种都市类型联结起来的诸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这些所谓的“都市社会”本来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可人们却非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这就为一些隐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方便之门，如有机论(organicisme)(每一个“都市社会”单独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连续论(continuisme) (“都市社会”有其

① 法文原版(包括英译版)中多有斜体字，中译本悉从中文习惯改为黑体表示，以示重点，全书同。——中译者注

② 本书根据该书法文原版(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译出，并参考了该书英译版(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为便于查阅对照该书的法文原版与英译版，本书一律分别用 F/E 标注法文版与英译版初始页码。——中译者注

F8 历史连续性或持久性意义)，以及进化论(*évolutionnisme*) (“都市社会”的不同时期、社会关系之间的转变日渐模糊或消失)。

E2 在这里，我们保留的“都市社会”这一术语，用来专指在工业化进程中诞生的社会，它通过工业化进程本身对农业生产的支配和吸收而建立起来。只有在那些继承了非连续的(*discontinues*)转变的、旧的都市形式发生爆裂(*éclatent*)之后，这种都市社会才孕育出来。对于这一理论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能够根据连续性来确定非连续性，反之亦然。如果没有一种隐蔽的连续性，没有载体和内在的过程，怎么会有诸种绝对的非连续性呢？相反地，如果没有危机，没有新的因素或关系出现，怎么会有连续性呢？

各部门专业科学(也就是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等)提出了为数众多的名称来描述“我们的”社会，描述现实与各种深远的趋势，描述现实性与潜在性：如“工业社会”，以及更晚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丰裕社会”“休闲社会”以及“消费社会”等。每一个名称都包含了一部分经验或概念真相，也包括一部分夸张和推论。我这里不使用后工业社会这样的术语——也就是那个诞生于工业化及其之后的社会，我宁愿用都市社会一词来指认各种趋势、方向和潜在性，而不是指任何既定的现实。当然，这一概念绝不妨碍对当代现实的某种批判性考察，如它不妨碍对“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的分析。

F9 这里涉及科学思想是否有权力提出理论假设，并以此作为出发点的问题。该程序不仅在科学中是通用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如果没有理论假设便没有科学。我们从现在开始强调，所谓的“社会”科学的假设，是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构思结合在一

E3

起的。认识不一定是对已经(*déjà*)现存对象的摹本或反映、幻象或拟真。相反,它也不必以理论的名义来构造它的对象,关于对象或“模型”的理论是先于认识而存在的。对我们这里而言,对象包含在假设之中,而假设容纳着对象。即使“对象”已经超出了(经验的)事实,它也不会是虚构的。我们假定的潜在的对象,都市社会,也就是可能的对象,我们可以借此来描述都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使其与一种进程和一种实践(实践活动)联系起来。

无须多言,这个假设需要建立自身的合法性,我们要不断重申和检验这一点。不能缺少其所需的理由和证据,无论是最简单的还是最复杂的。

难道我们不需要一直强调,农业生产在主要的工业国家、作为全球经济的构成部分已经完全丧失自主权了吗?难道不需要强调,农业生产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甚至不再是一个具有其特征的部门(除非它还处于不发达状态)了吗?即使从农业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以来,其地方和区域特征还没有消失,由此产生的差异还在扩大,也不可否认,农业生产已经转变为工业生产的部门,服从于后者的命令和控制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成为最重要的原因和理由,并在各个领土、区域、国家和大陆上全面扩大影响。结果,传统的适于农民生活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农村(*village*)正发生着变化,被更大的单位吸收或征用,被融入工业及其产品的消费中。人口的集中伴随着生产方式的集中。都市组织(*tissu urbain*)正在增生、扩张和侵蚀着农业生活的残余。“都市组织”并不仅仅是指城市中的建筑领域,而且指城市对乡村(*campagne*)实现统治的全部症状。在

F10

E4

F11

此意义上，一栋别墅、一条高速公路、一个乡村里的超级市场，都属于都市组织的一部分。它有着不同的密度、浓度和活性，只有那些被划归为“自然”的、死气沉沉的区域才免受牵连。农业生产者也就是“农民”，将要面对日渐消失的旧农村，也就是农庄(*agroville*)。赫鲁晓夫^①向苏维埃农民承诺，农庄将会在世界各地出现。在美国，除了在某些南部地区，农民逐渐消失，他们只能待在都市贫困区之外的农村贫困区。随着全球范围这一形态(工业化与/或都市化)的一步步展开，大城市的激增带来了中间产物——郊区、住宅区或工业区、卫星城(*bourgades satellites*)，卫星城又与都市化的城镇(*bourgs urbanisés*)不大一样。小城市和中等城市成为大都市(*métropole*)的附属和半殖民地。因此，我们的假设既可以作为既有认知的总结，也可以充当一种新的研究和计划的出发点：完全的都市化。假设被提前了，它延长了当下的基本趋势。都市社会通过“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已经在其内部开始酝酿。

F12

一些消极的论据和荒谬的证据是：其他任何假设都是不合适的，其他任何假设都不能囊括所有问题。那么问题是：工业化之后将发生什么？休闲社会？这只解答了这个问题的一部分，限制了我们对“基础结构”(équipements)的趋势和潜在性的检验，这种现实的态度并不会妨碍这一定义的哗众取宠；大众消费的无限增长？这只能让人满足于测量现在的指标并以此类推(*extrapoler*)，因而有一种把现实性和各种潜在性简化(*réduire*)为它们诸多方面

①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 1894—1971)，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等重要职务，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中译者注

的一个单一体的危险。

“都市社会”这一表达则响应了一种理论的需要。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达或教育方法，也不仅仅是既有知识的某种形式，而且是一种设计、一种探索，乃至一种思想的构成。这种思想的运动接近于某种具体，乃至接近于那个具体现实，它是自我概括和自我明晰的。假如得以确证，这种运动将走向一种实践——都市实践(*pratique urbaine*)，从而被人们把握或重新把握。毫无疑问，在进入具体现实之前，也就是在进入那个通过理论方式把握的社会实践之前，需要跨过一道门槛。但这并不意味着去寻找一种能够制作出都市现实这一产品的经验方法。难道这些是我们从“都市规划”(l'*urbanisme*)^①那里乞求得到的东西吗？抑或是那些“都市规划者”反复许诺的东西？这一理论，对立于以观察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对立于轻率的类推法，最终对立于为了便于理解而碎片化的知识，这是一种从理论假设出发的自我证明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探索和设计是与有条不紊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在探索一个潜在的对象时，为了能够从开始设计时就对它进行定义并认识清楚，这种探索必先确定好它的名称。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和程序，也就是不同于演绎法和归纳法，这里的方法是传导法(*transduction*)[对可能存在(*possible*)的对象的反思]。上述“都市社会”的概念意味着它既是一个假设，也是一个定义。

^① l'*urbanisme*(英文 *urbanism*)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在本书中我们统一译作“都市规划”。城市规划既是学科范畴又是专业范畴，包括城市现象研究、城市化运动和城市及其辖区的组织。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是城市设计家。按照科学院的传统，这一学科时而与建筑学，时而与地理学联系在一起，根据所涉及的角度，时而与城市参与，时而与理论研究联系在一起。在法国，此领域的大学教育和科研属于国家大学委员会的指定院系。——中译者注

F13 同理，我们接下来所使用的“都市革命”，指的是划分当代社会阶段的那些转变，从以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模型、计划、规划)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到都市问题决定性地成为主导的时期，对都市社会的解决方法和适合形态的探索将成为首要计划。在这些转变中，有些是突然的，有些是逐步的、有计划的和商议的结果。到底是哪种？这需要我们对这一合法性问题做出回答。这里不能预先保证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在思想上让人满意或毫不含糊的。“都市革命”从根本上说并非是指暴力的行为，但也不能把它们排除在外。我们怎么可能事先对通过暴力行为而达到的结果和通过理性行为而产生的结果做出判断呢？暴力的本质难道不是自我爆发吗？思想的本质难道不是通过解开我们思想的束缚，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吗？

E6

关于都市规划，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F14 第一，长年以来人们已经把都市规划看作一种社会实践，其在本质上是科学的和技术性的。在此情况下，理论反思应当有能力而且有责任把这种实践提升到概念水平，更准确地说，提升到认识论水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并没有这样一种都市规划的认识论。我们需要填补这一空缺吗？不。事实上，这一空缺有它的道理。难道这不是因为所谓的都市规划的科学特征在新的秩序出现之前，就已经被其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特征所取代了吗？假如这一过程可以自我展开，而且对它的认知总是要经过认识论，那么当代都市规划似乎难以为继。必须要知道都市规划的问题和内容到底是什么。

第二，正如它所表现的那样，都市规划作为一种政策(具有制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内涵)受到了两方面的批判：从右的

方面的批判以及从左的方面的批判。

右翼的批判(*la critique de droite*): 我们都注意到, 右翼的批判通常是怀旧的和人文主义的。它直接或间接地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为所谓的“自由事业”而辩护。它开拓了资本主义及其资本的所有“私人的”能动性渠道。

左翼的批判(*la critique de gauche*): 许多人没有注意到, 左翼的批判并非与那些所谓的“左翼”组织、俱乐部、党派、机构和空想理论家们联系在一起。它试图开辟一条通向可能的道路, 探索和勾勒出一片不仅仅属于“现实”, 而且属于那些被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占有的现实的领域。因此这是一种**乌托邦**的批判, 它与“现实”保持距离, 却不放弃现实的视角。

E7

针对以上所述, 我们可通过画一条轴线来表示:



这条轴线从左边的毫无都市化(“纯自然”、被放逐到“自然力”之中的土地), 直到右边的都市化进程完成。这条轴线表示我们所指的对象——**都市**(都市现实), 它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 空间的, 是因为这一进程在空间中展开, 它改造了空间; 时间的, 是因为它在时间中发展, 它一开始只是作为次要的方面, 但后来成为实践和历史的主导。这个图示只反映了这段历史的一个方面, 对时间的这种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和武断的, 是为进一步的操作(周期化)创造条件, 它没有绝对的特权, 而是与其他划分一样, 是一种平等的(相互的)必要性。

F15

这里为“都市现象”(都市)研究这一路径确立一些标志。首

E8
F16

先，这里面有什么？人种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口。在最初的阶段，第一批人类组织（采摘者、渔人、猎人，也许还有牧羊人）在空间上打下烙印并为之命名，他们在留下痕迹的同时开拓了空间。他们指出了地名，即最基本的地方单位。这是后来定居于土地上的农民不断完善和有条不紊地精确化的地志学和空间网。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所有有历史的地方，城市都是伴随着或跟随着农村出现的。耕地、农村以及农村文化慢慢分泌出都市的现实，这种表象反映了它与一种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它是在罗马帝国解体、中世纪城市重建期间的欧洲产生的。然而这种表象也可以用来支持相反的观点。农业并不优于采摘业，它只有在都市中心的推动（专制）下才能建立起来，占领着该都市中心的通常是精明能干的征服者，他们逐渐变成保护者、开拓者和统治者，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其雏形的管理者和奠基者。政治城市（*ville politique*）紧紧地伴随着或跟随着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农业以及农村的建立而来。

当然，这一论题对于一种源远流长的、艰苦的、流动的农业——半游牧生活的广阔空间而言毫无意义。这明显要依靠“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同时缔造了都市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古代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①）相关的分析和文献的支持。城市与

^① 这方面的文献目前相对可观，这一问题自从一篇题为 *Asiaticus* 的著名文章（*Rinascita*, Rome, 1963）发表后重新得到重视。参看 J. Chesneaux 的文章（*La Pensée*, 第 114 和 122 期）；M. Godelier（*Les Temps modernes*, 1965 年 5 月号）。其研究基础来自于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K. A.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Leipzig, 1931）（K.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英译者注），这本书 1964 年被译成法文（*Le Despotisme oriental*）。参看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中的文本。——原注

乡村之间关系的普遍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大胆地把**政治城市**放到上述时空轴线的起点上。谁负责治理这种政治城市？教士、军人、君主、“贵族”、军事首领，也有管理者和文员。没有文字就没有政治城市的形成——文书、命令、账单、赋税。它完全归属于秩序、法令和权力。尽管如此，政治城市同样意味着交换的存在，这可以获得谋求战争和权力所必需的物质基础（金属、皮革等）。因此，它还需要手工业者和工人。政治城市通常开发、保护和管理一片广阔的区域。它指导着大规模农业工程的建设：排水、灌溉、筑堤、开垦等。它统治着一定数量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成为君主的至高权力，象征着秩序和效力。不过，农民和共同体可以通过赋税来保留其有效的使用权。

F17

E9

在这种条件下，不可或缺的交流 and 贸易必然得到了扩张。起初被界定为可疑分子的“外来人”在功能上变得强大起来。交流和贸易的场所一开始就打上了**异位空间**(*hétérotopie*)的烙印。就像它们的管理者和占有者那样，那些场所——驿站、集市、城郊等——起先被排除在政治城邦之外。市场和商品(人与物)的整合过程一直持续了数百年。交流和贸易对于生活的延续不可或缺，并带来了财富和流动。政治城市感受并认识到了市场、商品、商人及其所有权的形式(货币，按照它的规定而流动的所有权)带来的威胁，并利用所有力量和凝聚力进行抵制。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雅典由于靠近商

F18

业城市比雷埃夫斯^①，因此用于政治讨论的、自由的空间中摆放商品的行为在古希腊广场屡禁不止。耶稣把商人驱逐出圣殿^②，同样也是一种禁止，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中国和日本，商人长期是都市的下层阶级，被排挤到“特殊的”的地区（异位性）。事实上，只有在中世纪结束后的西欧，商品、市场和商人才成功地渗透到城市之中。我们可以设想在此之前，流动的商人中有一部分是军人，一部分是掠夺者，他们有意地选择待在古代（古罗马）城市的遗址上，与领主开展武装斗争。基于这种假设，这种改造后的政治城市将以自我改造为行动目标。在这场反对领主、所有者以及其统治者的（阶级）斗争中，它充满生命力地在西方创造了其整个历史本身，市场成为中心之地。它接替和取代了集会（古希腊广场、古罗马广场）地位。市场周围的地方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汇聚了教堂和市政厅（由商业寡头势力所控制）以及象征着自由的钟塔或钟楼。建筑遵循和阐释了这座城市新的理念。都市空间成为物和人汇集的地方，成为交换的场所。它以这种被征服的自由为标志，就像那个大写的自由（Liberté）一样是一种宏大而可笑的斗争。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给予法国西南部的“城堡”一种象征性的价值，它们是第一批在市场周围建立起来的城市。历史充满了反讽。商品拜物教随着商品的统治、逻辑、意识形态、语言以及它的世界而出现。

E10

F19

① 比雷埃夫斯位于希腊雅典西南8公里萨罗尼科斯湾畔，是雅典的外港。——中译者注

② 《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13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中译者注

在14世纪，人们相信只要在中心之地周围建立市场和商店、通道和长廊就可以吸引商人和买家。因此，他们（领主和资产阶级）在荒芜的、几乎是沙漠的地方建立商业城市，牧群和半游牧部落还时常从中经过。这些法国西南部城市虽然赢得了一些伟大而繁荣的大城市（巴塞罗那、博洛尼亚、普莱桑斯、佛罗伦萨、格林纳达等）的声誉，却都以失败告终。无论如何，商业城市（*ville marchande*）总是在政治城市之后才形成的。当时（大概在14世纪的西欧），商业交换成为一种都市的功能，它以一种形态（或多种形态：建筑的和/或都市的）出现，这就给予了都市空间一种新的结构。巴黎的改造反映了三个方面以及三个基本概念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即功能、形态和结构。起先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城镇和郊区波布（Beaubourg）、圣安东尼（Saint-Antoine）、圣奥诺雷（Saint-Honoré）^①逐渐成为中心，与政治权力（体制）争夺影响力、声誉和空间，迫使它们做出妥协并与其共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都市统一体。

F20

E11

在西欧，某个时刻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却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城市在社会整体中的重要性，使社会整体本身发生了动摇。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中，后者的地位依然是首要的：地产资源、土地收益、分配到领地的人群（领主或贵族）。与乡村相比，城市保留了一种异位空间的特征，以城墙和郊区的变迁为标志。在某个时刻，这些关系颠倒了，情况变得完全相反。应当在我们的轴线上记下这种反转，这种异位空间颠倒的时刻。从那时起，城市不再显现或表现为在乡村这一汪洋大海中的一

① 三个地方皆为巴黎地名，位于塞纳河右岸。——中译者注

F21 座孤岛，不再表现为与农村或乡村的本质相对立的矛盾、怪物、地狱或天堂。城市作为众多术语之一进入了人们的意识和认识，与乡村一样构成了“城市—乡村”这一对立式的一部分。乡村是什么？它不过是城市的“环境”、范围、边界。农村人呢？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再是为领主而劳动，而是为城市、为都市贸易而进行生产。即使他们知道小麦商人或木材商人剥削了他们，他们也认为这是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

E12 到底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发生了什么？深思熟虑的人并没有看到自己处于自然之中，处于那个受神秘力量所折磨的阴暗的世界之中。在他们与自然之间，在他们的家园（极重要的思想即存在）和世界之间，有着一个基本的中介——都市现实。从那个时候起，社会不再等同于乡村。国家居于它们之上，使它们在其领导下联合起来，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然而对当时的人而言，君主还隐藏在他的面纱之下。理性（Raison）是什么的附属？王权？神权？个人？无论如何，正是这种城邦的理性，在希腊和罗马没落之后，在它们最重要的成果——逻辑和法律变得暗淡之后，重新建立起来。逻各斯（Logos）重生了，但人们不是把它归因于都市的再生，而是归因于一种超验的理性。理性主义随着笛卡尔而达到顶点，伴随它的是农村的优先权被都市的优先权取代。不过农民并不这样认为。然而，在这一期间，**城市的形象**（*l' image de la ville*）诞生了。城市掌握了文字，它深谙文字的秘密和权力。它已经把城市性（urbanité）（文化的）对立于粗野性（rusticité）（天真的、粗鲁的）。从某个时刻开始，城市有了它自己的写作方式——**地图**（*plan*）。地图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指规划（planification）——它还在酝酿之中——而是指平面

F22

几何学(*planimétrie*)。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在城市和乡村的意义发生颠倒的那个时期,欧洲出现了城市的地图,特别是巴黎的第一批地图。它们还不是抽象的地图,还不是都市空间在几何学坐标上的反映。它们是视觉和理念、艺术作品和科学作品的混合,通过高低远近、透视法来展现城市,同时也是几何学的绘画、描绘和描述。这种透视作为思想与权力的透视,既是理想的又是真实的,它处于认识和理性之中的一个垂直的维度上,去掌握和建立一个总体性——城市。这种通向城市的社会现实的颠倒,这种(相对的)非连续性完全可以在上述时空轴线上表示,轴线的连续性正好能够标记(相对的)分界。只要画一条从零到终点数字(假设为 100)的中心线就足够了。

E13

这种意义的颠倒离不开商品贸易以及市场的存在。只有使用嫁接在政治城市之上并发挥自身优势的商业城市,才能对此做出解释。紧随其后的是工业资本以及工业城市(*ville industrielle*)的出现。这一概念需要进一步解释。工业与城市是结合在一起的吗?毋宁说它是与非城市(*non-ville*)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在都市现实不在场或断裂的地方。我们知道工业起先是建立在能量资源(煤、水)、原始材料资源(金属、纺织)以及劳动力资源附近的。当工业走进城市的时候,它为了寻找资本和资本家、市场以及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工业随处可建,但它早晚要进入已有的城市,或者建立新的城市,一旦有新的利益出现,它也准备好随时离开。就像很久以前政治城邦抵抗来自于商业、交换和货币的半和平、半暴力的入侵一样,政治和商业城市也抵抗来自于新生工业、工业资本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入侵。用什么方法?通过社团主义(*corporatisme*)来固定相互的关系。历

F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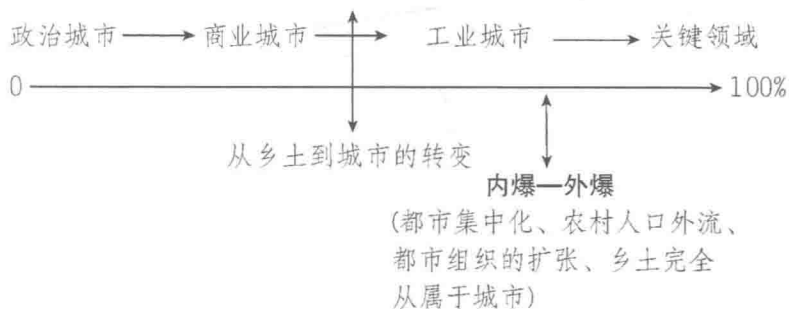
史连续论和进化论都掩盖了这种影响和断裂。这种奇怪却很奇妙的运动使辩证思想得到了更新：非城市和反城市(anti-ville)征服了城市，渗透到城市之中并使之爆裂，因此使它无限地展开而走向社会的都市化，形成一个能够囊括所有前工业的城市剩余物的都市组织。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之所以不为我们所注意，而只是被人们碎片化地描述，是因为意识形态希望消除辩证思想以利于逻辑思想，也就是对一致性的确证，仅此而已。不断扩张和爆裂的都市现实，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它携带的从前时代的特征：组织的总体性、附属、令人振奋的想象以及被伟大的荣耀所掌握和支配的空间。它在都市性的解体中充满了都市的符号，它成为规章和统治的秩序，以信号、流通(路线)法则和定位为标志。它有时看起来像草稿，有时像权威的公文。它多多少少是专横的。但这些描述性术语都没有完全考虑到内爆—外爆(*implosion-explosion*)(借用核物理学的比喻)，也就是在都市现实中的一种非同寻常的集中化(人、活动、财富、物质以及对象、方法和思维方式)，以及一种广泛的爆裂，各式各样的碎片的反映(市郊、郊区、二手房、卫星城等)。

工业城市[通常是一个未成形的城市、一个勉强算得上都市的城区、一个企业集团、一个“集合城市”(conurbation)，就像鲁尔区]预示了关键领域(*zone critique*)的到来。这时候，内爆—外爆已经显示出它们的影响。工业生产的增长与商业贸易齐头并进。它从物物交换一直发展到世界市场，从两个人之间的简单交换发展到商品、作品、思想以及人类本身的交换。买与卖、商品与市场、货币与资本之间似乎被扫清了障碍。在这种扩大化的时期，这一进程的影响——也就是都市现实——既

是原因，也是目的。被引发者成为支配者(引发者)。都市总问题式(*problématique urbaine*)摆在了世界的面前。都市现实能否把自己看作是位于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上的一种“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简单结果？与生产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边缘的现实？不！都市现实改变了生产关系，但并不足以改造整个生产关系。它像科学一样成为生产力。空间和空间政治“表现”了社会关系，但也反过来影响了它们。显然，如果都市现实能够自我显现和自我证明它的支配地位，那么它只能通过都市总问题式。怎么做？如何建立一些城市或“事物”去取代往昔的城市？如何思考都市现象？如何表达、归类、分级来解决这些数不清的问题，从而更容易地把它们提上我们的议程？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哪些决定性进展，能够让意识达到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现实的、可能的高度？

F26

我们把这一进程勾勒如下：



在关键时期(*phase critique*, 英文 *critical phase*)发生了什么？本书尝试回答这一问题，把都市总问题式放到整体过程中去解决。画一条轴线，指出一个有方向的时间，通过思想来跨越批判空间而达到彼岸，这种理论假设能否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E16

么事情？也许可以。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假设。由于没有反面证据，我们可以假设第二次翻转，也就是第二次意义和状况的颠倒正在发生。工业化作为一种统治性和强制性的力量，在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下成为现实，以产生巨大的混淆为代价，过去的和可能的、最好的和最坏的变得混乱不清。

F27 这种理论假设涉及可能存在的与实际存在（“现实”）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该忘记，都市社会的开端和都市化的形态取决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特征（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或高科技的飞速发展）。都市社会开端之间的不同以及其意义和结果之间的差异，也是思考都市现象或都市总问题式的一部分。这些术语都比“城市”准确，因为用“城市”似乎指明了一个被定义的、明确的对象（*objet*），它是科学赋予的、与行动直接相关的客观的对象，因此在理论方法上一开始就需要对这一“对象”进行批判，需要一个更复杂的观念来表示潜在的或可能的对象。换句话说，在这一角度来看，并没有一种城市科学（都市社会学、都市经济学等），而只有对整体过程（*du processus global*）逐渐成熟的认识（*connaissance*），它的术语（目的和意义）也是如此。

E17 都市（“都市社会”的缩写）因此不是被定义为完成的、在时间上落后于当下的现实，而是一条地平线，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潜在性。它是一种可能性，它被确定在一个方向之上，直到最终实现。为此，我们需要绕过或消灭那些使它在目前不可能（*impossible*）存在的障碍。理论认识可以把这种潜在的对象、行动的目标当作一种抽象吗？不能。它只有在科学的，也就是合法的意义上，才是抽象的。理论认识能够而且应当表明自身立足的基础：一种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以及正在形成的都市实践，F28 不管要面对怎样的困难。这种实践在目前是隐蔽的、分散

的，它在今天只拥有现实的一些碎片和一门未来的科学，这就是关键时期的一个角度。我们要在这一方向上找到出口以及解决目前这一总问题式的方案。总之，潜在的对象只是对全球社会和“世界城市”的另一种称谓，它们在现实和思想中发生的世界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彼岸，在农业还占支配地位并且商业和工业生产增长过程还被保留下来的旧世界的彼岸。尽管如此，都市总问题式并不能囊括所有问题。虽然都市现实改变了农业和工业的面貌，但它们还保留着自身的问题。此外，都市总问题式并不允许思想肆无忌惮地探索它的可能性。对它的分析重新回到对都市化类型的描述和辨别之中，去解释都市的形态、功能和结构，是如何从古代城市的爆裂和普遍的都市化中发展出来的。目前，关键时期还处在一个“黑匣子”之中。我们知道它从哪里来，有时也会察觉到它到哪里去，却不太清楚到底在其中发生了什么。这就导致传统的预测和反映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它们基于现状而进行推论，也就是一种实证的方法。反映和预测只有在一门具体的科学中才能找到它的基础，比如人口学或政治经济学。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客观意义上”的总体性。

E18

F29

为了描述这一危机的深度，以及伴随着“关键时期”而来的不确定性和迷惑性，我们可以致力于用一种比较的方法。是不是要找出不同的类型？是，但还需要更进一步。这里列出一些论据——关于街道和纪念碑的利与弊。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些利与弊的争论：自然、城市、都市规划、都市中心……

街道之利(*pour la rue*)。它不仅仅是一个过渡和交通的地方。汽车的入侵以及汽车工业[也就是汽车集团(*lobby*)]带来的压力，使汽车成为至关重要的东西，使停车成为烦恼，使交通成为首要目标，对整个社会和都市生活造成了破坏。总有一天

我们必须限制汽车的权利和影响，还要面对一定的困难和损失。那么，街道是什么？它是人们相遇的场所[托邦(*topie*)]，如果没有街道人们就不能在其他指定的场所相聚(咖啡厅、剧院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场所)。这些特殊的地方使街道充满活力并为这种活力服务，否则它们将不复存在。街道就像一个自发的剧院，我成为景观观众，有时候也是演员。这里充满了运动和交融，没有这些就没有都市生活，而只有分散和凝固不动的隔离。当我们取消了街道的时候[始于勒·柯布西耶^①，发生在“新联合”(nouveaux ensembles)^②之中]，我们看到了后果：整体生活衰退，“城市”退化为宿舍，存在被荒谬地功能化了。柯布西耶忽略了街道所具有的功能——信息功能、象征功能以及游戏功能。街道是游戏和学习的地方。街道是杂乱无章的。都市生活的所有元素，在别处固定的、冗余的秩序中被凝固的东西，在街道中或通过街道解放出来，流向它们的中心。它们在那里相遇，脱离原来固定的场所。这种杂乱无章是有生命的。

①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是功能主义建筑的泰斗，被称为“功能主义之父”。他在《光辉城市》一书中，认为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我们的街道已经不管用了。甚至街道本身都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了。街道作为一种事物，理应遭到抛弃，我们必须用新的事物来取代它”。(参看金秋野、王又佳译：《光辉城市》，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中译者注

② 指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比利牛斯山脉朗德省出现的石油联合企业。一座新的城市穆朗在石油区附近建立起来，而它距离列斐伏尔居住的小城镇纳瓦朗只有几公里，因此，列斐伏尔对这一都市化进程有着非常切身的体会。对他而言，在纳瓦朗里，街道是“漫步、闲谈和生活的地方……听着工匠和他的锤子的声音、木匠刨木发出的刺耳声、孩子的喊叫和母亲的责骂声”。然而，这些事物都随着都市化而逐渐消失。而列斐伏尔更担心穆朗的情况。在穆朗，每一件事物都只为自己的功能服务，“穆朗至今还没有足够的红绿灯。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地方不过是一个红绿灯而已：令则行，禁则止”。(参见 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Verso, 1995, pp. 116—119.)——中译者注

它带来了信息，让我们吃惊。此外它还建立了一种最高的秩序。简·雅各布斯^①的研究表明，在美国，街道(热闹的、繁忙的)为应对刑事暴力(盗窃、强奸、袭击)提供了唯一的、尽可能的安全之地。没有街道的地方，犯罪就会滋生。在街道中以及通过这一空间，一种组织(城市本身)开始呈现出来并把这些地方据为己有(*s'approprié*)，以获取一种自身的时空。这种挪用表明了使用和使用价值能够支配交换和交换价值。革命事件往往发生在街道上。难道这不同样表明这种杂乱无章酝酿着另一种秩序吗？街道的都市空间难道不是这种话语产生的地方吗？难道它不是一片能把话语转换为文字的宝地？难道不是这些词句和符号像事物一样被交换的地方吗？街道变成了这样的地方，人们为逃避规则与制度，而把演讲变成“涂鸦”刻在墙壁上。

街道之弊(*contre la rue*)。街道是人们汇聚的场所吗？也许吧，但这只是肤浅的相遇。在街道上，我们不是相遇，而是在随波逐流。这里的“我们”才是关键。街道不允许建立组织或“主体”，却聚集了一帮不知所向的人。商品世界在街道上展开。那种无法跻身于特殊场所、市场(广场、大厅)、商业世界已经入侵到整个城市之中。在古代，街道只是具有转换功能的寺庙、运动场、广场、花园等核心场所的附属。中世纪，手工艺者占领了街道，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卖家。随后，纯粹的商人成为街道的主人，街道成为商店之间的橱窗和过道，商品成为(挑逗的、诱人的)景观，同时把人们也变成景观并循环往复。尤其在这里，交换和交换价值超越了使用，直到把它化为一种剩余

F31

E20

^①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 1916—2006)，美国杰出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她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的发展。——中译者注

物。因此，对街道的批判应当更进一步：街道成为核心场所的一种压迫，并尽可能地通过这里形成的关系的“现实”特征表现出来，它是脆弱的、被异化的。街道上的移动(*passage*)、交流的空间，是强制的(*obligatoire*)和受压抑的(*réprimé*)。在面临威胁时，行使权力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在街道上逗留和聚集。即使街道曾经是人们相遇的场所，它已经而且也只能失去这种意义，通过必要的自我化，把自身分裂成(被围捕的)行人和(受到优待的)汽车的通道。街道转变成有组织的网，它为消费服务并通过消费而组织起来。行人行动的速度虽然能够被容忍，但它是能否察觉到橱窗和购买展览的商品来决定和衡量的。时间成为“商品时间”(买和卖的时间、被购买和被贩卖的时间)。街道在劳动时间之外控制着时间：它使劳动服从于自身的系统，服从于产出和利润。它只是存在于强制劳动、有计划的休闲活动和作为消费场所的住宅之间的必要过渡。

F32

E21

F33

消费的新资本主义结构在街道中展现了它的力量，它不仅仅是(政治的)权力，或者是实施压迫的权力(公开的或隐蔽的)。街道、橱窗、展览的商品，显示了商品的逻辑如何夹杂了一种(被动的)沉思而形成一种美学和伦理学。商品的积累伴随着人口和资本的积累，变成一种隐藏在可读性和可见性特征之下的意识形态，因此它似乎不证自明。因此我们也可以讨论都市空间的一种殖民化(*colonisation*)，通过图像、广告等物质外观而在街道上形成，也就是通过“物体系”来制造象征和景观。背景的统一化和老街的现代化，为(商业)物品保留了颜色鲜艳的效果和诱人的形式。在权力允许的情况下举行的街道游行、化装舞会和民族节日等，表现了一种漫画般的、对空间进行取用和

再取用的外观。而那种真正的取用，实际的“示威游行”，则被镇压的力量制止，要求人们沉默和遗忘。

纪念碑之弊(*contre le monument*)。纪念碑在本质上是镇压性的。它是一个制度(教会、国家、大学)的中心。在它周围构建一个空间是为了对它进行移植和压制。伟大的纪念碑被看作征服者和当权者的荣光。极少数是为了纪念死者和美人(如泰姬陵等)，这些是宫殿和陵墓。建筑的不幸在于它试图建立纪念碑，而“栖居”(l'*habiter*)^①要么在脑海中已经有了那个纪念碑的

① 根据此书的英译者的解释(参见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p. 189—190), l'*habiter* 是一个不常用的动词不定式。列斐伏尔征引这个动词不定式 l'*habiter* 作为一个名词来使用。这是一个明显违背正确语法的用法，在法语中也是如此。虽然列斐伏尔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原因，但该词取自海德格尔的德语动词 *wohnen*，来自对该词的动词化名词构成形式 *Das Wohnen*。这个词在英语中则被译作 *dwelling*(这是一个动词状形容词，而不是与“房子”或“住所”同义的名词)。英译者声称他之所以把法语原文中的栖居 l'*habiter* 译作 *habiting*，其潜在原因就是本书作者频繁地将 l'*habiter* 与法语 *habitat* 并列使用。而在英语中与之相对应的是 *habiting* 与 *habitat*。此外，*to habit* 与法语中的 *habiter* 均来自于拉丁语的不定式 *habitare*。关于 *habiting* 用法的一点补充性论证对于读者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一个动名词作为一个普通的名词来使用)。

我们不妨通过海德格尔在《筑·居·思》一文中的观点来说明何谓筑造与栖居以及列斐伏尔本人所理解的栖居的重要性：在古高地德语中，筑造 *buan* 即意味着栖居。后者表示滞留与逗留。动词筑造即栖居的真正意义对我们而言已经失落了。说到栖居我们通常以为是一种行为，是人类在其他许多行为之外也在做的一种行为。我们无所事事，我们还从事职业活动，我们经商旅行等，在途中居住。一会儿在此处一会儿在别处。筑造原始地意味着栖居。筑造在古德语中即 *buan*, *bhu*, *beo*，也就是我们现代德语的动词 *bin*，即存在或是。由此来看，我是、你是即意味着我居住、你居住。所谓人存在就是作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意思就是居住。海德格尔最终引出这样的结论，即筑造乃是真正的栖居。栖居作为“终有一死者”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作为栖居的筑造展开为那种保养生长的筑造与形成建筑物的筑造[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演讲与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4—156页)。而在《都市革命》这本书中列斐伏尔显然在其所理解的一部从潜在到现实的都市历史观中把第一个关键时期理解为“农业从属于工业化”，第二个关键时期则分为(a)“工业化从属于都市化”、(b)“整体性从属于都市的和都市从属于栖居的”“一直被认为并不重要的层次(即栖居)，现在变成本质性的了”。(参见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 p. 135, 122.)——中译者注

形象，要么对此漠不关心。纪念性空间向栖居的扩张总是灾难性的，并且隐藏在它的接受者的眼睛之下。因此，纪念碑的光辉是表面上的。尽管纪念碑充满了象征意义，但当这些象征呈现在社会意识和(被动的)沉思面前时，已经过时和失去它们的意义了，就像凯旋门所代表的革命象征一样。

E22
F34

纪念碑之利(*pour le monument*)。这是人们唯一能够构思和想象集体(社会)生活的地方。它控制人们是为了让他们相互团结。美和不朽是联合在一起的。伟大的纪念碑是跨功能的(教堂)甚至是跨文化的(陵墓)，它们伦理的和美的力量正是来源于此。纪念碑把一种世界观投射到地面上，而城市则是把社会生活(整体性)继续投射到地面上。在它们最本质的意义上，有时候正是在那个使社会特征变得可辨认的普通空间里，纪念碑铭刻了一种超验性、一个远方(*ailleurs*)。它们永远是乌托邦的。它们从高度和深度上表明了一种都市进程之外的维度，即义务、权利、知识、幸福、希望……

第二章

盲 域

在本书中，我主要不是循着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方法进行研究的。从表面上看，我好像在描述和分析城市的起源及其变化与转型这个对象。但是，我的初衷与一个潜在的对象有关，我通常用一个时空轴来描述它。未来阐释过去，潜在之物可以让我们研究和定位现实之物。受工业和资本主义冲击而瓦解的前工业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城市，有助于我们理解工业城市的状况和之前发生的事。依此类推，它的前身即商业城市，反过来又可以使我们理解那个它得以重叠于其上的政治城市。马克思认为，主体(觉悟)的成年期包括孩童期，这使我们能理解其起点，作为一个现实的对象，孩童这种未经打磨的“原石”形式可能比成人更丰富、更复杂。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可能是复杂而且令人费解的，但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使我们能够理解那些最清晰的社会，即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随着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到来，我们的意识便能理解两种相对立的运动：回溯(*régressif*)(从潜在到现实，从现实到过去)与前进(*progressif*)(从过时的和已完成的事物到宣告达到某种目标的运动，它预示并促进了新事物的诞生)。

F35/
E23

F36
E24

历史时间能依照生产方式分为(划分时期)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这种区分既有优点也

有缺点。物极必反，若是我们强调每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特征和它们的区别，那么，每种方式作为一个总体的连贯一致性，它们之间的跃迁就变得不可理解，而这时它们各自依然清晰可辨。而且，每种生产方式已经“生产出”（不是任何普通意义上的事物，而是指一种享有特权的作品）一种城市的类型，这种城市使最抽象的关系——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成为确实有形的，以一种在外界环境中清晰可见的方式“表达”其生产方式。时间的这种不连续性不能过于突出，以至于使连续性变得不可理解。在城市中也存在一种相对连续的积累过程：知识、技术、物、人、财富、货币和资本的积累。城市是各种积累的滥觞，即便资本也许产生于由农村所创造的财富，哪怕工业投资并不有利于城市。

F37 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区分了剩余价值的形成和它的实现与分配。剩余价值最初形成于农村，当城市成为生产、手工业活动和工业的中心，剩余价值的形成便由农村转向城市。建立于城市之中的商业和银行系统则一直是剩余价值实现的一种组织机构。在财富分配方面，那些控制城市的力量也试图保留绝大部分这种剩余价值（比它们投资获得的平均利润多）。对剩余价值的构成、实现和分配这三方面而言，都市中心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这表现为都市中心性的一个方面。都市中心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然而它的这种根本性还没有得到认识（未被察觉到）。这与认为过去的城市和当代的都市中心仅仅是上层建筑，而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无关的认识相矛盾。

E25

上述的时空轴既可以用来定位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特定关系，也可以用来定位它们的转变。它既不能反映也未包含所有关系和转变。比如，它既未包含与这些关系有关的概念的条件，也未包

含与之有关的要素——自然[物质(physis)]和逻各斯(理性)。它无法揭示自然观念的谱系及其发展。第一章中的图表显示,在欧洲历史上我们现在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期出现了一种逆转。在这一关键阶段,“自然”和“理性”所指代的概念和表象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改变和有关概念的改变之间是保持对应一致,还是发生了扭曲变形?“自然”和“理性”特有的一词多义能以上述历史为基础进行分析和解释吗?也许可以。为什么自然拜物教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出现了先于思想和“人类”活动的自然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通过城市和工业再一次揭示和反映自然而实现的否定之否定吗?从这一刻起,城市表现为石头和金属的第二自然,建立在最初的,也就是由土、空气、水和火构成的原始自然上。第二自然通过诗人(雨果^①、波德莱尔^②)获得了它的词形变化[也可以译作“纵聚合”(paradigme)^③],即它的有关对立体系——光和黑暗、水和石头、树和金属、怪诞的和天堂的、粗糙的和精致的、粗野的和矫揉造作的。这使我们回到我将要在下面讨论的城市的
神话。然而,内在于都市空间中的什么东西试图使自然的和人造的、自然和文化重新统一?没有园林或公园,没有对自然的模仿,没有迷宫,没有对海洋或森林的再现,没有被痛苦地折磨成奇怪的人形和非人形的树,就没有城市,没有都市空间。那么,对恰恰是为巴黎、伦敦、东京和纽约的都市生活品质负责,对它们的广

F38

E26

①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法国作家,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中译者注

②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等。——中译者注

③ 有关该词的多重含义,参看本书第四章(F118/E88)页下注。——中译者注

F39 场和街道网络的园林和公园，我们能发表什么看法呢？这些空间是与其术语——对应的地点，还是几乎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点？它们是一种可能成为别处，表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然的乌托邦吗？它们为都市现实定位和感知自身提供了基本参照点吗？或者它们只是都市积聚的中立要素？这些“开放空间”中的各种功能(多功能的或超级功能现实)怎么了？通过使自身成为虚假的自然、“开放空间”，这种未兴建的空间获得了中立化的形式，难道不正是这种未建成的空间的中立化随心所欲且不自觉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都市总问题式中的这些方面(重要性不次于庸常的“环境”图景且比之更富洞见，因为它们暗含着某种分析)并没有出现在第一章的图表里。然而，它们包含在关键时期中，是其组成部分。以一种隐喻的说法，我们可以把这种关键时期称为空白(空的)或黑暗(暗箱)时期，或者它可以指一个盲域(*champs aveugles*，英文 *blind field*)。在这一关键时期，自然成为重要问题之一。工业化和都市化或联合或竞争，共同破坏着自然。水、土、空气、火等要素遭受灭顶之灾的威胁。到 2000 年，无论是否有核战争，我们的水和空气将被污染得使生活在地球上变得举步维艰、难以维系。

E27 现在已有可能构想一种与通常字面理解的或者马克思所定义的不同

F40 的“社会主义”形式。曾经匮乏的物质现在极大丰富，比如面包和一般食品(在世界上广大的欠发达地区仍然匮乏，但是在发达地区已经过剩)。相反，曾经极大丰富的物质变得匮乏，如空间、时间、希望、水、土和光。除非我们想生产或再生产一切“自然”的东西，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共同面对新型的匮乏。

用这种方式可以确定关于“自然”的部分问题。从理论上讲，

自然正在衰微，然而自然的符号和自然的东西正在增长、代替和取代真正的“自然”。这些符号被大量生产和售卖。一棵树、一枝花、一根枝条、一种气味或者一句话都能成为不在场——一种虚假在场的符号。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驯化成为梦魇。在广告宣传中，无论是食品或纺织品，还是住房或休假，都是不断地以自然为参照。为了提供意义和内容(虚假的)，自然的表象全方位地伴随着修辞学所使用的“浮动的能指”。通过自然拜物教这个中介，一物不再具有一种意义。未被发现的、变动不居的、被破坏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剩余物，从阴柔气质到最平庸之物，自然随处可见。公园和开放空间，即良好的意愿和糟糕的都市表象中的最新成就都仅仅是对自然的拙劣替代，是对邂逅场所、游戏场所、公园、花园和公共广场这些典型的开放空间的拙劣模仿。这种空间被一种可耻的民主化形式中立化，它以广场作为其标志。都市规划专家被动地顺从于数量和最低成本的压力；他认为他已创造出的功能最后变成了“真实的”功能的缺席，变成了一种被动观察的功能。

F41

这是一个关键时期，它犹如暗箱。建筑师和都市规划专家有时被混同为暧昧的二重奏搭档，有时被视为双胞胎或交战的同胞，疏远的同僚和竞争对手，他们检查了那个暗箱。他们知道放进了什么，他们吃惊于结果，但他们不知道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图表不会对他们有所助益。因为它假定城市(都市中心)是创造的场所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或一个发生在别处、在头脑中或者知识分子的创造性行为所产生的简单的空间效果。它设定都市能成为“客观的”，即创造物和创造者、意义和目标。

E28

在时空轴上存在三个层次、三个时期、三个“领域”。这些不

仅仅是社会现象，还是感觉和认知、空间和时间、想象和概念、语言和理性、理论和社会实践：

- 农村(农民)
- 工业
- 都市

F42 它们伴随着出现和干扰，转换，前进和延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均衡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痛苦的转变，即关键时期。时空轴揭示出一些重点和界限，太多理论假设需要证明。但是，两个时期之间发生了什么？在两个时期之间，在中断或交叉（当今，在工业和都市之间）时的转变点上发生了什么？这些飘浮不定的言语层次，尽管是必需的，但由于作为能指而与其所指的工业、理性以及实践相脱节，因而不再是充分的。这些言语分层，在它们的故土游荡徘徊，无法使自己与“哲学主体”“优先对象”或“历史总体”拉扯在一起。我们可以利用从一架飞机上看各种云层的方式审视它们。在大地上轻盈地飘浮着的是古代哲学的卷云、理性的祥云和唯科学主义的厚重的积云。这是语言或元语言，介于真实和虚幻的中间、现实和可能的中间。它们自由地飘浮着，逃离了巫师哲学家的符咒。

E29

各个领域是力和冲突的地带，它们之间存在着盲域。这些盲域不仅晦暗不定、缺乏探究，而且是视网膜上、视觉中心——否定——的盲点意义上的空白，眼睛看不见，它需要一面镜子。视觉中心看不见并且不知道自己看不见。这样的悖论也会延伸到思想、意识、知识吗？过去，在农村和工业之间存在着一个领域——就像现在，在工业和都市之间那样——是我们看不见的。

我们的视而不见是怎么回事？我们聚精会神于新领域即都市，我们用眼睛观察，以概念来理解，然而我们的眼睛和使用的概念已经被实践和工业化理论定型了，我们用在工业化时期就事先设计好的碎片化的分析工具，因此正在发生的现实被简化还原了。我们再也看不清现实；我们对抗它，厌恶它，与之斗争，阻止它的诞生和发展。

F43

都市(都市空间、都市景观)仍被无视。我们仍不理解它。难道仅仅是我们的眼睛被早些时候的风景定型(畸形)以至于再也看不见一个新的空间了吗？难道是乡村空间、大量的工厂和过去时代的遗迹已经养成了我们观看的方式了吗？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些不足以说明问题。不是教育缺失的问题，而是闭塞的问题。我们看事物不全面。有多少人虽能注意到“视角”、角度和轮廓、体积、直线和曲线，但是却不能感知或构想多重路径、复杂空间？他们不能从受工业生产和工业产品消费制约的人为的平日中跳出来看已经摆脱那些宿命和制约的都市。他们无法构建一幅图景，形成或提出一种特定的都市的美丑观念。都市现实，甚至在它开始和确立之前，就被农村(花园郊区，即所谓的开放空间)和工业的平日(居所、社区、各种关系的功能性结构，单调乏味却是必需的路线)，即一种受制于企业需要并按企业理性来对待的日常性简化还原。这种简化还原既包含社会的也包含精神的，趋于平凡琐碎和专门化。总而言之，都市被简化还原为工业。视而不见，即我们的看不见和识不得，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这些盲区将自身牢牢植入再现之中。起初，我们面对事实和各类事实的显现，这是认识和分类的一种方式。紧接着是一种再现，即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在这两个阶段之间以及每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曲解、误解。

E30

F44

那些显而易见(我们教条地接受的假设)和自我蒙蔽(误解)成为我们视而不见的补充,与之相辅相成。

F45 盲域这个概念既不是一种文学描绘,也不是隐喻,尽管它自相矛盾地混合着一个主观术语“盲”和一个客观术语“领域”(它总被认为是被阐释的对象)。我们有几种阐明这个概念的方式,它们可以既是哲学的又是科学的。也就是说,经由哲学分析和通过知性来阐明盲域。^①这个概念和光与影之间毫无意义的区分无关,即使我们考虑到理智的“阐释”有其限度,它不考虑或忽视一些事情,专注于某些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排除某些信息而突出其他信息。而且,还有我们不知道和无法解释的事情。

E31 在盲域之中发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研究赋予其意义。在弗洛伊德之前,性重要吗?是的,性当然重要。原罪和羞耻之心是西方(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原罪和羞耻之心在诗中是完美的典范,至少对于某些诗来说是这样的。所以,赋予它们意义是一种律令。在弗洛伊德之前,性是被孤立、被分离、被贬低和被拒斥的(被压抑的)。它穿过一个盲域,那里住着在持续压力和根本异化之下并无任何具体身份的影子和幽灵。没有什么比“神秘的明暗对比法”更适合于描述这种情况了。

盲域的实质或本质是无意识的吗?请记住,这是一些向探索敞开的领域:对知性来说,它们是虚空;对行动来说,它们是可能性。它们为什么使人视而不见,怎么能使人视而不见?是不诚信、误解以及认识失败(错误的意识和可能错误的意识)在作怪。因此,说它未被认识比无意识更准确。然而,这些术语都不能令

① Cf. J. T. Desanti, *Idéalités mathématiques* (Paris: Seuil, 1968). ——原注

人满意。为什么“我”(或“我们”)不去看、感知或构想些什么?为什么我们假装没看见?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尚存在未开发的(未被占用的)身体区域,包括性。不管怎样,这些盲域既是精神的也是社会的。为了解理解它们,我们必须考虑意识形态的力量(它阐释其他领域或者使虚假领域纳入考察范围)和语言的力量。每当语言辜负了我们,每当元语言过度或过剩(能指与所指相去甚远)时就存在盲域。

F46

这让我们回到视而不见与自我蒙蔽的对比上。视而不见是光源(知识或意识形态)投射一束光照亮了别处。自我蒙蔽是我们茫然地凝视,与此同时那个我们凝视的区域留在了阴影中。一方面,一条路向探索敞开;另一方面,需要打破壁垒,逾越藩篱。

我们可以将三个领域或范围表达为三个大陆的发现、出现和构造或历史性创造——农业、工业和都市。这类似于认识发展过程中数学、物理学、历史和社会的相继发现,这种前后相继已被认识论公认。然而,在农业、工业和都市的前后相继中,不存在当代认识论所理解的“断裂”。不仅仅因为它们同时并存、相互作用,或发展不平衡——因此这些时期(这些“大陆”)才能同时并存,不仅仅因为这种“断裂”观念无助于理解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而且,因为所谓不发达国家当今特征恰恰在于它们同时经历着农业、工业与都市三个历史阶段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积累起问题而不是积累起财富。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时期对应着三重分工,这三重分工可以在每一种社会实践——需要、劳作和享乐——中发现,尽管侧重点略有不同。需要对应着农业时期,这是一个生产能力有限,受制于“自然”条件,间或发生灾祸和饥荒的匮乏时期。劳作对应着工业时期,这是一个盲目迷恋生产力与破坏自然(包括人类的自然生

E32

F47

活)的时期。享乐对应着都市社会吗?这还有待于观察。

三个领域反映的不是某种特定的历史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看法,而是一个(双重的)整体性概念:三个时期前后相继又自成一體。“领域”这个词不仅指连续的或各个层面的事实或现象,也指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

E33
F48

比如,“农村—农民”领域由空间的表象构成,换种方式说,它是由一种空间网格构成的,这种空间网格隐含着方位、标志,能理解位置和命名地点(地名,即用于界定依附于“自然”特性的空间的修辞惯用语)。它采取自发的形式,非常受限于一个共同体的持续不间断的行为。如果没有精神的和社会的特性,没有由一个群体的起源(种族划分、气候、地理构造、被农业活动改良的“自然的”产品,等等)所产生的原创性,它就不会存在。这样一些群体的特性在截然不同却又倾向于对立的两种活动——巫术和宗教——的融合中获得了最初的表现形式。它们需要巫师和牧师。通过他们的合作,简单的循环和节奏(日复一日、季复一季、年复一年)发生于伟大的宇宙循环之内。一种直接的想法,也就是关于当前阶段的想法(发生在此时此刻,今天或明天需要做什么)被整合进一种更广阔的思考方式中,这种思考涵盖一生和一生中的大事——出生、结婚、死亡、葬礼——以及世世代代这样的人生。巫师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牧师照管的是整个世界。尽管若干个世纪以来农村—农民领域是基本的和占统治地位的领域,但它只有在其征服者、在政治城市的行政管理者对其产生影响之后才初具规模。这些古代城镇只能是一种政治存在,统治着被河流环抱、养育,偶尔被淹没的乡村世界。政治城市还不是都市,它仅仅是一种预感。尽管政治城市也是作为农民共同体被建立起来的,带

有浓重的环境印迹，但是这两部分社会的(基本的)劳动分工早已成形。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与将适时发展起来的其他对立联系在一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生产和贸易、农业和工业。这些对立起初是互补的，之后几乎是矛盾的，再后来则相互冲突。农村先对应着部落制，后来是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不动产)形式。城市对应着其他财产形式：动产(最初很难与不动产区分开来)，手工业主的财产，资本家的财产。在史前时期，各种要素和形式混合在一起，随后土崩瓦解并相互斗争，成为历史。

工业领域替代了自然，或可能的自然，它以有条不紊地和系统地强加其上的同质性为特征。这种强加是以理性、法律、权威、技术、国家和掌管统治权力的阶级的名义完成的。所有要素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合法地建立遵循商品逻辑的普遍秩序，即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世界”。间或有人问起，社会主义是否能避免政治经济学的统治？理性普遍化的规划逐渐在其面前创造出一个虚空。它在被其效率摧毁之前已精神崩溃。因为它空洞无物，它创造了一个盲域。这项普遍理性的规划都包括什么？它延伸至所有活动，它们成了实验，即劳动的工业分工。在企业内部，劳动被分割开来并组织起来，这样劳动可以在其产品或劳动本身没有到市场流通时就已完成。工业时代最大的挑战是，一项总是重复进行但从未完成的工作，已使工业分工的效率扩展至劳动的社会分工。劳动的社会分工强化(然而并非总是不断被理性地组织起来)，直到分割开来的活动仅仅是枯燥无味、毫无意义的。这种社会分工既适用于物质生产性劳动，也适用于非生产性却是社会所必需的劳动(智力型劳动、科学劳动)。分工破碎得如此剧烈以至于由占支配地位的宗教、哲学、国家或科学统一

F49

E34

F50

E35

(综合)人为地叠加于“原则”、法律和事实的尘埃之上。社会实践的普遍组织结构即时空组织，看起来完全是理性的，因为它是由秩序和强制构建起来的。实践试图实现和总体化的同质化的时空，它里面充斥着对象的尘埃、碎片化的活动、情境以及情境中的人们，这是一种堆积，其一致性只是表面上的，尤其是因为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运用专横的系统化才得以形成的。

实际上，人们对“工业城市”心存疑虑。它真的存在吗？在某种意义上它存在，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它不存在。它是一个幽灵，是都市现实的影子，是通过强制重新统一的分散的要素和外部要素的光谱分析。不同的逻辑正面交锋，而且有时发生冲突：商品逻辑(扩展至试图以消费为基础来组织生产)、国家和法律的逻辑、空间的组织(城乡规划和都市规划)、对象的逻辑，即日常生活、语言、信息和通信的逻辑。因为每种逻辑都想成为具有约束性的和完全性的，它消除了一切不适宜的并声称要统治世界的剩余物，所以它便成了空洞无物的同义反复。按照这种方式，通信只传播可传播的。但是所有逻辑和所有同义反复会在某一时刻彼此相遇。它们共有一个空间——剩余价值的逻辑。城市，或它遗留下来的，或它将会成为的，比它本身更适于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的积累、实现和分配。然而，这些逻辑和同义反复否定自然。这种否定不是抽象的，也不是思辨的。通过拒斥特殊性，工业理性真正破坏自然和与“自然主义”有关的一切。这带来了困扰，即一种意识、思想和语言的第二态。

F51

E36

号称整体理性(整合并成为整体)的分析性思想需要中介才能有效地运转。因此，理性目的统治的重要性随中介性质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这种理性是根据适用于企业的组织过程与运转的误导性应用得出的。它把部分任务委托给其努力获得自治的社会

F52

援军——官僚主义者、商人、政论者和广告商。因为普遍的错位和分离司空见惯，所以从意识形态、消费和理性的主导中获得的满足总伴随着一种普遍的萎靡不振。一切都变得可计算和可推断、可量化和可转换。一切都必须是通过强制而强化的秩序(貌似真实的和虚假的)的一部分——除了其混乱和自由的剩余物，它们有时被默许，有时被势不可挡的强制力捕获。正是在这一时期，“历史”加快了它的进程，剥离了所有特殊性，去掉了任何特权和差别，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人。这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期，一旦战争和革命似乎在对国家的狂热崇拜和生产拜物教中实现自身时，战争和革命就会流产，这个时期本身就是货币和商品拜物教的实现。

这些重大事件通过都市来完成。我将试图说明这是一个新领域，我们对它仍然陌生且知之甚少。在这一新时期中，曾被视作绝对的理性、历史、国家和人类，现在变成了相对的。可以说，实体、崇拜物已经死了。这种断言有一定道理，但这些崇拜物的死不可一概而论。“人”的死只影响哲学家。国家的终结总是悲剧性的，因为它是道德和家庭的终结。反思总被这些戏剧性场面弄得神魂颠倒，它把目光从摆在其面前的领域移开，对这个领域仍旧视而不见。为了探究这个领域，我们必须改变，放弃之前的观点和视角。在这一新时期，差异为人所熟知而且为人所认可、掌握、构想和符号化。这些与自然分离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空间的和时间的差异在更高层面上，即思想能把握所有要素的层面上得以解决。都市思想(不是都市规划)也就是都市社会的反映，集合那些被历史建立起来和分离开来的内容。它的来源、起源、大本营不再局限于企业之内。它具有不期而遇、同时性和聚合的都市形式的具体特征。通过这种方式，它再现共同体和城市，不过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不同的范围内，并且是在它们碎片化(否

F53

E37

F54

定)之后。它恢复先验现实的各种关键概念并在更广泛的语境中重建形式、功能和都市结构。它由重建的时空构成,这种时空是一种不同于农业时空(周而复始和并置的地域特殊性)和工业时空(趋向于同质性,合理的和被规划的强制统一性)的布局。一旦我们不用工业理性——它的同质性规划——去规定它,都市时空就表现为差异,每一处和每一时刻只在一个总体中存在,通过对比和对立使之与别处和其他时刻相连并与之区别。这一时空既显示为一元性(整体的:由围绕一个中心形成的整体、群体构成,由富于变化和具体的集中构成),也显示为二元性。比如,街道可以被视为具有一种开—合(*coupure-suture*, 英文 *incision-suture*)的二元性。我们还应该在不割裂定位与交换、信息传送与物质商品运输的情况下学会区分它们。为了界定都市差异空间(时空)的这些特性,我们需要引入新的概念,比如同位空间(*isotopie*, 英文 *isotopy*)、异位空间(*hétérotopie*, 英文 *heterotopy*)和乌托邦。同位空间指的是一个处所(位置),以及围绕着它(邻近区域、最接近的环境)的一切^①,即让一个处所成为同一处所的一切。如果在某处有一个同

E38

① 同位空间(L'isotopie)指“一种语义范畴,它使得从整体上理解一个故事成为可能,这种理解是在清除了言语的模糊性之后对其进行部分理解的结果,而这种清除活动是为了追寻一种唯一的理解”(Algirdas Julien Greimas, “E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e l'interprétation du récit”, in *Communication*, No. 8, p. 30; see also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p. 96)。因而,这个概念便和理解都市空间(和铭刻于这种空间中的时间)联系起来。这种空间在城市的镜像中以及城市的地图上清晰可辨,可通过多种方式加以辨识。它促成了不同的词汇和不同类型的话语,正如它积极诉诸经由城市而形成的不同方法。“同位空间”这个术语及其相关术语“异位空间”表明,通过将多元的话语和词汇安置于一处进而将它们集合起来是适宜的。这些经由城市而获得的方法能促成具有不同形式、功能和都市结构的众多话语。谁正在讲话?谁正在行动?谁正在进入空间?答案是处于社会关系(所有制、生产、消费)中的主体(个体或集体)。对同位空间和异位空间的描述应结合对这些主体行为和情境的分析,以及对这些主体与占据都市空间的对象关系的分析。这会导致人们对促成都市空间人口的在场—不在场,对作为乌托邦的他处(一个没有位置的处所)的发现,毋宁说是重新认识。——原注

质的或类似的处所，那么它就是这种同位空间的一部分。然而，就在“这个处所”旁边，是一个不同的处所，一个别处。

是什么使这样一个处所与众不同？它的**异位空间**，即通过参 F55
照原初处所来定位它（定位它自身），标记出它的差异。这种差异
能从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一直扩展到一种冲突，扩展到要把一个
处所的占有者也考虑在内。这些处所在都市综合体中彼此相关。
这便假定了存在一个中立的要素，它包含着并置之**地**——街道、
广场、十字路口（街道和小径的十字路口）、花园和公园——的开
合。当前，尚有一个别处，一个没有处所并且为其自身寻找一席
之地的**无处**（non-lieu）。垂直度，即在任何一个水平面上竖立起
的高度，能成为异域的维度，这些异域是以存在一**缺场**为特征的处
所——神、权力、半潜在半现实之物、崇高的思想。类似地，地
下深度即一种反向的垂直度。显而易见，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
与一种抽象的虚构毫无共同之处。它是真实的。它恰恰位于现实
的中心，这种现实就是没有它做酵母就不会存在的都市实在。在
都市空间中，别处既是处处，也是无处。自从有了城市，自从出
现了特别是使人们（个体和群体）与神、权力或那些虚构联系起来的 F56
情境以及对象和活动，便是如此。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矛盾成了日常的对立物。纪念碑的**雄浑壮丽**扩散着、
辐射着，浓缩起来、集中起来。一个纪念碑远远超出自身，超出
其外观（假设它有一个外观）和内部空间。一般来说，高度和深度
是雄浑壮丽的一部分，即充溢着其物质边界的空间的一部分。在
古代世界的城市里，一切都逃不过这种雄浑壮丽，因为它是复数 E39
形式的，不止一种（宗教建筑、政治建筑、宫殿、适于演出的聚会
处所和露天体育场等）。因此，无处谈起的——神、陛下、王族、

正义、自由、思想——却随处可见。当然，不是没有矛盾。

都市空间乃是具体矛盾。研究都市的逻辑和形式属性也就是辩证地分析它的矛盾。都市中心达到饱和；它要么走向衰落，要么迅速扩张。偶尔，它会掉转方向，用空虚和匮乏把自己包围起来。在多数情况下，它假定并主张世界上(实际上也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集中：大地的产物，工业的产品，人类的作品，对象和工具，行为和环境，符号和象征。这些表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都可能变成中心位置，汇集之地，特许之所，以至于每个都市空间内在地具有这种可能—不可能性(possible-impossible)，它自身的否定，以至于每个都市空间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集中之地，而且是多中心的。都市空间的这种形式引起和激发了集中与分散的进程：人群，庞大的积聚，撤离，突然倾泻而出。都市被界定为人们的漫步之地，在这里，人们发现自身直面成堆的对象并置身其中，人们体验到他们活动的威胁纵横交错，直到难以辨识，人们卷入复杂的境地并由此产生意想不到的境况。都市空间的这种定义相当于一个零向量(潜在的)；距离的取消时常萦绕在都市空间居住者的心头。它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的象征性想象，它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在地图上，在偶遇和聚会的狂热中，“甚至在城市中”加速的享受中。这是(真实的、具体的)乌托邦。结果超越了封闭的和开放的，间接的和直接的，近的和远的秩序。在差异的现实中，这些术语不再是分离的，而成为内在的差异。(有选择地)朝向具体的、统一的思想会重新利用那些已经被提升至差异层面的独特性：地方的、区域的、国家的、种族的、语言的、伦理的和审美的。尽管有通过技术来实现同质化的努力，尽管有专断的同一化的构建，尽管存在着分离和隔离，但没有任何一个都市

空间与另一个都市空间是相同的。我的分析可能看上去有点拘泥于形式。事实上，它适用于纽约和伦敦，也同样适用于巴黎。它是阐明都市社会的一种方式，它通过其内在的辩证法沿着一条新路拓展了过去和未来。通过这种一元的和差异的思想，我们很可能将会进入一段不再属于历史的时期，一个独特性相互对峙的时代，那时，同质性正与异质性斗争。集会、偶遇和聚会（尽管它们不是没有明确的冲突）将会代替分离的要素和现在自主的要素之间的斗争。在此意义上，它是超历史的。

F58

因此，被视为领域的都市不只是一个用对象来填充的空洞的空间。如果视而不见，它便不会出现，仅仅因为我们不可能看到这些对象而且空间显现为空的。不，都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充满张力的领域，一种潜在，一种可能—不可能性，吸引了那种已完成的、曾更新的且一直苛求的在场—不在场（presence-absence）。视而不见在于我们不能看到都市的形态，内在于这个领域的向量和张力，它的逻辑和辩证运动，它的内在需求。我们只能看到事物、运转、对象（以一种完全娴熟的方式发挥作用和/或进行表意）。关于都市，视而不见是双重的，它的空虚和潜在为丰盛所掩盖。问题在于所谓的都市规划之丰富多彩仅仅起到了更加无情地揭示这种视而不见的作用。而且，这种多姿多彩借用了前工业化时代的对象和产品以及工业活动和技术。都市被遮盖；它逃离那些使自己失去判断力的思想，并只迷恋于远离现实的明晰性。

E41

这种存在于工业与都市之间（相对）的不连续性被掩盖，而且被误导性地掩饰（正如它们曾经并且仍常常来往于农业和工业之间）。如果对工业及其可能性和需求的视而不见没有存在过，那么我们是不是还会允许它通过浸满鲜血的历史侵入这个世界，毁坏

F59

自然，在星球上播种恐怖和丑陋？我们是否还会无限信任它的合理性？这些考虑似乎是空想——而且它们就是！但无论是圣西门^①还是后来的马克思都相信并强调，我们能控制和引导工业化进程。他们不满于通过将它丢进暗处或简单地阐明它来理解一段被视而不见的进程。今天，都市的实体本身，以及它的问题和实践被称为“都市规划”的（意识形态的和制度的）表象所隐藏和代替。这个名称可填满这个洞，装满中间物。我将在后面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②

F60 工业(实践和理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和都市混淆的结果是，在活动的等级制度中一个从属于另一个，都市被视为一种效果、一种结果，或一种手段。这种混淆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它导致都市亦即都市规划伪概念的生产，工业理性的应用，以及都市理性的撤离。

这种(艰难的)转变是方法论和理论的，和它是经验的相比，即使不是更甚，也是一样的。

E42 每个时代都有其权威主义形式、改良主义形式和革命形式。我们也可以说，每个时期、每个时代、每个领域都有它自己的异化和非异化形式，这些形式以它们专有的方式相互冲突。在第一

① 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克劳德·亨利德鲁弗鲁瓦伯爵圣西门)，1760年10月17日生于法国巴黎一个贵族家庭，1825年5月19日死于巴黎，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中译者注

② 借用概念和术语，我们可以说，都市(相对于其模糊性逐渐被揭示的都市化)出现于地平线之上，慢慢地占据了认识论领地，进而成为时代的知识。历史和历史性渐行渐远。正如经济学和政治学，精神分析和语言学已达至顶峰，而且开始衰落。都市开始崛起。重要之事不在于对这些所熟知的处所、领域和位置进行分类，而在于影响它们的运动。我们可将这种活动称为“理论的实践”，但是它与断言自己就是标准并弃置“生活”和实践的科学主义毫无共同点。——原注

个地方即农业领域，在历史上家庭制和家长制社会成长和发展起来(奴隶制似乎是一种积极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封建制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越来越重要(至少在欧洲，封建制是建立在领土的基础之上的，诸侯是封地“明显的”的主人，是一个或多个村庄的头领)。由于农业结构普遍转向财产的集中，历史留下了无数革命运动的印迹，如地方的或普遍的造反，农民起义(jacqueries)^①，打家劫舍，由不同的、通常是神秘的意识形态所引发的自卫队组织。最后，联合的或竞争的封建地主控制的财产的集中，和随后的与这些封建地主联合或斗争的资产阶级控制的财产的集中，导致了

F61

农业改良工程。对于土地的普遍需要和巨额财产的转让推动了将改变整个社会的革命运动，如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 年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

工业化时期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公司所有者或老板式的家长制。有时(即使到了现在)，宗法社会(农民)和家长制(工业工人)相互重叠且彼此强化，导致了理想国家元首的产生。因为工业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资本积累，全部国家资源的使用，某种把公司理性延展到国家生活方方面面的计划组织形式)，所以它产生了矛盾的政治后果——革命和权威主义，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相互作用的两种进程一致。工业化进程的结果即革命与改良已纠缠在一起，这种现象体现了那个刚刚结束的时期的特征。

E43

那些向都市时期转变的征兆已开始自我呈现出来。都市的家长制四处蔓延，尽管被它之前某些时期所显示的样子所掩盖。那些行使权威的都市“显贵”具有工业之父和工业领袖的威望。都市

^① jacqueries 泛指农民起义，特指 1358 年法国北部农民发动的扎克雷起义(Jacqueries)。——中译者注

F62

改良将清除源自私有财产（并因而源自投机买卖）的奴役的土壤，它已具备一种革命的要素。整个欧洲大陆正从革命行动的早期形式向都市游击战转变，向影响都市生活和组织（除非能忽略或解决叠加其上的工业和农业组织的问题）的政治目标转变。都市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

因此便确认了这样的假设：三个领域在历史时间上是相继的。我应该补充一点，新近一段时期，即当下正形成的一段时期同时作为这种领域，更确切地说是先前存在领域（农业的和工业的）的催化剂和分析家。它关注并促成那些令人模糊和混乱的特征。它通过重新激活它们（比如在南美洲）来澄清未解决的冲突和矛盾。因此，工业化的兴起以及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揭示了农业（和封建）社会的特征，揭示了被某种浑浊的透明物所掩饰的关系，而对于这种关系，人们“经历”着它们却不理解它们。

F63

E44

这种社会（被认为是家庭和邻里关系）的等级制度、剥削（被认为是保护性关系，从属于作为“裁判者”的封建领主掌控的共同体）显示出其本来面目。同样，今天都市揭示了工业，而工业显现为一种与高度改进的剥削形式相配合的等级制度。（都市）决策中心使我们当场（sur le terrain，拉丁语“in situ”）理解这些复杂关系。决策者们将等级关系投射到土地之上，与“决策者”的有组织活动形成鲜明对照。而“决策者”受到拥有并管理生产资料的那些人的支持，后者作为“主体”被动地接受这种统治。而且（尽管这里不是全面展开这种观点的地方）在工业化时期并未经历危机的社会，无疑将在都市化时期经历危机，因为这两个序列的原因能叠加、结合或抵消。通过运用这些概念，我们可以研究美国、南非、非社会主义的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当前境况。

在这个广阔的变迁历程中，空间显示了它的本质，即它作为政治空间，是各种战略的场所和对象；作为一种时间规划，对抗时间并使我们能支配时间，最终使其物尽其用，正如当今我们所做的那样——这预示着时空的解放。

第三章

都市现象

从此处开始，我指的不再是城市而是都市了。由于在第二章已经介绍了都市的概念及其潜在本性，现在我想在“真实”的语境中对此现象加以分析(这里就“真实”一词所做的引用反映了如下事实，即可能性也是真实的一部分，并赋予真实方向感、某个目标和一条清晰的通往地平线的道路)。

F64/

E45

今天，都市现象以其规模让我们感到吃惊；其复杂性远非我们的理解工具和实践活动手段所能胜任。它不断地提醒人们关注**复杂化**(complexification)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日益增强。这一复杂化理论源于所谓的自然科学和一般信息理论，但已经朝着社会现实与我们对它的理解方向走来。社会关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即便在古老的社会也是如此。笛卡尔关于原始简单性的图式和经由简单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性，应该被放弃了。复杂化理论看上去似乎是哲学的甚至是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但事实上是有一系列科学论点做根据的。每种现实都包含着可以通过分析来揭示的“要素”。这些现实有其内在秩序(连续性与一致性)，但呈现给我们的却处于某种无序状态，即屈从于过剩的信息(如秩序的重复、分组的重复，后者预先由互不相关的单元或分类的要素组成)。因为信息能够带

F65

E46

来某种令人惊讶的要素和不断增加的多样性，一种来自于新的可理解形式的无序，一种新的冗余，一种不同且更复杂的瞬间秩序。^①

F66

都市现象基于描述性的方法，而各种描述性方法本身千差万别。生态学描述某个“定居地”、居住区域、邻里单位、关系类型（主要是邻里中的关系，次级的或派生的是一个存在于放大的空间中的关系）。现象学的描述更为精细，它考察城市居民与场所之间的关系；它研究环境、空间的悬殊性、纪念碑、都市生活的运动与边界。经验性描述强调形态学，它精确地估量人们在一个都市框架、一个特定的城市、一个大都会（*megalopolis*）内所看的与所做的，这是一个分散的都市，形成了包括都市功能在内的管理与政治整体，甚至当旧的形式与结构已经消失的时候。

以上描述方法揭示了都市现象的某些方面、某些特征，主要是其庞大性与复杂性。但这些方法是否能使我们更接近这种现象？超过了某一点后，描述不管如何详细，都证明是不充分的，而且形态学和生态学的边界很快就可以达到。描述无法解释特定的社会关系——相对于给定之物和“有生命”之物显然是抽象的——它们表现为具体的但仅仅是直接的。这些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和交换关系以及市场关系（虽然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市

^① 都市中心展示出如下特征：在都市的清单上同时存在的要素（物与人）在基于某（冗余的）秩序的边缘领域内被固定与分割，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序与最大限度的信息。这创造出了既与外围相背也与流入的风险和威胁相干的复杂化。对这些现象的分析性与形式化即数字化研究，要冒着掩盖集中化辩证法的危险。并不存在单独的自足的中心或充足的中心。饱和使其不再可能。它把我们直接引向一种差异化的中心、一种差异性的集中。——原注

场)。这些关系既是易懂的也是难懂的，既是可见的又是不可见的。它们被投射到各种场所的景观中——市场、股票与商品交易、劳动交换等。它们的投射能使我们识别那些联系，却无法掌握它们。一旦它们在此层面上被掌握，都市现实便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外表。它变成了各种市场的总和、各种市场的聚集中心：农产品的市场(地方的、区域的与国家的)、工业产品市场(就地或在周边领地上接收、生产、分配工业产品)、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屋出租市场、土地开发市场，以及艺术品市场和知识、符号与象征物的市场。

E47

F67

但仅用通道和交换场所等单个的事实来界定都市是远远不够的。都市现实不仅与消费、“第三产业”的活动以及分配网络相关联。它介入生产与生产关系中。在此层面上，与描述相关的制约性阻碍着思想。这样就回避了这个总问题式，避开了中心与集中化等关键问题，默认了中心地位的衰落和精英权贵地位的加强。这里意识形态悄然地取代了描述。我们需要从现象学过渡到分析，从逻辑学过渡到辩证法。为了让你多少知道在这个层面上进行分析的困难，我想提及法国都市社会学研究所实施的研究^①。该研究试图把都市现象分解成不同的因子、指标和指数。它开始于宏观信息(每英亩土地上的居民数、建筑物的年头儿等)，然后慢慢移向越来越多的细节(生育率、合格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等)。确认的指标达到 333 个之多。虽然已经尝试过越来越出色的分解，但分析仍停留在这种任意的数字上。

^① 列斐伏尔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在此机构(Institut de Sociologie urbain)从事研究与领导工作。——中译者注

E48 把数目简化为大约 40 种最典型的指数之后，数据组变得难以处
F68 理，甚至在计算机上也是如此。围绕着整个社会实践领域，都
市现象呈现为一个整体（甚至一个**总体**）的现实。这种整体性无
法被直接理解。通过一系列层面与步骤逼近这个整体，这是一
个方便得多的门径，但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在每一步上
我们都会冒着陷入各种阻碍与迷惑之中的风险。伴随着每一次
前进，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油然而生，而这立即被转变为某些
还原论的和局部的实践形式。在经济空间的表象中，在通过把
社会发展并入工业增长中，让都市现实就范于一般规划从而让
特殊都市空间消失，在这些发展表象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总
体化意识形态（它反映了有害的实践）的最好例证。空间政治只
把空间视为同质化与空洞的中介，其中我们安置物品、人、机
器、工业设备、流通与网络。这种表象基于一种受限合理性的
逻辑学之上，并促发了一种通过简化摧毁都市和“栖居”的**差异
空间的战略**。

每门专业科学都从整体现象上切下一个“领域”或“领地”，
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阐明。在分割与阐明之间做出选择毫无意
义。每门科学又进一步碎片化为专门的二级学科。社会学被细
分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农村与都市社会学，等等。碎
片化与专门化的科学运行是分析性的；它们是分析的产物并以
自己的方式运行分析。对于被视为一个整体的都市现象来说，
E49 地理学、人口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提供了一种分析
F69 程序的结果。我们也不应低估生理学家、医生或心理学家的贡
献，以及小说家和诗人的贡献。地理学研究了某种聚居的场所
及其在区域、国家或大陆范围内的情境。除了地理学家以外，

气候学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与动物学家也提供了关键的信息。人口学研究人口的起源、性比例、生育率、增长的曲线等。经济学家(无论是在都市现实方面还是一般增长现象领域的专家)研究什么呢?他们可不缺乏研究对象:都市语境中的生产与消费、收入分配、阶层与阶级、增长类型、人口的结构(积极的或消极的,第二等级或第三等级)。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于特定聚居地的起源,那些已经影响其发展的事件与制度。如果没有前进性与回溯性的(在时间与空间中)分析,如果没有多样的分化与碎片化,就不可能构造出**都市现象**的科学。但这种碎片物并不能构成知识。

碎片化科学中的每一项发现都会导致对总体现象的一种新的分析。这种总体性表现的其他方面或要素得到了揭示。如下情况并非不可能,即我们可以从层级相互作用(动态平衡)理论出发,用更加合理的概念,而非陈旧的有机论及其幼稚的目的论,来界定都市现实。基于形式化的图形(树状的与格状的)理论来阐发都市空间的模型并非不可能^①。就方法论而言,我们在研究空间的矛盾及其内容之前,使用空间的**形式化**属性来着手研究都市现象,便已是一种被推荐的方法,即辩证的方法。语言学近来业已取得了一系列进步,这一系列进步使语言学将自身与**符号体系**(与意义体系)的概念联系起来。什么也不能妨碍我们以此方式或由此观点来思考都市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城市与都市现象的符号意义与意谓是丰富(或贫乏)的

F70

^① 参见 Christopher Alexander 所著的文章,载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1967), No. 1。——原注

E50 这一事实无动于衷。城市与都市现象构成一个体系(由符号规定,而这些符号可以当成语言模型那样来使用,无论是雅各布逊式^①的或者是叶尔姆斯列夫式^②的,还是乔姆斯基式^③的)已然成为一种信条。不过,符号体系概念并不包括都市现象。虽然其中会有城市的语言(或城市中的语言)或都市话语和“书写”,因此有符号学研究的可能性,但城市与都市现象不能被归结为

F71 要么是孤立的符号(言语的或相反的)体系,要么就是符号学的。**都市实践**充满这些局部概念,因而充满局部理论。在其他事物中,这种实践教会我们生产那些我们出售和消费(例如房地产的广告修辞学)的符号与意义。另外,在城市以及都市现象范围内似乎不可能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符号和意义体系,倒不如说,这里有多种在多个层面上的体系。它们包括日常生活的模型(物品与产品、交换与使用的符号、商品的调集与市场、栖居以及“定居”的符号与意义),作为整体的都市社会的模型(权力、力量以及作为整体或分别加以考究的文化的符号学),特殊化的都市空间一时间(城市的标示性特征的、它的风景和外观的、它的居民的符号学)的模型。在都市空间中,如果只有单独一种与物品和行为相关联的符号体系,它将会变成支配性的;我们从来无法逃脱其权力的掌控。但我们如何进入其中呢?不管被运用

① 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 1896—1982),俄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诗学家、莫斯科语言小组的领袖。——中译者注

② 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Louis Trolle Hjelmslev, 1899—1965),丹麦语言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中译者注

③ 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 1928年生),美国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上最伟大的成就。——中译者注

于都市现实符号学中的限度是什么，仍然值得关注的是，近来科学发展揭示了这种现实的一些新的方面。由此观点来看，我们的研究刚刚开始。它提出了一些我们无法将其从“都市总问题式”中分离出来，但需要加以区别的问题。

我们不妨从常规的观点来考虑言说行为、事件。自从索绪尔以来，我们是把话语(言语)视为语言和作为体系的语言的表现加以分析的。实际表现(事件：我对某人说话)包含着作为其前提的体系存在，即体系的潜在性存在。使沟通成为可能的——即沟通行为作为一连串操作(编码与解码)——是一组规则：语音学的、形态学的、语法学的、词法的、符号学的。这些规则能够使我们构造与生产可理解的阵列(句子)。这样的阵列是共同性的，与之相反，行为(事件)则是个体性的。阵列具有严密的形式(体系化的与易理解的)。不过，这种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都已研究过的体系化阵列，控制着不曾完全体现于其中的行为(事件)。无论我们处置的是某个普通的单词系列还是某个精妙的短语，体系都是一样的。说话者或许是在无意识地使用它，但他们未必忽视它。所造的句子具有许多非常不同的特征(表达、互相依赖、逻辑联系或可感觉的实际性参考物)。所有说话者都知道他们的语言。他们无须刻意地指定规则，而是按照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使用规则。这种体系化阵列有效的条件是：此体系在效果、行为、事件各个层面上并不在场，尽管它显然是不同程度地在场。在行动中，该体系在这个既在场又不在场中发挥着作用。言说的“主体”，即日常说话者只有在对什么是决定和形成他的话语的东西——具有词法(paradigmes)和句法(syntactignes)结构的语言体系——茫然不知的情

F72/

E51

F73 况下，沟通才是可能的。一旦他开始想到这些，他就进入了元语言的领域，然而仍知道要为话语的质量负责。体系隐蔽自身以避开我们的意识，然而它却或多或少，或好或坏地谈论自身。这种必要的隐蔽不可能是绝对的，而理解使其大白于天下、公之于众。偶然的，所谓对于语言来说是真的东西，对于音乐来说也是真的东西。作为感觉或情感，话语的效果绝不包含关于（和声与作曲）体系法则的知识。

E52

难道我们不可以沿着这些线索来构想都市吗？难道我们不可以把都市当成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潜在事物吗？在此意义上，语言学有助于分析都市现象。这倒并不是说都市就是某种语言或符号体系，而是说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一种秩序，在此意义上它们可被赋予语言学的方式。

F74 我们可以尝试着采纳把都市与盲域理论同差异性分析相联系的方式。但我们应当保持警惕，不要忽略把语言设想为一个差异性要素体系（严格地被其差异性决定与限定）的局限性（正如早期研究所表明的）。在这种理论主张中，所有意义都来自差异化的过程，其要素（互不相干的构成单元）是通过它们的对立或联合而非其本身（除非它们准备进入这个对立面与联合方的体系之中）获得特定意义的。在此意义上，音素（声音，在西方语言中归属于字母）与符号是任意的，正如词汇一样。这导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索绪尔和特鲁别茨科伊（Trubetzkoy）^①及其门徒所

①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Nikolai Sergeevich Trubetskoi, 1890—1938)，俄国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中译者注

阐发的理论，即假定意义是由已经赋义的单元之间的联系构成的^①，这种理论能够成立吗？

索绪尔的假设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规则，依此规则，分析是建立在基于对象的内在差异之上的，我们可以清晰地分解和重构这个对象。对于已经被赋义的单元，这一规则是否适用？“生活经验”的材料即社会实践，它与用来表达它的话语之间的（几乎已经被制度化了的）距离能否得以填补？现实与其描述或转述之间的距离呢？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可能，也就是说，当已经被赋义的元素组成新的对立，进入到已经被规定好的序列之中的时候。不过，这同样适用于都市吗？都市聚集的要素来自于乡村或工业。它是否给它们填充或强加了某类秩序？那些已知的对立——中心与边缘、开放与封闭、高与低——能够建立起都市范式或语法吗？很有可能。只有深度分析可以告诉我们，距离与话语之间确立起来的关系是否有效，抑或证明这样一种形式结构的重要性及其局限性。极有可能的是，如果我们想把都市作为一个差异性的场域（时间—空间）来理解，我们不得不改善差异性概念，像语言学家阐发的那样。

E53

F75

这种复杂性使得跨学科合作具有了实质性意义。被视为一个整体的都市现象不可能通过任何一门专业科学获得理解。即使我们从方法论原则的角度假定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愿意放弃自身，而且每个专业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其所有的资源去理解

^① 这是把后索绪尔主义语言学与索绪尔模型运用到神话与神话学、文学、故事等理论中的最大一块绊脚石，特别参看列维-施特劳斯与罗兰·巴特的著作。这就是需要其他模型的原因。——原注

这种整体性的现象，这些科学也无法声称自己能够穷尽关于它的所有知识，也无法对它进行控制。一旦我们认可或建立起这种方法论原则，困难便出现了。有多少人没有觉察到那些由所谓学科间和多学科的努力所导致的失望和挫折呢？这些研究的幻想，以及围绕它们的神话，已经受到了大量的批评。参加学术研讨会者在目的各不相同、彼此缺乏任何共同基础的情形下发言；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术语学上的。换言之，是语言的问题。他们很少能在其使用的词汇和术语上达成一致，在基础概念上的一致甚至会更少。他们的假设与理论绝大多数是相互对立的。对立与分歧被误认为是成功。讨论绕开了有争议的话题。假定他们真的成功地在讨论“对象”上达成一致，他们也很少遵守公认的规则：在不违背逻辑的情况下，用定义项代替被定义项。

F76 / 一旦我们着手考虑个体研究者试图将信息加以综合这一事实
E54 实，方法论与理论上的困难便增加了。不过，所谓跨学科研究依然是开放的，或者说是外露的、空洞的和不能令人信服的。它经常只能使自己被某些人为的综合因素纠缠。确实，都市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性现实**，迫切需要人们把那些零碎的知识片段汇总起来，而且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专家只能从自己研究领域的观点出发，用数据、术语、概念与假设来理解这一综合体。他们固执己见，对此毫无意识，而且越是有能力，就越是固执己见。如此一来，就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中阶段性地产生了一种科学的帝国主义。每位学者都觉得其他“学科”是他的辅助者、附庸或仆从。他在科学的赫尔墨斯教派和混乱——学术的巴别塔——之间摇摆不定。在跨学科的会议上，没有隔阂地保持独特性，或者没有混

合地保持统一性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参与者不得不在某些观点上打住，研讨会和讨论会——还有学术界的认可——不是无限制的，所以结果通常是某些平庸的妥协。趋同性消逝于距离之中。

都市现象是普遍的，因此，创建那些致力于分析研究这个课题的大学便具有充分的理由。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需要坚持绝对凌驾于其他类型的已经机构化的——人文、艺术和科学——研究与学科之上。需要的是某个院系能集中现存的学科来分析都市现象：数学（统计学、集合理论、信息理论、控制论）、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这就要求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因为如此一门学科将会建立的基础，并非是已经获得的和该学科能调配的大量知识（或被误认为是知识的东西），而是某个总问题式。自相矛盾的是，目前，特定的知识统一体只能围绕着并列的问题集合体被创造出来。获得的知识已经开始碎片化了；它在我们手里粉碎，尽管认识论者好心好意地努力（他们只是致力于把脑力劳动分工的临时结果汇总到知识的小“核”里）。不过，这样一种机构的地位——大学或科系——并不是非常清楚的。从外面看，这种计划看上去很有吸引力，然而有一系列障碍需要去克服。在某个机构中，我们恐怕难以在偶然举行的专家会议中，把那些偶然出现的事物再现出来。事物产生时我们如何才能使专家确信，他们需要克服自身的术语、词汇、句法、思考方式、行话、职业偏见、蒙昧主义倾向，以及作为一方主人的骄傲自大呢？帝国主义依然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今天在语言学家、人种学家那里看到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学中曾看到的那种帝国主义。为阻止专家们为一己之私而试图去

F77

E55

F78

拔高他们的学科，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不会玩弄权术，他很快就会沦落到沉默和服从的地步。创办一个都市规划(或“都市学”“政治学”)院系的打算，并不能够阻止我们屈从于跨学科研究的神话或某些终极论综合的神话。研究此类东西并不会产生奇迹。创办这样一种院系，其本身并不会保证对都市现象进行详尽无遗的分析。况且，会有这种分析吗？会有任何针对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分析吗？

E56

某种特定的科学越是进一步推动它的分析，它就越是暴露出某种剩余物的存在。此剩余物逃脱了它的掌控。虽然是根本性的问题，但它能做的仅仅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去接近它。例如，经济学家面临着一些逃过他注意的“事物”，于他而言，这是一种剩余物。然而这种逃之夭夭的“事物”是心理学、历史学等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数字与尺度揭示出并不是其中组成部分的戏剧性问题，专家们并不过问这些事情。虽然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会关注这些戏剧性问题，但他们并不会彻底探讨这些问题或者将其还原为某些确定的和有定论的知识，归结为已知的与可分类的概念。政治的合理性与非理性，对于社会工作，即工业中的生产性活动来说具有真实的意义。数字与戏剧对于都市现象来说，将仍然是更真实的。这种现象的科学只能产生于一切科学的趋同。

F79

不过，假若每一门学科都成功地引入某些剩余物，那么它们很快就会变得不可还原。它们的差异性反映在此种不可还原性之中，质疑任何形式趋同的可能性。要么我们肯定都市现象的不可还原性(这是相对于被聚集起来的碎片化的科学，以及“人”的科学与“社会”的科学而言的)——这并非没有风险，要么

我们把人类(一般而言)、社会(一般而言)或者都市现象看作剩余物的整体。这在理论上是饶有兴味的,不过会卷入各种类型的风险之中(例如非理性主义)。问题仍然是:我们如何把碎片化的知识转变为完整的理解?我们如何确定这种对总体性的需要?

我们还能假定都市现象的复杂性并不是某种“对象”的复杂性。(某科学的)某个对象的概念经受得住仔细的考察吗?很显然,这比“区域”或“场域”概念更精确且更严格,但它带来了意义的复杂性。因为对象是自我展示或被展示的,这一点是真实的,都市现象先在于任何观察。可以说,没有对象便没有科学,没有科学就没有对象。然而我们是否能够说,政治经济学探究、拥有或者创立了某种可孤立的对象?社会学或历史学呢?我们是否能够说,都市经济学、都市社会学,或城市历史学有其自身的对象?对我而言是没有的。特别是自从仅仅作为历史实体的“城市”对象存在以来。

E57

同样,假定我们把都市现象或都市空间理解为由一些对象——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心理学,或者地质学等地球科学——组合而成,这也是不合理的。科学的对象概念虽然方便、易上手,但它是有意简化的,而且可能掩盖了别的意向:碎片化的策略被设计用来促进一体化与综合化,从而被用来巩固权威、模式。即使被设想为关系的系统,即使这些关系与另外的系统相联系,对象也是孤立的。系统的意向性被掩饰在科学对象的“客观性”本质的外观之下。这个被追寻的系统通过建构自身来建构其对象。被建构的对象因此将系统合法化。关于这方面让人烦恼不已的事情是,眼下正考虑的系统会

F80

标榜自己是某种实践。城市的概念不再与某种社会对象相对应。从社会学上来说，这个概念是伪概念。不过，城市有一个不可能忽略的历史性存在，小城市与中等城市在一定时间内将会出现。这种城市的镜像或表象会使自己永存，使其条件幸存下来，推动一种意识形态与都市规划。换言之，“真实”的社会学“对象”是一种镜像和一种意识形态！

F81
E58
今天，都市现实看上去更像是一片混沌与无序——尽管一种秩序掩盖着某种隐秘的秩序——而不是某个对象。所谓都市规划的地盘或角色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有一批都市规划者，其中有一些是建筑师。如果他们对都市秩序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就不需要一门科学。他们的都市规划已经包含着这种知识，他们掌握着对象并将其纳入活动的系统之中。如果他们对都市秩序并不熟悉（无论是隐匿的还是已经被定型化的秩序），他们就需要一门新科学。那么，都市规划究竟是什么呢？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声称要整体化，却模棱两可与不完备的实践？一种包含着技术要素并依靠权威部门加以确立的体制？抑或是一具沉重的、不透明的躯体，一个道路上的障碍物、一个错误的模型？我们有理由问这个问题，并期望有清楚的、通过充分事实加以证明的答案。

都市现象的现实性，与其说是一个可以通过沉思来考察的对象，不如说是一个潜在的对象。如果有一种社会学概念，它就是“都市社会”。然而，这个概念并不能局限于社会学。都市社会，连同其自身所独有的秩序与无序，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这种现实包括方方面面的问题，即都市总问题式（*la problématique urbaine*）。但这种现象引向何处呢？这个正引领

着社会生活的都市化过程在哪里呢？它所包含的整体的或局部的实践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对该过程既做理论上的理解，又提供实践性的指导呢？倾向于什么呢？这些是都市规划师所面临的问题，而他们求助于专家来获得答案。但专家并没有答案，至少肯定没有直接的答案。

为了实现整体性，为了克服其不一致性，社会实践要求综合。例如，工业实践主要通过规划与计划已经实现的高度一致性
F82
与效率。都市实践假定它会循此路而行。不过，跨学科研究要想分析性地前进，就必须避免伴随着综合之路的错误，特别是必须避免外推法(extrapolation)。然而理论家与实践者，企业家与使用者都要求综合。我必须再次强调，就此问题而言，综合
E59
不可能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任何其他专家的工作。但是，作为实践者，建筑师与都市规划师皆声称可以避免其专业的帝国主义而尽其职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画图？因为他们拥有一定的技能？因为他们贯彻实施规划与项目设计？几乎不是。事实上，他们屈服于上文提及的情况。专门技能的帝国主义、制图与制图师的帝国主义，再好也好不过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帝国主义。知识并不能等同于技能或技术。它是理论上的、暂时的、可改变的与可商榷的。或者它什么都不是。不过，总有“某些事”和某些人会如此。知识摆脱了“全有或全不”的两难抉择。技术官僚们希望能够对某个特定的技术或局部实践(例如，交通的循环，商业的运转，或信息的传播)进行综合，但当它们被概括出来时，马上便四分五裂了。
F83

我们能够为计算机提供某个特定问题的全部数据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机器只能使用以“是”与“否”为答案的问题构成

的数据，计算机本身也只会对问题做出是与否的回应。此外，谁能够确保所有数据已经凑齐了呢？谁将保证这个数据大全使用的合法性呢？谁将证明“城市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语言——是与算法语言(ALGOL)、语言结构(SYNTOL)，或公式变换语言(FORTRAN)、机器语言一致，并且这种翻译不是一种背叛呢？这种机器难道没有冒着变成掌握在压迫集团与政治家手中的工具的风险吗？它不是已经成为那些掌权者以及服务于掌权者的人的武器了吗？

E60 为了综合我们可以使用预测。但预测是从已知的事实与趋势——已知的秩序——进行推断的。不过，我们知道都市现象的当代特征在于其所处的临界情境，其中我们无法将其等同于任何程度的确定性，即要么是一定的趋势，要么是某种秩序。如果我们已经识别出研究的要素，那么我们应当以什么为基础做出预测(即一系列有关未来的调查研究)呢？我们之前曾提出完全都市化的假设，即反映了我们正在进入的临界期的假设，F84 那么，这样的努力会把什么东西增加到这种假设中呢？在什么意义上，一种预测(*prospective*)要比那些由碎片化科学认可的交叉线暴露的远景(*perspective*)更准确、更具体呢？

我们知道，这种碎片化(专业化)知识趋于整体性，而且不论其声称什么，它所生产的只是局部的实践，而此实践也声称整体性(例如对都市的公路与交通的研究)。这种碎片化的知识来自分工。理论领域的分工(科学的与意识形态的)具有与社会领域的分工相同的功能与层级。不过，我们需要把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加以区别。前者由仪器与工具、企业中的生产活动组织理性地合法化，后者引起了不平等功能、特权、等级，与阶

级结构相关的一切、生产和所有制关系、制度、意识形态。技术分工是模仿企业形成的。而社会分工需要中间媒介，这对于市场与交换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中的分工，连同其框架和装备、规范与价值，以及相应的等级，被转变为(科学的与文化的)机构。这些机构各自独立并制造混乱。因此，知识建立在不同机构与一种实体即文化之上。这些处于社会分工中并由社会分工所创造的机构(也就是这些在市场中被创造的机构)-反过来为市场服务，它们依需要而定，通过适应它而使用它。它们踏踏实实地为脑力劳动分工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其中，它们以技术分工的“客观”要求掩人耳目，把部门与领域、程序与方法、概念与理论之间存在的“技术”联系转换成声望与收入、行政与管理功能的等级制。这项巨大的工作建立于分工之上，通过约束它们而使其得到强化。在此条件下，我们又怎么可能实现(哪怕是希望实现)总体性呢？这种科学与文化机构的运行会扩展到直接的市场需求和要求的满足之外，但其“创造性”却从来没有逃脱出与这种市场联系的意识形态范围。而这又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呢？像机构一样，它们是**上层建筑**，是在特定时代即工业化时代，在同样确定的社会框架(竞争的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内被阐发或确立起来的。在一段时间(即以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占主导地位为标志的长时段)内，竞争资本主义一度试图适应工业化上层建筑。最近，虽然新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无法容纳社会的都市化，但是其仍做着这种努力。然而，通过尽其所能地强化幻觉与外观，某特定机构将努力接管总体性，与此同时出现的只是在某些巴别塔式的混淆中的制约性分工与重组。至于趋近

F85

E61

F86

E62

都市社会，这不正是现在**都市规划**的角色功能吗？古典哲学与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能够通过保持其与（技术的与社会的）分工和碎片化知识之间的距离，以及保持其与这种理论现状相关联的内在问题之间的距离来实现这种功能。与之类似，几个世纪以来，大学声称，通过与古典哲学和传统人文主义合作可以接近整体性。但它不再可能继续实现这种“功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帮助组织、培育并与之相适应，它把劳动的社会分工制度化。这种功能不是已经指派给今天的大学了吗？难道不是为了使其自身与生产性劳动的社会分工相适应（即与不断增长的市场的迫切要求相适应），脑力劳动与知识的技术分工才形成的吗？科学（与都市现实一样）已经成为生产资料，并在此过程中被政治化了。从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中产生并随之强化的哲学，尽管与这种分离相对立，不是仍然自称为一种总体性吗？

F87

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状况。在某种意义上，抽象思想看上去已经成功地经历了最难以忍受的考验；它似乎在我国的“思辨的圣星期五”^①（黑格尔语）与古典哲学中的逻各斯终结后，回到了生活里，遍布科学之中。圣灵降临节会给人带来更多的惊喜。专业知识分子收到了来自圣灵的语言学礼物，而这种语言学扮演着科学之科学的角色，即一个已被哲学抛弃的角色，它应该已经将宗教排挤出去了。工业化的实践表现为一种虚假的统一，表现为一种混乱，它并没有把碎片化和任意分割的行为排除出去，工业化的实践显露出它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继续把自己显现为与古典哲学、

① 圣星期五，即耶稣的受难日。——中译者注

思辨的发展相抗衡的力量。实证主义者紧紧抓住科学事实与方法论。他们忠于事实与线索，这些很容易在概念中发现。他们怀疑理论。实证主义有物理学的、生理学的、经济学的与社会学的，即物理主义、生理主义、历史主义、经济主义、社会学主义等。难道没有一种都市化的实证主义？它接受与巩固现存事实，没有质疑地承认它们，甚至一次次地把任何形式的质问推到一旁，难道这与技术官僚主义无关吗？对于实证主义思想而言，无论其借以开始的发现物产生于分工还是解释，不管在它前面有没有“对象”，与它都是无关的。作为现有的科学或技术的一部分存在的事实，被分类和特殊化处理。不过，实证主义从来无法阻止从经验主义向神秘主义，或从语言的精确性向专业行话(或多或少有点神秘难解)的跳跃。此外，这种趋势与羽毛丰满的帝国主义并非不相容，而按照这种趋势，哲学不再有意义，或者从未有过意义。专家肯定科学排他性的合法性，不理睬其他“学科”或将它们还原为其自身的学科。逻辑数学的经验主义便是如此，它努力把数学模型强加到所有科学之上，对这些科学特有的概念进行非难。例如，经济决定论排除了任何层面的现实，除了与政治经济学和增长模型有关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多年来对语言学模型的兴趣不断增加，似乎语言学已经成了唯一确定的模型，似乎这种模式能够从其最初的环境中移植出来，可被授予其他学科(心理学或社会学)，俨然拥有一种认识论地位。似乎词语的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科学，因为一切事物都可用词语来表示！

E63

F88

事实上，以上解释在哲学中找到了自己肥沃的土壤；它已经(或仍然)是哲学，虽然并不是作为古典哲学加以理解的。每

E64

F89

当实证主义试图扩展其财产(它所拥有的领地)以及活动范围时,每当它威胁或侵略其他领域时,它便会从科学转移到哲学。它有意或无意地使用**总体性**的概念。它放弃了碎片化的、分化的、分析性的东西。一旦我们坚持综合与总体性,我们就可以通过使古典哲学概念(总体性、综合性)从其得以产生与形成的语境和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进而将古典哲学进行拓展。这对于体系、秩序、无序、现实与可能性(潜在性)、客体与主体、决定论与自由、结构与功能、形式与内容等概念同样适用。这些被科学知识转换的概念能够从他们的哲学发展中完全分离出来吗?在此意义上,我们进入了**元哲学**领域。

F90

哲学一直以总体性为目标。但每当哲学试图倾其所有资源达到或实现总体性时,结果总是失败的。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迷失在思辨的抽象之中。然而正是哲学支持着这个范围与视野。其他领域则是从哲学这里借用总体性概念,它们随时从某些已经获得的知识形式中推导出它们以为是终极性的知识,并试图从这些知识形式中得出某些普遍的法则。诚然,哲学家与哲学依靠自身将会一事无成,但如果我们失去了哲学还能干什么呢?我们难道不应该把整个哲学领域和科学的理解都运用于我们对都市现象的理解过程中吗?因此,当我们从“人类的”存在方面考虑问题时,我们就可以从正在到来的都市社会中发现它的进程、轨迹地平线特别是它的实现或失败,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哲学及其历史沿着该轨迹,设想出某种作为规划(是谁的呢?)的差异形式。哲学设想的这个化身,正是工业和正在形成中的工业实践所表明的东西。是什么阻碍了哲学设想拥有的与城市和城镇之间的意义联系,才使得元哲

学像都市社会从解体的城市中浮现出来的方式一样，从哲学中脱离出来的呢？作为专业化的、建构的以及体制化的活动，这种沉思不会低于哲学或者在哲学之内，而是超出了哲学——这正是元哲学的定义。

元哲学被定位于哲学之外，它便能从那些与作为一种(学术性的与文化的)体制的哲学相关的制度性话语中脱身了。自黑格尔以来，哲学即变成体制化的了；它是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公共服务，而其话语只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元哲学废除了这种奴役状态。“元哲学”这个高深莫测的词语的确切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一个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相对应的词汇，虽然是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这种元哲学思想并不把概念专门放到既定的哲学或体系之中考虑，而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概念总是被放到整体的哲学之中来阐述。这些普通概念恰恰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指认与列举它们：理论与实践、体系与总体、要素与集合、异化与非异化。

E65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重建古老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自马克思与尼采以来就备受牵连，处于最严厉的理论批判之下。问题在于，都市社会是否允诺了一种新人本主义的阐释，使所谓的工业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非资本主义的)与古代社会有效地区分开来。这种从哲学出发并经由元哲学的沉思所提出的追问，一直有可能以新的失败而告终。都市总问题式不能事先否定这种可能性，即使它不再陷入旧唯心主义关于忠诚与抗争的范畴之中。

F91

哲学的精神能够提供什么？首先是那种激进的批判精神，其次是对碎片化的科学的激进批判。这种精神反对一切教条主

E66

义，不管是总体性的教条主义还是不在场的教条主义，反对那些碎片化的科学，后者要么组合在一起并且试图解释一切，要么退缩到某个被割裂开来的“对象”之中，退缩到某个“区域”“场域”或“领域”“系统”之中，仿佛它们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似的。激进的批判也定义了一种方法论和理论上的相对主义，一种认识论上的多元主义，它深刻地影响了这些“对象”(包括为了特定的研究而产生的并由此建立起来的全集，因而也包括被当作“全集”来考查的都市现象)和那些通常是临时建立起来的模型。

F92

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保证绝对的“科学性”，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特别是在社会学中(不管是不是都市)。即使数学与语言学也不能保证一种完美的和最终意义上的严格的方法论。虽然有各种模型，但其中没有一种会完全令人满意地实现，没有一种可在部门之外被推广、被转移、被输出、被输入，它们在部门内部被建构而没有练就相当重要的防备能力。可以说，模型的方法论仍在继续，而且改善了概念的方法论。每个局部科学都有其特殊的概念，但其中没有一个能够通过追踪其轮廓而完全确定一个对象。一个对象的有效实现包含相当大的风险；甚至是那些分析者建构对象，也只是临时性的和被简化的。因此，许多模型不能建构起一个严密的、完备的整体。

对一般模型的建构，尤其是具体模型的建构，不乏批评之声。只有当我们使用时，模型才有价值，而对它的使用在于就模型之间的差别以及模型与现实之间的差别做出衡量。不是建构模型，而是批判性地反思，给出一个方向，开辟诸多道路，并展现出一条地平线。这就是我要建议的：与其建构一个都市模型，不如为通往都市开辟一条道路。科学，或者说许多科学

正在按照我们修建公路或者围海造田的方式前进。怎么可能存在一部科学的“全集”(科学主体),即独一无二、确定不移的特殊“身体”或不可更改的核心?建构这个躯体将意味着把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概念研究混淆在一起,并因而运用那些可证实的和可证伪的假设,^①这种假设一旦被形式化和公理化,它就可以被修改,并且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成分。那些通过论证而得以确立的东西会发生变化,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其中包含着从它们的纯正性中提取出来的公理和形式。激进的批判早晚会把每个模型中的意识形态揭露出来,甚至包括“科学性”本身之中的意识形态!

E67

F93

今天,哲学方法可用于摧毁目的论(*finalisme*)。始于哲学,更确切地说始于形而上学的传统目的论在面临批判的攻击时分崩离析了。从历史生成论的方式来看,倘若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东西了。没有预定的目标,也就没有已经由神或因其名所实现的目标,没有由某种理念或绝对精神所实现的目标,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已经是真实的)对象而设定的目标。反过来,也没有已经被规划好的目标的先在不可能性,因为某种目标已经被合理地称为行动与生成的意义了。没有什么综合可以预先被实现。没有什么原初的与最终的总体性,相比较而言,任何相对的情境、行动或瞬间都是被异化的一异化着的(*aliénés-aliénants*, 英文 *alienated-alienating*)。另外,不存

^① 参见 Cf. R. Boudon, *A quoi sert la notion de structure*, 第 191 页及以下内容。——原注; 并参见 R. Boudon, *The Uses of Structuralism*, trans. Michalina Vaughan (London: Heinemann, 1971)。——英译者注

在任何与迫切需要、意志和总体的观念相矛盾的东西，也不存在任何封闭地平线的东西，除了这种异化的—被异化的 (aliénante-aliénée, 英文 alienating-alienated) 态度，后者是一种例外的存在，从理论上与实践上说是一种物的存在。都市(都市社会)并不是预制的目标或历史的意义，这里所言之历史正朝着意义迈进，其本身被预制(由谁预制呢?)，用来实现该目标。都市社会为工业化提供了目标以及意义，但仅仅是在以下程度上，即前者由后者引起，前者包括后者，并指导它朝向某些另外的事物。朴素的历史性不再是一个合目的论的形而上学的概念。那么总体性又是从什么地方出现的呢？把古代哲学沿着一个新的平面进行扩展的某种战略与规划中出现了它。因此，哲学家(或者说元哲学家)不再声称提供目的、综合与总体性。他向历史的与社会的哲学挑战，犹如他向古典形而上学与本体论挑战一样。他出面提醒我们总体性的要求，也就是说，接受碎片化与肯定分离化是不可能的。针对一般合目的论，以及经济决定论、唯社会论和历史主义这些特殊的合目的论，他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决定论批判。哲学一旦变成了元哲学，它就不再表现为某种已经克服或消失的现实——“人类”。它指向了一条道路、一个方向。虽然它可以提供概念工具以开辟一条通往地平线的道路，但它不再是时间展开之地。它揭露了总问题式及其内在矛盾的限度，特别是自我肯定、自我发展与自我转变的合理性和某种古老的、正在崩溃的目的之间的关系。然而，合理性似乎隐含着目的论，而且其关于宇宙的思辨构想事实上确实包含着目的论。如果合理性应当从思辨走向整体理性实践，从政治合理性走向社会合理性，从工业合理性走向都市合理性，那么

F94/

E68

它只能通过克服这种内在矛盾做到这一点。目标是什么？终点在哪里？它们正在自我构思、自我规划和自我宣布，但它们只有去适应最全面的战略才有可能成功。

目前，关于人类、人以及人道主义的讨论重复了被马克思与尼采用来反对古典哲学及其推断的论点。在这些争论过程中提出的标准，即理性一致性的标准，将会被和谐与“人的尺度”所取代，这种尺度显然是与需要相符合的。今天的社会如此混乱，以至于它迫切需要一致性。不过，仍需证明具有一致性是否就已足够。通往某种形式的人道主义的道路已经被打开，它将在某些都市社会中并通过都市社会加以重建。理论正在打开一条通往这种新兴的“人类”之路，通往事实与价值之路。这种“存在”有各种需要。有必要对需要进行分析。这并不意味着此种建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心理学或工业合理性之上的需要哲学，是可以加以阐发的。恰恰相反，对需要的“实证”研究旨在构建需要并对其进行分类，取代“实证”研究知识通过分析建筑实践与工业意识形态中的错误与缺陷建立自身。一种间接的与否定性的方法难道不比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更加恰当吗？如果说存在着“功能化”的需要，就会有許多欲望，它们横跨在那些内接于物和语言的需要之上。只有在经济命令、社会规范和“价值”的基础上，需要才会被征用、接受与分类。对需要的分类与命名因此具有某种偶然性特征，而矛盾的是，它同时又是制度。制度是在这些需要上创建出来的，它们对需要加以控制、分类，并将其结构化。优先于这些需要的是情境化的、整体性的，然而还是模糊的，是一种并非物的“某物”，如冲动、意志、欲望、生命能量、驱动力。为什么不把“本我”“自我”与社会的

F95

E69

F96

“超我”这些名称各异的术语，表达为本我的欲望、超我的制度以及自我的调和呢？是什么妨碍着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再一次冒着退回到需要哲学与欲望本体论的危险，而这样做却是漫无目的的。

E70 对我们日复一日的体验与谈话再次加以审视，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生命开始于童年，然后进入青春期，接下来是成年。早熟与不成熟趋向于成熟，然后是生命的终结。成熟抑制着人的发展，是我们的死亡许可证。从这种现在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基于都市(栖居)考察的辩证人类学中，会发现其出发点以及这种胎化(fœtalisation)理论[鲍克(Bolk)]之中的生命科学的支持^①。产卵类物种的后裔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一旦卵被孵化(通常数量很多)，几乎完全成形的幼体便需要自力更生。浪费是巨大的。胎生保护着幼体，然而一旦出生，它们便无法照顾自己。当后代既是未完成的、弱小的又是可教育(即“可塑造”的)，它就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幼年期与青春期。这种不幸在可教育性中有一个对应物，在此也有不少问题。性成熟也不代表完全成熟——无论是生理性的还是社会性的，但性成熟是在先的。F97 这会导致骚动不安(已经被精神分析学家研究过了)。人类群体既包括不完备的人，其中一些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未确定性)，也包括成熟的人或完备的人。我们如何构成某种栖居形式，使这个群体生活下去？这个从人类学角度构想的问题是由栖居(建

^① 列斐伏尔提到的辩证人类学及其基本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荷兰解剖学家路易·鲍克(Louis Bolk, 1866—1930)。他概括出一种“胎化”理论，并据此认为人类的发展保留于其祖先的幼稚特征中。与那些灵长类祖先不同，人类特征被假设为永久性的胎儿状态。——英译者注

筑)提出来的。这种观念有意地拒斥哲学上的目的论,此目的论主张人类将从分裂性的矛盾中解放出来,提升至一种先定的和谐,这种目的论仍然可以在今天自我满足的世界观中被发现,如正统马克思主义、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追随者以及人道主义神学所提供的世界观。我们知道,人类的缓慢成熟导致其对家庭、房屋、栖居、邻里关系与都市现象的依赖,这暗含着可教育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令人吃惊的可塑性。这种成长与发展并不同步的存在物,既有急迫的需要也有可被延迟的需要。此存在物中包含着某种东西,使存在物与它的前身相同,使存在物与它的同类物既相似又有差异。存在物的不幸成就了它的伟大,它的不协调性和机能障碍驱使着它向前,走向尽头。它从未摆脱这种含糊性。需要与欲望的戏剧性与冲突性特征具有人类学的要素。这种仍未确定的科学只能通过把矛盾引入思考之中,辩证地加以建构。人类总会有积累与遗忘的需要,还有对安全与冒险、社交与独处、满足与不满足、平衡与不平衡、发现与创造、工作与游戏、言说与沉默的需要,无论是同时的还是相继的。家庭、寓所、寄宿之所、公寓、邻里、广场、城市以及聚居地都在对这样或那样的需要做出回应,然后或继续做出回应,或不再做出回应。关于家庭“环境”、工作“环境”、“功能性框架”或“空间性框架”的理论,无非是教条主义的巨兽,它们冒着风险从供应给它们的人类幼虫中创造出怪物。

E71

F98

目前的(社会的与都市的)现实揭示出一系列基本需要,它并非直接地而是通过对这些需要采取高压性的控制、过滤、制服和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在事后才揭开它们的面纱。这些需要的发现姗姗来迟。我们从现在知道过去,而不是从过去

知道现在，这样便以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方式将历史性加以合法化。马克思早已在其著作中清楚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过程。辩证的人类学可以从都市总问题式中发展出来。反过来，这种知识会为总问题式以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资料。但它不能要求独自阐明或解决所有问题。这种知识是相关学科的一个要素，它并不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地位。

F99 这种性质的人类学将把古代哲学的各个要素汇总在一起。从它们那里能学习到什么呢？我们能得知存在着某种“人类的物质”，此物质虽然受(生物学的、物理学的)规律支配，但它并不假定在所谓的社会或人的现实中有任何先在的形式。不过，它

E72 被赋予了超常的可塑性，以及对可教育性和可适应性的非凡感受力。这些被构想的形式，似乎能够按照各种各样的假设与可能性来塑造这种物质。这些形式在不同层面上起作用。在可能的限度内，都市现实不也向我们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吗？

最顽固不化的专家也不会小觑合理性的运用。他们不会对如下事实置若罔闻的：如果没有哲学，理性的概念是无法想象的，即使哲学的理性仅仅是合理性的一个要素或因素。由于主张理性是脱离语境的绝对存在，所以我们将其支离破碎并把它打造得坚硬无比。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且不是没有争论的(参看下面的图表)。多年来，理性已经呈现出一连串不同的形式。希腊思想(亚里士多德)详细阐述的**逻辑理性**后来被**分析理性**(笛卡尔与欧洲哲学)以及**辩证理性**(黑格尔、马克思、当代的研究)所继承。每种形式都起到了批判其先驱的作用，但并没有摧毁它们，这导致了种种新问题的出现。与之相似，哲学理性被西方传统发展，紧随其后的则是**工业实践理性**(圣西门、马克思

等)，而工业实践理性最近则被新兴的**都市理性**所取代。在某个社会而非思想语境中，**意见的合理化**已经让位给**组织的合理化**，后者必须吸收关于目的性和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与关于**合理性实现**的有关问题。说到目的性与意义，**抽象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与古典主义的)已经能够维持其意识形态存在，但只有通过**屈从于批判的人道主义的**审察才行。这反过来生成一个充分发展的(朝向总体性迈进的)、**具体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第一阶段与人类的想象相对应，这是一种由哲学所呈现与代表的**抽象的规划**。第二阶段与人们对目标、意义之存在的**觉醒**相对应。而在第三阶段，**全面性**(已完成的、相对性的、“总体的”)的概念与意志得到了发展。

F100

E73

理性与合理性

逻辑——哲学的——意见
 分析——工业的——组织
 辩证——都市的——实现

人道主义

抽象的人道主义——想象与规划
 批判的人道主义——挑战
 发达的人道主义——目的性(规划)

空间(社会的、都市的、经济的、认识论的)并不能提供形式、意义或目的。不过，常见的是，空间被展现为某种**准则、规范或优先的形式**，这些形式已获得知识分子的一致同意，甚

F101 至发展为科学的一部“大全”。然而空间仅仅是一个中介、环境或手段，是一个工具或媒介。它或多或少是得到认可的。它从来不具有“自在的”存在，而总是指向其他事物，指向存在意义和本质意义上的时间，它超出了哲学的规定性，也指向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因为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无论他们生活得好坏，空间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善”；因为它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但这与哲学或知识分子——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都没有什么关系。“时间—空间”(或者你更愿意使用“空间中的时间”这种表达)变成了知识的对象。它是通常所理解的某种具有确定轮廓的对象吗？肯定不是。那么它是一个社会学的对象吗？也许是。但这只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可能性，因为某些因素并不相符。如果赋予空间绝对的优先性，那么这种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内在于社会之中的社会关系，在此社会中某种特定的合理性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控制着时间的绵延。这种形式简化了时间性，甚至摧毁了它。意识形态与科学相互融合。这种关系变成了一个颠倒的世界的一部分，一个也需要“用脚立地的”世界。^①

E74

我愿意暂时回到那些碎片化的科学上来。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它们呢？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里有几个假设：

F102 第一，**趋同性**。趋同性是在跨学科会议上所表达的希望与神话。它假定我们能够在熟悉的领域范围确定趋同性，

^① 这里列斐伏尔使用的是马克思的著名比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中译者注

仿佛它是公路的交叉口。但这个交叉口不可能被规定，也永远无法到达。如果趋同性存在，那么它也存在与地平线之上，在远景之中。但我们仍需确定如何“把事物放到远景之中”。在此时此处，我们不是朝向传统的“人类”，而是面向重新思考过的与重新建构起的新兴都市社会“人类”。

第二，**整合**（对碎片化的学科所规定的碎片的整合）。用什么来整合呢？用某些已经变成显学的学科知识吗？这是无法接受的。用某种**实践**吗？这里的**实践**概念在面对激烈批判时将会瓦解。如果它不是阶级战略，便只是一种求援，一件可延期的事情。而可能的失败变得更加可能，乃是由于特定的、令人不安的先例，比如：**经济主义**的失败，一种基于碎片化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与实践。

第三，**实用主义**。这指的是对某人或他人（例如社会学家）在此处或彼处所提供的信息的使用。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科学性转变为它的对立面——缺乏严格的标准。

第四，**操作主义**。这是实用主义的变种。与其相伴的是技术官僚制与官僚制意识形态，以及随之产生的神话。人们探寻的只是操作的概念。此概念的有效性不再被证明。我们把自己局限于要求它们拥有分类的能力上，也就是某些**管理能力**。有时候，我们把它们推得更远。操作者与掌控者在行动上是一致的。

第五，**等级化**。是谁打算建立评估体系呢？又是谁主张社会学比地理学或人口学更有价值呢？规范将变成机构及其对手的规范，变成自由竞争的最后踪迹。知识分子会把通向科学之城的钥匙交给政治家。他们将做出决定；他

E75

F103

们将按照政治家的意向与要求宣布什么是规范的，什么是不规范的，这将导致普遍的失范状态(反常的、病态的)。在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层面概念可被用于支持我们的论证。但如果每个专家都占据着等级中的某个层面，优先权和级别高低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个问题至少是很麻烦的。

第六，**实验主义**。分析家暂时解剖了“抽象的”对象；他们借助于不同的描述进行研究，而这些描述暂时被视为辅助之物。他们因此把对象与该领域中的实验(测验)相比较。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在其中我们要放弃总体性和总体性诉求(如果不是对象的话)，因而也要放弃目标及其意义。总体上，我们失去的是目的论以及我们孜孜以求的严密性与合理性。我们冒着在抽象的乌托邦主义与短期的现实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风险，和在非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犹豫不决的风险。我们也冒着把决策的权力转交给其他人的风险(而他们甚至是值得用名字来识别的)。

F104
E76

理性地讲，以上观点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不过，它们也确实揭露了某些内容：不可能让这些(身处碎片化科学中的)专家围着一张桌子坐在一起，在桌子上放一个“对象”以供理解或解释。在他们当中，最能干的人是最不可信赖的。设想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把如此专业化的、分散的知识汇总起来，分析潜入带有歧义的词汇之中，而这些词汇是基于已经被分离、被特殊化和限定化的“观点”之上的。

还能做什么呢？我愿意再一次提出都市战略的概念。该概

念包含政治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区别，日常实践与革命实践的区别，换言之，包含着一种**实践的结构**。社会实践可以作为**工业实践与都市实践**加以分析。这项战略的首要目标是把社会实践从工业实践上剥离下来，使其朝着都市实践方向前进，以便使后者能够扫清那些挡在其道路上的障碍物。

第四章

层次与维度

都市现象使人们所熟知的两个方法论概念——“维度”(dimension)与“层次”(niveaux, 英文 level)显得尤为突出, 就像在当前都市现象的分析中(或者说都市现象反对这种分析)所呈现的那样。在关于城市与都市的混乱的话语中, 在混淆于文本和语境、层次和维度的话语中, 这两个概念有助于建立某种秩序。诸如此类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清晰的代码(并列关系的或重叠关系的), 帮助我们破译信息(都市现象可被视为信息)。这些概念在都市文本与书写过程中起到词项(lexies)[读物(lectures)]或地图和“都市事物”的作用, 这些都市事物可以被感受、观看到并在环境中显示出来。这是否意味着有对都市文本的地理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的解读? 极有可能。显而易见, 借助这些概念来整理事实并不排除其他话语形式、分类法、解读以及序列(地理政治学的、组织层面的与管理层面的、技术层面的)。前面简要讨论了趋同的问题(至少是临时做了讨论)。 F105/
E77

历时性地看, 在空间—时间轴上, 我标出了(但不强调任何绝对的区分)新兴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通常含糊地被称为“社会”)所达到的层次。简而言之, 乡村的、工业的与都市的社会鳞次 F106
E78

栉比，鱼贯而入。我现在愿意为最后这个术语^①构造一个共时性画面。以当今的社会来看，我将其区分为：**整体性**(*global*)层次，用字母 G 表示；**混合性**(*mixte*)层次，用字母 M 表示；以及**私人性**(*privé*)层次，即栖居层次，用字母 P 表示。

权力——作为意志与表象的国家——在整体层次上起作用。国家与人民的权力作为掌握着权力的意志，是与政治战略或各种战略密切相关的。作为表象，政治家们拥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空间的概念(或者没有任何概念，而为他人腾出地方，以推动他们进行特殊的时间与空间的想象)。在此层次上，这些战略与各种逻辑相伴随，我们视这些逻辑——虽然有所保留——为“阶级逻辑”，因为它们总体地构成了一个战略，一个被推向其最终结论的战略。沿着类似的线索，我们也可以讨论“社会—逻辑”^②以及“观念—逻辑”^③。政治权力利用了(意识形态的与科学的)工具。它具有行动能力且能够对资源、收入以及由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剩余价值)的分配进行调整。我们知道，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在使用两个基本战略——**新自由主义**(它可以使那些私人企业以及与都市规划相关的开发商和银行家的创造性发挥到极致)以及**新干预主义**，后者强调(至少表面上如此)都市范围内的计划，鼓动专业技术人员与技术官僚的干预，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干预。不过，这些战略没有一个是无懈可击的。新自由主义给“公共部门”以及政治服务的活动留

F107

① “这个术语”，即指都市社会。——中译者注

② “社会—逻辑”，socio-logique，也可译作社会学。——中译者注

③ “观念—逻辑”，idéo-logique，也可译作意识形态。——中译者注

下了一定的空间。新干预主义谨慎地侵入“私人机构”。更有甚者，多样化的部门与战略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存在多种趋势，计划的集中化甚或是农业的社会化、住房的自由化、工业的(有限)规划、对资本运动的谨慎控制，等等。整体性层次适合最为普遍的、最为抽象的(虽然是本质上的)关系，如资本市场与空间的政治。这使得它对实践—敏感性(pratico-sensible)与直接性更具反应能力。社会的(政治的)与精神的(逻辑的与战略的)整体层次同时把自身设计为建筑物领域的一部分，如楼舍、纪念碑、大范围的都市规划、新城镇。它也把自己筹划为非建筑物(non bâti)领域的一部分，如道路与公路、普通的交通与运输组织、都市组织与中立性空间、“自然保护区”。这是一个与我称为制度化的空间相关的层次(还有其必然结果，即制度化的都市规划)。这个层次主张，即使没有某个或多个明确的行动体系，至少也有某些体系化的活动形式(或“协调的”活动，即被体系性地加以引导的活动)。国家层次上的逻辑、一体化的体系的可能性表明，旧的城乡差别正处于一个消失的过程中。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过时。而我们必须得问，声称承担着该使命的国家是否真的能够将其贯彻到底。(产品、资本与劳动本身的)市场隐在其中的劳动的社会分工，似乎不再自动地发挥功能。它要求更高的组织化权力，即国家的控制。反过来说，这个权力，这个至高无上的机构，倾向于使其固有状况永久化，倾向于维持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正如它要维护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分离，以及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可能性分离。这岂不是把新的矛盾引入国家结构之中了吗？作为意志，它超越了城乡的分离。这会导致它强化决策中心，把都市中心变成权力大本营。这样

E79

F108

E80 一来，同时也使现存的都市化与整个发展去中心化，把国家分割为区域，其中某些区域将被挑选为停滞之地、恶化之地，以及回归“自然”之地。因此，为了实现整体的同质化，国家或许会组织一个不平等的发展过程并加以利用。

F109

M 层次(混合的、中介的或中间的)是独特的都市层次。通俗来讲，它就是“城市”层次。假设我们能够在心理上从城市(城市足够大以使得这种抽象有意义)的地图上撤退或移开，且不管该城市是全球的(整体的)、国家的还是社会的层次的一部分——如部门的、辖区的和教堂的建筑——也不管它是否以层次 P 即私人所有的建筑为依托。留在地图上的将是一个建筑物的或非建筑物的区域，如街道、大道、市政厅、大区教堂、学校等公共建筑。在撤走任何整体性要素之后，我们已经理智地移除了任何与机构和更高层次的实体直接相关的东西。留给我们的东西表现为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保留着某种与位置(直接的周围环境)和情境(远距离的周围环境、整体状况)的关系。这个特别的都市集合体给予社会“实在”或团体某种特有的统一性：形式—功能—结构。在这里，我们可以谈一下双重目的的功能(城市中的与城市的功能：与周围的区域以及内部的功能相比的都市功能)，以及双重目的的结构(例如为贸易与运输服务的，其中有些起到了为外围区域——村庄、市场小镇，小城市——“服务”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则为严格意义上的都市生活服务)。

F110 层次 P 则(不恰当地)表现得较为内敛不张扬，甚至无关紧要的。在这里，只有各种建筑物形式中的建造区域才有意义。住房包括大的公寓建筑、可大可小的私人住所、露营街道、棚户区。虽然对“栖居”(l'habiter, 英文 *habiting*)与“定居”(l'habitat,

E81

英文*habitat*)做出区别已经颇有争议^①，但我仍然坚持这是有益的。“定居”是一个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滑稽的伪概念。在迈向 19 世纪的终点时，都市思想(假如可以这样形容)进行着强烈且无意识的简化，把“栖居”一词推到了一旁，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把它用括号括起来了。它决定用“定居”取而代之，“定居”作为一种简化的功能，把“人类”局限于少数的基本活动上：吃、睡和再生产。这些基本的功能性活动甚至不能说是动物性的。就其自发性而论，动物性要更为复杂。层次 P 不能作为与“宏观的”相对立的“微观的”或分子式的意义来理解，前者典型地表现为大型的集合体或宏大的结构。层次 P 不仅仅是微观经济或社会学“代理人”的场所，诸如家庭、邻里以及“首要的”关系(这是被生态学家以及芝加哥学派所征用的术语)。作为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定居把栖居完全驱逐到无意识的领域。在定居成为常识之前，栖居是一个古老的实践，难以表示，难以被语言化或概念化地表达，有时它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而有时又被贬低，但总是具体的，即同时是功能性的、多功能性的和超功能性的。在定居的领地，栖居从思想中消失了，并在实践中强烈地蜕化变质了。这就要求我们用一种尼采式与海德格尔式的元哲学的沉思来复原栖居的意义。作为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定居，甚至已经压制了都市生活的基本特征，这已经被鼠目寸光的生态学所指出。这些特征包括生活方式、都市类型、模型、文化模式的多样化，以及与日常生活的模式及模式化相关联的价值

F111

^① 有关列斐伏尔的“栖居”与“定居”的区别与联系，详见本书第一章(F33/E21)页下注。——中译者注

的多样化。定居由上而下地被压制为同质性的整体与量化空间，这迫使它变成了自闭于盒子、笼子或“居住机器”之中的“生活体验”。

E82 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把栖居等同为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但有一种可确定的类似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栖居的无知可以作为无意识理论的例证。为了重新发现该词及其意义，甚至表达它们，我们需要使用那些已经落入居住者“生活体验”范围之内的概念与范畴，接近日常生活中那些未知之物与被误解之物，并超越它们，形成一种普遍理论，形成一种哲学与元哲学。当海德格尔评述那被遗忘的(或被误解的)荷尔德林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①时，海德格尔便为恢复此词开辟了道路。这意味着把“人类”与自然及其自身的本质关系、人类与“存在”及其自身存在的关系置于栖居之中，并在栖居中得以实现与理解。即使这种对“定居”和工业空间“诗意的”批判貌似是一种右倾的批判，一种怀旧的和返祖性的批判，但也引入了空间的总问题式。人类如果没有拥有比他自身更多(或更少)的东西(即他与可能的以及想象的东西的联系)，就不能建造与居住，换言之，就不能拥有某种生活的居住地。哲学试图在“现实”的、可见的和可理解范围内的此处或彼处寻找这种联系。哲学认为它已经在隐藏的超越性或隐藏的内在性中发现了它。但如果说这种关系是隐蔽的，那就说明存在着某种证据。只要人们看一眼，面纱便消失了。这个关系就寄身在居住与栖居之中，在庙宇与宫殿之中，在伐木工的棚子和牧羊人的小木屋里。家与语言，如同话语与都市现实，连同其差别性

F112

① 参见[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一文，载由其所著，孙周兴译：《演讲与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5页。——中译者注

与关系(且无论是隐匿的还是明显的),是“人类”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人类”(l'être humain)[而不是“人种”(l'homme)]只能作为诗人而栖居。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提供(作为给予和礼物)诗意栖居或创造诗意的可能性,他们将会尽其所能地创造它。最受嘲弄的日常存在,也保留着庄严与自发的诗性,除非它什么都不是, E83
而只是一种广告形式或商品世界的展示,除非交换已经剥夺了使用性或已经对其施以多元决定(surdéterminant)。关于这种诗意的栖居,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向东方(中国与日本)学习。日本家庭有一个角落,即壁龛,其中收藏着某件特别的東西,它与四季(气候)保持着和谐的关系。这件东西可以简单或珍贵,可以是一朵花或 F113
一种瓷器。物品,无论雅致还是俗气,也许会使我们所栖居的空间充盈饱满,也许能形成一个体系,它们(包括最庸俗的艺术品)都是那些冷嘲热讽的男女诗人用以保留诗性的东西。不过,“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或者人类与“自然”及其自身本性(欲望、自己的身体)的关系,从来没有像忍受定居以及所谓的“都市规划的”合理性的统治那样深陷于悲惨之中。

这些房子意味着什么?真的,没有任何伟大的灵魂会把它造在这里作为他自己的比喻!也许是愚昧的孩子从玩具箱里拿出来的吧?……这些房间与卧室:能有大人们进进出出吗?①

① Zarathoustra, III, “De la vertu qui rapetisse”, 1.——原注[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ake Zarathustra*, part 3, “On Virtue that Makes Small,” trans. Walter Kaufmann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8)——英译者注]。参看[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变小的道德》,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91页。——中译者注

E84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一方是被分析化地理解的“人类”，另一方是赋予人类的以及人类从“栖居”中获得的那种形式。哲学所积累的知识告诉我们，这种人类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欲望与理性，自发性与合理性。人类学借助诸如心理学和/或社会学等其他知识的支持，使我们认识到在年龄和性别中存在着差异。这些陈述的简单性仅仅是表面的。不同年龄的人共存，对于一个群体或一个集体“主体”（家庭、邻里、朋友关系）来说是必要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的）时间认知而言，它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时间与时钟上的时间大相径庭。这是一种在有限性之内接受考验的时间，每一个瞬间和时刻都显得弥足珍贵。新生的婴儿并非“白板”一块，而只是一种未定形。他只能趋向于定型，趋向于成熟，这标志着他的端点(fin)（在该词的多重词义上：结局、意义、实现、完美、了结、结论）。这种成熟是一种完成，也已经是一种死亡。成人不应沾沾自喜，因为他已经到达了他的终点。儿童、少年和青年，他们在现实中是贫乏的、笨拙的和傲慢的，甚至是愚蠢的（例如参看一下贡布罗维奇^①的作品），但他们拥有着无可比拟的财富，拥有着最大的和最有欺骗性的财富：可能性(possibilité)。我们如何建立一种“栖居”，使它可以创造形式并且避免贫困？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可以让青年成长起来的保护壳，并且避免它过早地关闭起来？

F114

①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 1904—1969)，波兰作家。其作品深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其代表作是著于1937年的小说《费尔迪杜凯》(Ferdydurke)，专门讨论了人类的不成熟问题。——中译者注

这种模棱两可的“人类”概念，只有通过自身的老化才能消除它的含混，这种概念没有成形而且内容庞大，充满矛盾但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压倒另一方，除非它遭受了重大的破坏使“存在”不得不离开这种矛盾的处境，我们何以给这种“人类”的概念提供一种“住所”？这些问题已经预设了一种颠覆性的思想，去颠倒成人的“模型”，推翻父亲的神话，罢黜作为“终结”的成熟。恰当地说，在联合了科学认识和元哲学的沉思的情况下，这才是栖居的总问题式之所在。这一层次相比较于其他层次而言并不简单，因为它是“微型”的。有一种非常突出和奇怪的意识形态，它从笛卡尔主义和一种退化了的分析思想出发，把微小等同于简单，把宏大等同于复杂。栖居不应当再被视为剩余物，被视为所谓“高级”层次的痕迹或结果。它应当而且已经可以被视为起源或基础，被视为基本的功能性和超功能性。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致力于颠覆这种处境，使意义颠倒过来，让原来似乎处于从属地位的东西置于或重新置于我们的眼前。总体的、逻辑的和策略的统治地位依然是需要我们推翻的“颠倒的世界”的一部分。对于都市的现实，我们这里尝试一种与过去习惯相反的解码，也就是从栖居出发而不是从纪念碑性的东西出发（后者与其说是受到谴责，不如说是被重新考察）。定居与栖居之间的运动，以辩证的和冲突的方式，同时也以理论的和实践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并不排除符号学能够在这种分析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理解那些散落在“住所”内外的非言语性的符号和象征，还是建筑师和都市规划者在话语——独白或对话——中使用的术语和语句。

F115

E85

然而，批判性分析不能局限在符号学和原始的语言学方法 F116

的运用之中。其他概念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忽视爱欲与逻各斯、欲望与空间、性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似乎被误解而不是简单地未被知晓）是没有远见的。在工业社会时期，“现实性原则”确实压倒了“快乐原则”^①，而进入都市社会后，后者进行报复的那一刻已经到来了。性欲不正是“超社会的社会”的一种形式吗？它是社会的，因为它被社会模型化、塑造的、培育的，也是被社会疏远的。它是超社会的，因为倾向于反常状态的欲望披上了神秘的、奇怪的、秘密的甚至是罪恶的斗篷，以便能逃脱社会规范与形式。夫妻之间或者其他形式的爱在寻求“亲密性”。爱欲如果感受到自己是有罪的，感觉到自己是受逮捕的对象，那么它会变得更加强烈，它只有在反对社会的意义上才具有社会性和社交性。实质上“人类”既是未完成的也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如何通过建筑设计与都市规划来表达这种“人类”的境况呢？在最高层次上，即社会的一逻辑的层次上，“对象”建构起一个体系。每个对象在商品世界中获得它的意义体系，同时又充当着商品世界的媒介，它把它的意义体系传达给每个行动。每个对象都损害着每个行动。不过，这些体系并不具有那些蕴含在空间的逻辑或物的逻辑假设之中的充

① 这里里斐伏尔使用的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概念。精神分析学所说的快乐（pleasure）并不是一般人所谓的“有限的个人享受”的意思，而是泛指任何解脱的快感。潜意识心理的愿望和需求像婴儿一样，对法律、伦理和禁忌也一无所知，生活世界里的“可以”与“不可以”对它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它只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若不设法得到就绝不善罢甘休。在潜意识里，某些享乐原则刺激而产生的欲望常遭到另一个相反力量的监察。弗洛伊德称后者为“现实原则”。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种力量，用来统治我们的潜意识里那些无法无天的要求，并设法改造它们，使之适合周围的现实世界——那个充满法律和负责任的世界。“现实原则”的经典例子即法律、命令以及一些外在的需求，它与享乐原则的关系就像坚决的双亲和任性的孩子一样。——中译者注

分的、完备的特征，因为处处有过错、空白以及缺陷。还有一些冲突，包括逻辑与战略之间的冲突。空间逻辑就范于增长的限制、都市规划的逻辑、政治空间的逻辑，而当它们发生接触时就会有居住的冲突，有时会出现分裂。同样的情况适用于物(对象)的逻辑与游戏(或运动)的逻辑。社会逻辑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在它们之间存在裂缝与缺口。欲望慢慢渗透到这些缝隙间。如果没有欲望，“人的质料”这种无形的存在，就会渐渐地被强行纳入某种绝对形式之中；此形式受到国家的担保与检查，而这种国家牢固地建基于大量的“主体”与“客体”之上。假如没有了欲望，日常性将会变得千篇一律而无法挽救，甚至连颠覆也会变得不可思议。

F117

伴随着对都市现象各种各样层次的区分，我们也可以引入以下内容^①：

1. **都市现象的维度**。这并不是指规模，而是指现象的本质特征，表现为：

①**社会关系投射的一个现场**。它包括最为抽象的关系，即那些来自于商品与市场的关系，在整体层次上的“代理人”之间的契约或准契约关系。由此观点来看，可把都市现象与都市空间视为“具体的抽象物”。此前，我已经指出该维度如何隐藏这些抽象物的多元性(各式各样并列的、重叠的、有时冲突着的生产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艺术品市场，还有

E87

① 以上内容是都市现象的层次分析，由此开始进入对都市现象的维度分析。

——中译者注

象征物市场以及房地产和土地市场)。

F118

②都市现象和都市空间并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投射**，而且还是**社会关系的场所与区域**，其中发生着各种战略冲突。它们并不是目的或目标，而是行动的手段和工具。这包括任何与层次 M 相关的事物，即机构、组织以及都市“代理人”(重要人物、地方领导)。

③都市现象与都市空间保持着它们特有的现实性与生命力。也就是说，存在着与空间及其组织相关的**都市实践**，这种空间与组织不能被归结为整体性的意识形态或机构，或者被归结为具体的“都市规划”活动，即那些作为手段服务于通常是未知目的的活动。

2. 关于都市空间的**拓扑学**特征的区别与差异。从理论上说，这些特征构成了一系列持续对立的网络或体系(范式)：

- ①私人性与公共性；
- ②高级与低级；
- ③开放性与封闭性；
- ④对称性与不对称性；
- ⑤被控制物与剩余物。

.....

E88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通过维度(特别是**象征性的维度**)分析形式的例证。这种象征性维度通常指纪念碑，因而也指意识形态和机构，目前的或过去的：**纵聚合的维度**(*paradigmatique*)，一个对立面的集合或体系；以及**横组合的的维度**(*syntagma*-

tique)^①，一个序列(或路径)。

以分解层次为开端，在引入相关的对立物后，我们可能能够 F119
构造出一张都市空间表格。我们给每个层次分派一个适当的拓扑
学特征的索引。例如，任何与整体性层次(G)和公共性层次相关
的事物通常也与高度(h+)相联系，它们构成了开放空间和其他严格
封闭的空间(0-)，后者是权力的场所或神圣的场所，或者二者兼
有。这个壮观的都市空间有时表现出宏伟的对称性(s+)，而有时
则赋予“自由”游戏非对称要素(s-)。^②

在这里，关于这种空间坐标已经说得够多了。此主题更适合 F120
在一部著作中加以探讨，而这部著作一定不是泛泛地探究都市现

① 以上提到的“聚合”与“组合”关系术语来自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所谓横向组合关系(句型变化)，就是组成一个句子的各成分间的关系，即语句的线性关系。纵向聚合关系(词型变化)就是对一个语句的同一成分“举一反三”。聚合关系，又称为选择关系，即选择一个适当的词来接替一个已经出现的词。——中译者注

② 这张表格是根据我在日本东京所收集的信息制作并修改而成的，东京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都市空间。在该城市，我得到了建筑学家与都市规划师提供的信息，包括古迹、土地清册、人口统计信息，等等。在极其短暂的日本之行期间(将近两个月)，我试图运用西方思想的分析范畴，在第一现场研究这个国家的都市与建筑空间。这种研究应该包括表意文字的知识及其与时空相关的成分，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变种(包括对中国的理解)，但其潜在优势几乎没有涉及。这是一个历史的空间，它先于资本主义与工业，但非常复杂。

这里要完成的一项空间分析(或说时间—空间研究)将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 a. 空间(路径)互动、渗透与重叠的原则；
- b. 多功能性与超功能性概念；
- c. 集中化的辩证法；
- d. 空间的矛盾；
- e. 空间的(时间—空间的等)生产概念。

从这个系列来看(通过从抽象到具体、从逻辑学到辩证法的程序，阐述空间的矛盾)，我们真的能够讨论一种都市的认识论吗？也许可以，但需有所保留。对形式化知识所假定的“核心”或“中心”的阐发，从来都不可能没有风险。而理性化、固定性与“纯粹性”则易导向一种奇怪的隔离化，甚至一种理论方式。——原注

象，而是致力于空间的分析和政治学，致力于都市的拓扑学。而且，它会冒一定的风险，即它可能掩盖当前分析所做的贡献、提出的观点以及所持的立场。本质、基础和意义由栖居提供，而不是由其他层次提供。然而，如果仅考虑坐标本身，一切层次都表现为受某种总体的同一性支配，由空间的逻辑统治。此观点只有通过直接的批判才能被解释清楚。

E89 如上所述，这些层次具有相对的重要性。对于政治家来说，治理层次显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制定决策的地方，至少是官僚式的决策。该群体强烈倾向于——我们可以说这种倾向以强力为支撑——根据其形式化的知识(表象)以及权力(意志)来构造现象的其他层次和维度。在此层次上，工业实践即企业实践变成意识形态(表象)和意志(简化性的)。因此，国家与政治家依其本性而言是简化性的，并且常常处于进攻态势。由于在关键的阶段，这些层次与维度趋于模糊，因此这种简化性日甚一日。城市剧烈扩张，都市到来了。全面都市化很快就要开始，然而墨守成规的官僚制度(与从前的形式、功能和结构有关的机构与意识形态)却为适应新的形势而求自保了。

F121 第二个层次(M)貌似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但这是一个假设，旨在积极地保护理论层次上的都市现实。不过该层次无非是介于社会、国家、整体权力、知识、制度与意识形态和栖居二者之间的(混合的)媒介。在整体试图统治局部之处，在普遍性试图吸收特殊性之时，中间层(混合层，即M)便开始起作用了：它是一个适于防守或攻击、适于斗争的领域。但它依然是一种手段。它不会成为目的，除非它临时性地代表某种战略，并且这种战略必须要展示他手上所有的底牌。它能保护现存的都市机构吗？也许可以。

它能够推动它们吗？它能开发出标准与模型吗？它能将取自（过去的）城市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扩展至都市社会（真实的与可能的）吗？这是不可能的。虽然都市改革也许以此方式开展，但更加深刻的、更加激进的思想，即某种抓住事物根本，从而更加革命的思想，将肯定栖居持久的首要性。

在都市的历史性时间中，可以确定有两个横贯其中的关键性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农耕经济（农业生产、乡村生活、农民社会）变成了都市现实的附属物，后者起初由商业与工业促成，但不久便被其掠夺。第二个阶段是反向的，出现了第二次意义的倒置：主导性的工业变成了都市现实的从属。不过，在第二次颠倒过程中，瓦解过程已经开始并持续进行：一直被认
为并不重要的层次（即栖居），现在变成本质性的了。在此意义上，
它不再被视为某种效果、结果，或都市的特殊层次的偶然方面，
但对于整体层次来说它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因为整体层次仍依
赖于工业时代（生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空间从属于增长要求）。
这些后来的层次所形成的统一体定义了都市，而最后的层级即层
次 P 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些关键阶段意义的倒置被构想、设计，
从而增加了混乱的感觉。瞄准某些事物并不意味着我们决定要实现
它。这种混淆也推动了敌对的活动，其程度稍后讨论。这里，
我假设都市的首要性与栖居的优先性（*primauté de l'urbain et*
priorité de l'habiter）。栖居的优先性要求发明的自由，并要求在
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都市规划者与建筑师之间确立起一种关系，
总之，此优先性需要建筑学。建筑学本身响应了某种含糊的社会
要求，这种要求从来没有成功地变成一种社会秩序。（理论上的）
颠覆存在于如下命题中：这种含糊的要求将成为一种清晰的

F122

E90

秩序。

F123 目前，这些社会“秩序”还产生于工业的增长，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与机构建立在层次 G(即国家的层次)之上。尽管都市规划专家对其他事物保持沉默、警觉或者向往，他们仍然服从于工业化的要求。建筑师是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压缩(该词在1920—1925年被苏联建筑学家使用，意思是作为“社会压缩器”的建筑师)^①。无论想与不想，建筑师都是根据财政的制约条件(薪水与酬劳)以及规范和价值从事建筑的，这些规范和价值也就是阶级标准，它导致了隔离，甚至当愿望要带来整合与互动时也是如此。一般而论，建筑家被“商品世界”俘虏，而没有意识到它事实上是一个世界。他无意识地让使用服从于交换，并让使用价值服从于交换价值。社会秩序是专横的，能做出的仅有的要求就是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这种秩序。如果这种社会秩序渴望其他东西，那么这种含糊的要求就会受到压抑。哪怕古老的城市和潜在的都市遭受打击，也不是放弃这些城市的理由。即使层次 M 仅仅被界定为中介的或混合的而不是作为某些本质的或核心的事物，它仍然是斗争的场所与联结处。

E91

也许这些陈述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但还有很多没有说过的、不言而喻的悖论。我们没有创造出那些我们报告的东西，就像那些警告我们有灾难或剧变的人一样，他们是不需要为其发生负责的。有些人，无论是不坦率的还是率真的，都会因为风暴

① 参见 A. Kopp, *Ville et révolution*, Éditions Anthropos, 1968.——原注；参见 Anatole Kopp, *Town and Revolution: Soviet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1917—1935*, trans. Thomas E. Burton (New York: Braziller, 1970).——英译者注

的到来而责备气象学家。在普遍的都市化与都市领域的扩张过程中，曾有一种清洗都市现实的企图。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徒劳的挑战吗？这难道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吗？极有可能是。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推动了一系列规划，或者说，它隐藏在动机大不相同的规划背后。

对“城市”的抨击并非什么新鲜事。我愿意简要概括一下它的对手们的争论。早在1925年，苏联理论家就批判过特大城市（grand ville，英文 large city），也就是为人所熟知的大都市（metropolis）之前的大都会（*Mégalopolis*）。他们视大都市为资本主义的创造者和资产阶级更好地控制工人阶级的结果。这个分析的真理固然存在，却是相对的和短命的。他们不无巧妙地展示了大都市固有的缺点。他们的论点经常被另外一些人使用，甚至在美国亦然。巨兽般的且有触手的大城市总是政治性的。它为独裁权力的形成提供了最为便利的环境。它以组织化与超组织化为特征。特大城市使不平等合法化。当面临在专横的秩序感与混乱的持续威胁之间进行抉择时，任何权力（包括国家权力）都将会始终选择秩序。特大城市的唯一问题是数目。大众社会是在其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这种环境意味着大众是被强迫的，也就意味着暴力与压迫是其永恒的生存状态。“城市与乡村”之间无法克服对立又如何呢？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已成为灾难性的了。乡村知道它是为城市服务的，但城市危害着自然；都市在想象中重造自然，以便活动的幻觉得以持续，通过这种方式吞食自然。都市秩序包括并掩盖着一种根本的无序。特大城市就是罪恶，是污染，是疾病（精神的、道德的与社会的）。都市异化包括所有其他形式的异化并将其永恒化。在都市异化中，

F124

E92

F125

隔离变得司空见惯(阶级的、邻里间的、职业的、年龄的、种族的、性别的,等等)。人群与孤独并存。空间日益变成稀缺的——它是昂贵的、奢侈的且由特权把持的,并通过(“中心”)实践与各种战略保持现状。城市确实变得越来越富裕。它吸引财富并垄断文化,就像它集中着权力一样。但它在其财富的压力下崩溃了。它越是集中生活的必需品,就越是变得不适合人居住。以下观念是不可思议的、荒诞不经的:在城市中,幸福是可能的;城市生活越紧张,愉悦感越强,休闲时间也就越充裕。如果在社会关系与空间、地方与人群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如果我们要去营造一种凝聚力,我们就必须彻底地修改这种空间结构。况且,都市空间有结构吗?一旦它不再有隔离与分离,特大城市不恰恰就是混乱一片吗?那些看上去为空间的场所与性质命名的概念,实际上仅仅指的是体现在冷漠无情(indifférent)^①的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如邻里、环境等。

E93 把这种分析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只有村庄或教区具有社会的与空间的结构,此结构能够使人群适应其生存条件(环境、占用的地方、时间的组织)。确实,这些和谐的(社会)身体,或者诸如此类的和谐的(社会)身体,也依赖于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和各社会等级之间的某种平衡。空间独自充满意义,具有完整的意谓性,它公开对每个人(即对每个等级、阶级、年龄或者性别的成员)宣布什么被允许、什么不被允许。个人所处的地点规定了个人的角色。维持共同体的平衡需要美德、尊敬和服从,需要把风俗作为

F126

① 这里的译文失去了在法语中 indifférent 一词的一语双关性:既是冷漠无情的也是无差别的。——中译者注

绝对的事物来看待。而这一切在大城市里都消失了。

虽然一些苏联的理论家不再盲目崇拜共同体(部落、村庄、教区)或者“非城市”，但他们还是在1925年左右提出了所谓最优效果的问题，此问题从那时起便被没完没了地讨论着。我们如何判定及量化(根据表面积、居民数量)都市最优效果呢？我们能用什么标准呢？试图这样做总是会引起严肃的反对。假定这个可欲求的最优效果大致可以确定为三十万居民，因为这样可以被管理(在什么样的官僚制框架内？)。然而，这种规模的城市很难维持并拥有一所规模较大的大学、一座大剧院、一所歌剧院以及设备齐全的昂贵的医疗服务。

近来的规划已经生效，在这些规划中，法国高速公路在未来的大都会中将变成街道，这样既保证了附近地区与特殊中心(十字路与交叉路)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那些明显区别于工业区域的荒野与“处女”空间^①之间的联系。这表明，在此领域中的所有思想都是乌托邦的！诸如此类的设计都预料到了普遍化的都市化进程。但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什么授权我们沿着旧有的公路建立一个都市社会从而把都市空间以及乡村空间联系到一起的呢？这场向后倒退的运动，虽然它^②与(由人种学推动的)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转向并非同时发生，但我们难道不需要对它们进行区分吗？

F127

E94

反对“都市”和赞成“非城市”的论点以及相应的原则，更多的是与道德，而不是与任何真实与可能之间的关系有关。如此，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述。我不打算重新点燃论战，我想指出，一般的都市化与都市结构的扩张已经超出它们的掌控范围。从现

① “处女”空间，指未使用的空间。——中译者注

② “它”，指都市化运动。——中译者注

在起，社会必须面对某种全然不同的秩序所产生的问题：要么都市混乱，要么都市社会被如此构想。更具体而言，不管(古代的)城市和(潜在的)都市是否被有意地混淆，对它们的攻击正在两个层次上实施：较高层次 G 与较低层次 P。

来自上面的攻击——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包含着某种整体性规划，此规划使国家疆域从属于工业化操纵的“发展”过程。这里有两个要求以及两个假设：空间必须被规划，而且场所和位置的特殊性从技术的角度必须服从于更一般的强制性。在此意义上，**流动性**对于这部分人口来说变得具有实质性意义，他们受制于变化的条件，被能源、原材料等变量决定。一直极大地受到限制的居住的流动性将通过日益频繁的职业流动性得到解决。[例如，因为劳动力成本和投资需要，冶金工业从洛林(Lorraine)转移到敦刻尔克(Dunkerque)——一个来自于毛里塔利亚的矿物抵达的港口；一旦穆朗市的自然能源消耗殆尽，它将消失或被转变。]从这一点来看，如下观点是无法接受的，即仅仅因为“劳动力资源”依附于土地，在历史表层之下是固定化的，已经扎下了根，等等，便说他们不会被剥削。这种刺耳的真理可被普遍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经济的、金融的或者技术化的压力破坏了试图徒劳抵抗的(局部的、区域的或者国家的)结构。

在层次 P 上，导致技术性质的与技术官僚关注的相聚的动机是相当不同的。对于短暂的与游牧的事物的狂热，对于不停歇地扬帆起航的迷恋，将取代早期家的根基感，即传统的对出生地的

依恋。人类想要什么？居所。尤纳·弗雷德曼(Yona Friedman)^①已经建立了便捷式的结构与单元(盒子)，这些结构和单元可以被联结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或多个不同大小的房间，也就是可以被暂时分组。由此来看，我们可以把百万富翁的奢侈生活普及化与民主化，他们可以从一家移动到另一家，从一栋别墅移动到另一栋别墅，或从一艘游艇移到另一艘游艇。这种移动显出世界的乐趣(或者看上去如此)。

无论从上还是从下看，这都将是栖居和都市(作为诸多矛盾的场所和中心)的目标。都市的目标将通过作为行为与决策体系的工业组织的建立——通过与这些价值相关的历史价值的目标，以及通过与这些文化模式或模型相关的日常生活的转型来实现。

F129

对这两种压力源的抵抗，既来自反动性的也来自革命性的力量，而它们需要加以区别。换言之，批评要么来自于“右”，要么来自于“左”。对于任何批判的批判来说这同样有效。代表旧的共同体(部落、村庄与教区)对城市的批判是来自于右派的批判；而我这里所从事的对城市(以及“非城市”)的批判是来自于左派的批判。因循守旧的态度以及或多或少民俗化的狭隘主义与地方主义反对城市的消失。而基于特殊性——一般强调农民出身的特殊性——的抗议则不应被混同为对压抑性身体的反抗，或者对差异性的自觉和承认。对差异的肯定包括(在对它们的一致性和确实性的批判审查中有选择性地)对伦理的、语言学的、局部的以及区域

E96

^① 尤纳·弗雷德曼(Yona Friedman)1923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毕业于以色列的海法技术学院。1956年起在巴黎生活与工作。1958年，他出版了主要著作《可移动的建筑》(L'Architecture mobile)。他还是一系列都市规划的作者，他鼓励用户参与空间性建筑，认为这有重要意义。——英译者注

F130

的特性的肯定，但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差异性依其本身而被感知和构想；也就是说，通过它们的联系，差异性不再是孤零零的特殊性。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差异性与特殊性之间，就像在目前的利益与可能性之间存在冲突那样。不过，都市可以作为这样一个地点而被界定：在此，差异性彼此了解，通过其相互承认来彼此检验，以此方式被强化或弱化。对都市的攻击冷淡地、随意地期盼着差异性的消失，它们将差异性等同或混同为民俗化的特殊性。无论是技术官僚制还是个人主义式的工业意识形态，都是同质化的。

E97

F131

如果我们要为一个正在形成的都市社会作辩护，那么我们的困难就在于避免所有的模糊性，并清理出一条直接通往目标的道路。例如，提出中心与集中化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中心就不会出现城市或都市现实。此外，都市空间是由零向量所规定的。它是这样一个空间：其中每个点能够在无形中把那些环境——事物、作品与人——中的一切事物吸引到自己这里来。在每个点上，时空的向量（即内容与容器之间的距离）可变成零度。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乌托邦的），但它体现了都市空间——时间的辩证运动（内在矛盾）特征。因此，在理论上人们不得不支持都市的集中化，连同随之而来的饱和与无序的危险，不得不支持它所带来的交叉、信息和会聚的机遇。攻击或摧毁它意味着以一种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消灭思想，中心只能被驱散成局部的和流动的中心（多中心性），其具体的联系是由偶然性决定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冒险地支持决策与权力结构，它们包括财富与权力的大规模的、高度的集中化。假若没有集中化，便意味着没有休闲、节日、知识、口头或手稿传播、发明或创造的场所。只要生产与所有者的特定关系保

持不变，集中化便会从属于使用这些关系并从中得益的人。最好的情况是，这些人变成“精英”，而最坏的情况是集中化会被军队或警察操控。我们除了接受这些模糊与矛盾——这种境况及其过程的辩证本质——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事情吗？接受这种境况，并不意味着支持权力中心与专制规划的独断专行。但事实远非如此，或者说恰恰相反。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根本上说规划者（主要是都市规划者和流动性的公司）如此渴求的社会与职业的流动性是肤浅的。这并不是指只会发生于中心附近的强烈的流动性，而是指并未触动社会关系的人口或物质置换。无须多言，这样的流动性会导致混乱。不过，更大的危险在于它会以“平衡”或“稳定”而告终，因为人们及其活动的置换是高度程序化与“结构化”的。这并不是信息或邂逅的无序化特征，而是无聊与神经官能症的特征。在此，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都市规划”试图去解决的矛盾浮现了出来：秩序与无序、平衡与运动、稳定与流动。它要想成功，就必须通过强力的同质化牢牢抓紧任何现存事物，此同质化乃是一种空间的政治，一种压制象征物、信息与游戏的严格规划形式。当都市规划者们打算把临时建筑物打造得经久耐用时，他们失败了：这对于那些过往者们来说，只是一种单调无聊的形态学，一种滞留，因为他们想到某些其他地方以寻找一些其他事物。在此意义上，都市规划者与建筑师很合得来。建筑师以为他是一个都市规划者，反之亦然。不过，无论他们双方是携手并进还是分庭抗礼，都得接受秩序并服从于单一的、统一的社会秩序。此外，他们很快就放弃了那一丁点儿乌托邦，即寥寥无几的疯狂，而这些疯狂仍可将他们的工作区分开来，并让他们对恶意、违抗或者不一致保持猜疑。

F132

E98

空间政治意味着一种把各个层次与维度结成一体的战略。秩序把自己隐藏在道德性与科学性的外衣之下。直角的专制^①与都市化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制交融在一起。当格罗皮乌斯^②构思一种“可以解决建筑学问题的逻辑与系统的协调”时，当他在鲍豪斯学派创立时期预见一种通过“连贯性的、操作上的与体系化的”训练便能传播的“总体性”建筑学时，他遵循着一种相似的方向。

F133 那么，住宅游牧论(residential nomadisme)所呼唤的那种短暂的华丽又是什么呢？它仅仅代表着某种极端的形式，某种自己专有的乌托邦，某种个人主义的形式。这种暂时性将被简化为切换箱(栖居)。正像弗雷德曼所倡议的那样是十分可笑的：以为通过一种游牧生活我们就可以获得解放——用金属支架和波纹状的金属(一种卓越的建筑模型)来创建纯粹的居所。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暂时性将更为普遍，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那么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在团体活动中会创造并实现各种作品，然而在团体中他们本身就是转瞬即逝的。只有靠他们自己，他们的生活和团体存在才会实现，他们虽然从日常状态中暂时得到解脱，但也会被弄得筋疲力尽。是什么作品和群体呢？答案将会指向与此并不相干的创造性这个根本问题上来。这些即将出现的团体，会创造他们的瞬间及其活动、他们的空间与时间、他们的作品。而他们将会

E99

① “直角的专制”可参考勒·柯布西耶的《直角之诗》：“不容置疑的/直角/特质的/精神的/心灵的/我在这特质中自我凝视/处于其中/处于自我中/处于/目光凝视前方/如箭/她拥有理智/统治/她拥有高度/但毫不知情/谁如此造就了她/她来自何处？”参见唐晓渡、西川编：《当代国际诗坛(八)》，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页。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也提及直角的专制。——中译者注

②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德国现代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公立鲍豪斯(BAUHAUS)学校的创办人。——中译者注

在栖居的层次上做这些事情，或者从此层次（并非停留于此；即通过塑造一个适当的都市空间）开始。很少有人在此方向上进行尝试，也就是说，很少有人尝试着摧毁体系并使不可能变成可能，从而通过他们的失败或成功证明什么。这些尝试只有在将颠倒的世界，再次革命性地颠倒过来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它们将成为所谓“左翼”集团的工作，而现存社会将试图把这些“左翼”集团的设计指派下去。换言之，除非这种运动能够赢得整个社会并将其推向其他方向。建筑师和都市规划师都积极地做了什么呢？“建筑意味着将社会的、心理的、技术的和经济的生活组织起来”^①的观点很幼稚，就像汉斯·麦耶尔(Hans Meyer)在1928年所做的那样，当时他取代格罗皮乌斯当上了鲍豪斯的校长。建筑师造物主式的作用是都市神话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们很难区别开来。而且，格罗皮乌斯是更为一般地来看待事物的，他建议建筑师起到协调员的作用，能够将问题统一起来，“从房屋的功能到街道的功能研究，从街道到城市，最终到区域与国家的规划”。不幸的是，相反的情况发生了：结构规划使较低的级别和层次屈从于它自己的控制。这种情况能够颠倒过来吗？这种与社会的变革活动相关的可能性在当下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建筑师将会“规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能够使个人通过抛却日常重压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发展自己，就像格罗皮乌斯相信的那样。正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够使建筑师——他们将持续地起着“社会凝聚器”^②的作用——不

F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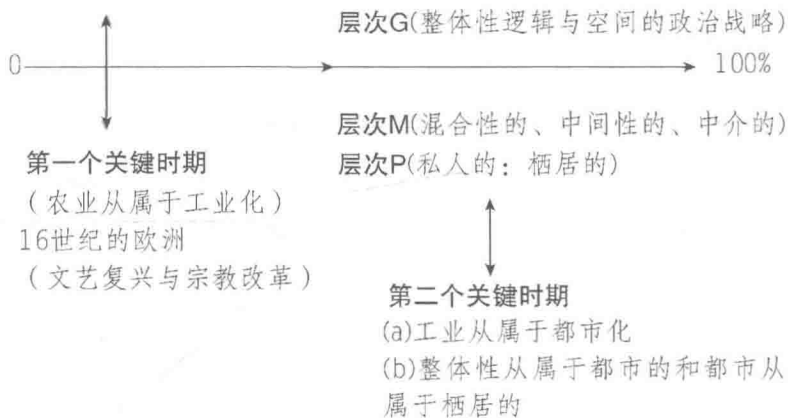
① 参看1919年宣言，以及《鲍豪斯》评论(1928年第4期)，详见1969年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曾举办过的鲍豪斯作品展览和展览目录。——原注

② 该词首见于白俄罗斯建筑学家金斯伯格(1892—1946)，强调建筑是一个创造社会公众平等交流的公共空间。——中译者注

E100
F135

再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秩序工作，而是为了移动的与新建的关系工作。建筑师甚至可以起到“社会加速器”的功能，但实现此功能的经济环境必须要受到仔细审查，以便使我们不至于受到话语或外观的愚弄。

基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重新绘制一张空间—时间表，图示如下：



在这里发生了双重颠倒。都市现实从属于其先驱以及条件的状况被克服了，同时栖居服从于社会实践的更高层次。其结果是一个根本性的(在根基与基础的意义上)重组。

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胆的解释——尽管非常简单——把马克思的著作(主要是《资本论》，也包括其哲学与政治学的著作)看作对颠倒世界的揭露以及对矫正它做出的尝试^①；也就是说，

① 这里列斐伏尔所使用的马克思著名的“颠倒”隐喻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112页。——中译者注

使其重新用脚立地。不仅仅黑格尔的哲学与辩证法是头脚倒置的，而且它发现自己被一种情境所挫败(异化)。在此情势下这种颠倒的怪异性已经被习俗冲淡或减弱而显得见怪不怪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颠倒的世界是这样—一个具有如下特征的社会：

F136

E101

1. 中间人取代生产者(工人)与创造者(艺术家、发明家、知识与思想的生产者)，他通过占有创造者的活动成果而将承担着创造风险的人置于贫困之中，以此为代价实现自我富足。谁是这些中间人呢？他们是商人、一些其他人，他们成功地将其活动范围扩展至从生产到消费，然后再回到原点的整个流通领域。站在最前台的将会是资本家、食利者或活动家。

2. 国家应该为整个社会服务，并将其组织化与理性化能力加以扩展，它致力于实现的恰好是相反的事情。它强化对社会整体的剥削，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并声称是社会生活——即其**结构**——的根本要素，而实际上它不过是社会生活的偶然因素(即**上层建筑**)而已。

3. 官僚制度能够发展出自身的利益以及为这些利益服务的手段，在那里技能与正规知识变成了供官僚制进行选择的手段。

4. 结果表现为原因，目的变成了手段，而手段变成了目的。

我已经给这种关于颠倒世界的理论增加了一点儿新要素，这便强化了颠覆此世界的使命，并通过谋划的都市革命，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工业组织体系中进行革命的理想而使其完

F137 整。不难阐明，任何其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释仅仅是一种解释、一种被弱化的版本，它试图去描述此颠倒世界的某些特定方面，或者某种特定的制度：国家、哲学、劳动分工、现有的形态学，等等。这恰好容易表明，如果没有这样的彻底颠倒

E102 (包括颠覆性地把这些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这些问题与具体的、表现社会关系的场所相关)，那么我们所谈的一切均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而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不可能在孤立的个人身上找到，而是由一系列关系或具体的(实践的)社会关系所构成。人类的本质(总体而言)仅仅是一种抽象。我们能够用来识别个人特征的参照是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此参照是生物性质的。参照是我们从巴甫洛夫^①的反射论那里借来的，是从脑生理学借来的。那些皮质—内脏的东西规定了个人。此参照，至今仍是最通常的技术性的(从而是经济学的)。如果我们不是在夸夸其谈，而是努力去达到某种实践的话，那么可以说，正是由于与生产性劳动具有内在联系，我们才能将(个人生活的)意识的构成性关系加以概念化并做出规定。谁能够否认这种参照与工业实践或生理学之间的相关性呢？假如我们不把无意识加以实体化并且对它顶礼膜拜的话，那么把欲望和无意识作为参照物也同样可行。

F138 但是，如果没有考虑形态学以及由场所提供的形式，或者这些场所与机构(中学、大学、商业、军队、国家，等等)之间

① 伊凡·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 1849—1936)，前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奠基人。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也是传统心理学领域之外而对心理学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曾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奖。——中译者注

的关系，我们是否能够考察关于意识的问题，关于个人（处于从家庭到全世界的群体中，包括与他/她关系最密切的群体，或他/她所参与的群体）发展的问题？这些深思持续着，体现在让人眩晕的抽象之中，被某种哲学的面纱或面罩所掩盖。^① 引入拓扑学（对精神与社会空间中的拓扑进行分析性考查）有助于我们坚持这些概念的哲学态度，与此同时清除任何哲学化的，也就是思辨的态度。

^① 我的评论针对的是罗杰·加罗迪及其“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标签，还有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由本·布鲁斯托从法文翻译过来（纽约：万神殿图书公司，1969年版）——英译者注]和吕西安·塞夫[《马克思主义与人的个性理论》（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1975年版）——英译者注]等。特别奇怪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却产生了哲学化的态度这样的后果，人们努力坚持与支持这种态度，将其抽象地作为某种机构（它也保证了观念的私有化）的私有财产而保留。

只研究社会关系而不考虑地点（它充斥着这些社会关系）以及形态学（物质的），难道我们不是在冒着运用一种纯粹的唯心主义方法的危险吗？这些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的哲学家们的态度，只能通过机构的意识形态权力来解释。——原注

第五章

都市神话与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农耕神话或其意识形态的延伸肯定存在。然而，F139/
农耕时代的神话不一定是农耕神话，它们吸收了从游牧和田E103
园生活或非农业生产活动(狩猎、捕鱼和手工业)引入的要素(主题、表意单位)。关于这些神话的使用并无确切年代可考。在本书中，我所界定的农耕时代的神话并非凭借这些神话的主题、人物形象和特点的农业特性，而是通过它们对农民社会(农业占主导地位，也包括政治城市)的问题和困难所做的反应。傅立叶设想的大众解放和劳动分工的新模式，不是基于农业劳动(每个人都要轮流承担所有要完成的任务)的一种模式，他参照的是利用农业要素建构起来的工业神话，而不是农业神话。我们很难F140
将这样一种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神话与意识形态割裂开来。与此同时，傅立叶的乌托邦是工业时代的先声，是工业时代最有力的证明。马克思在继承傅立叶的乌托邦基础上形成了其革命思想的核心：超越碎片化的劳动分工。分析神话包括两个方面：寻找神话的要素并在另一种语境中确定这些要素如何重新使用。产生神话要素的时期绝不是这些要素被再次结合、重新使用和再次加工的时期。如果我们要推测神话产生的年代，只能依据神话要素被使用的时期，而不能依据神话要素产生的E104

时期。

柏拉图《柯里西亚斯》(Critias)中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de)神话^①是一个都市神话，还是这种神话的先声或不祥预感？亚特兰蒂斯神话揭示了西方文明伊始，城镇和乡村就同时共存且纷争不断。农业生产和农民与自然的关系仅仅产生了一种轮转的时间形象，它没有意义(方向)，更确切地说，它除了大年^②和永恒轮回之外没有别的意义(解释)。作为朝着一个最终结果前进的时间形象，或者在一个发光的空间里和谐地建构起来的宇宙，亚特兰蒂斯城让思想魂牵梦萦。亚特兰蒂斯这座宏伟、和谐的城市与它组织起来并加以统治的领土联合。难道柏拉图的神话故事没有包含希腊人对东方城市的印象吗？难道它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欧洲回声吗？然而，在希腊，这座政治城市强有力地存在着，与东方城市并无二致。在它周围聚集着农民群体、村庄和制造者(村镇联合体)。它是坐落于广袤的田野、森林、丛林和沙漠中的伊甸园，是没有压迫或剥削的乐土。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琴与弓一样，它在各种要素的相互张力之中引入了和谐感。它如同对消失的大陆的回忆，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分离没有意义，也无法分离。柏拉图保留了此神话并赋予其形式，也就是说，哲学思想(它以活动的分工和分离为基础，恰恰是出于与这种分工和分离斗争力图恢复总体性)着手应对这个古代城市及其受到威胁的

E141

E105

① 亚特兰蒂斯(Atlantis，意为“阿特拉斯的岛屿”)，又译阿特兰蒂(提)斯，意译为大西洋之岛、大西国、大西洲，一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发展的古老大陆、国家或城邦之名，最早描述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里，据称其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被史前大洪水毁灭。——中译者注

② 天文学上称为“柏拉图年”(Platonic Year)，指春分点沿黄道运动一周的周期，约25800年。——中译者注

理性制度(言说和行为的逻各斯)这个难题。

相反地,亚特兰蒂斯城为哲学反思再现了其在广大农村环境中作为中心的政治性存在。这些哲学反思能提供什么?能预言什么?不可能的一可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有一种都市共产主义不是农民的,或者禁欲主义者的,抑或艺术家的,而是亚特兰蒂斯城特有的,尽管不依赖于与这座城市有关的现存制度。它也许是都市思想内在固有的一种乌托邦,借此神话文本超越了它的语境,这样就使乌托邦有了后继者——《上帝之城》和《太阳城》。乌托邦共产主义既有其都市渊源,也有其农业渊源。如果必须把亚特兰蒂斯神话归类并确定其年代,我们会把它归为都市神话。但是,作为一种哲学叙事,一种由神话、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组成的混合话语形式,《柯里西亚斯》是不可归类的。神话可以被界定为一种非制度性话语(不受法律和制度约束),它的要素是从语境中获取的。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一种制度性话语之中,为现存制度辩护并使其合法化(或批判、拒绝和驳斥现存制度),但是无论哪一种,都必须通过制度性话语展开。乌托邦则利用神话、现实与可能—不可能性问题框架来超越制度性话语。毋庸讳言,非制度性话语并非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也并非任何人都随口可讲。它产生于即使不是职业的也是一个特定群体的失范倾向(超社会的社会),哲学家就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他们为阅读文本和语境详细制定了一种特殊代码。他们把自己定位在不可能是制度性话语的宇宙论层面上(至少在古希腊不是制度性话语,在黑格尔之前也不是)。

在神话、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三方联盟面前,冲突和矛盾被神奇地解决了:它们被托付给过去或推延至未来。它们表现在艺

F142

E106

F143

术的作品当中。我们如何理解希腊悲剧？这种政治城市（无论是小城镇还是组织起来的城邦），掌握着与它自己的农村的矛盾关系。政治城市重拾了农民生活和玩耍的主题，赋予了他们另一种意义。城市孕育了阿波罗精神；农村诞生了狄俄尼索斯。被其信徒肆意挥霍的、被屠杀的上帝的情景成了一个二阶事件；这种情景在一种特定场合被重现或重复，以再现邪恶力量。在戏剧的舞台上，城市这个逻各斯和阿波罗力量的发源地，通过一种受控的模仿行为驱邪避害。由再现和起到发泄作用的重复产生的距离，给那些受到狄俄尼索斯力量威胁的人提供了一种缓冲。这个舞台使人们瞥见城市的未来。悲剧作家为赞美雅典娜而创作，以解决法律违反传统、正义反对暴力、个体反抗野蛮共同体的两难困境。悲剧作家的后继者（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①），以及伴随着他们的失望和痛苦，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得到理解。^② 古代城市背负着太多威胁。悲剧是都市的属性，正如农业主题已经被亚特兰蒂斯城所吸收一样。但是，这些悲剧主题不是神话。再者，在巨大的变迁之前怎么可能存在都市神话？这种巨大的变迁是指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推翻，倒向都市现实这个方面，同时削弱了农业、农村生活特有的分量，贬低了农民所面对的问题。从那时起，现代城市开始成形。它将自己写进它的蓝图，并通过它的梦

①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约公元前 525—前 456)、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约公元前 496—前 406)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约公元前 485—前 406)为古希腊三大著名悲剧作家。——中译者注

② 我无意赘述已强调过但并未解决的这些问题：表意单位是如何成为其他单位的一部分的？意义是被改造过的，发明出来的，还是创造出来的？迄今未被认识的组合现在能否通过新的关系获得揭示？它是否只是元语言，即一种关于原初话语的话语？考虑到文本和语境之间的关系，我认为，第一种解决方案是最合理的。——原注

想、声明、小说和情节剧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身份。农村要素——神话、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再度被作为表意单位，只不过意义不同。在卢梭看来，城市是腐化堕落——也就是文明——之地。它与自然形成对比，正如不平等与平等、丰饶与节制形成对比一样。让·雅克·卢梭在意识形态内部，从制度层面进行思考和写作。这是他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他偶尔也使用神话，但很少。把农民的主题从他们的语境和最初的意义中剥离出去，使古代神话转变为都市神话，这种做法在勒蒂夫·德·拉·布赖东^①的著作中比在卢梭那里更显而易见。布赖东令人心神不宁的作品完全是神话式的和乌托邦式的（按照之前的定义，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既不为任何制度辩护也不驳斥它们，而是倾向于忽视它们），这是布赖东作品局限性的根源所在，同时这也是它之所以伟大的原因。恰恰是在重农主义者开始从理论上阐述日渐衰微的自然至上观和农村优于城市的时候，在城市中，意识形态和形式化的知识的混合物滞后于社会实践，神话和乌托邦混合，越陷越深，越走越远，同时却还宣告现在，预示将来，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

大约在18世纪中叶，作为想象和概念、怀旧和希望的自然，闯入了人们的视野，与城市相对立。与此同时，音乐（即和声）推翻了建筑作为当时的首要艺术形式的地位。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城市罢黜了自然的地位取而代之。自然的再现只能通过、依据和迎合都市现实而被制造出来，都市现实呈现为一种自然。自然沦为伤感的和忧郁的媒介，沦为季节的装饰。如果回到对城市各种维度的分析上，我们可以说，城市的象征性(symbolique)维度

^① 勒蒂夫·德·拉·布赖东(Restif de la Bretonne, 1734—1806)，法国作家，著有《堕落的农民或是城市的危险》《我父亲的一生》等书。——中译者注

E108 是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揭示的,它的纵聚合(paradigmatique)维度是波德莱尔揭示的,它的横组合(syntagmatique)维度^①是那些定居在城市,并写下他们游记见闻的诗人揭示的(浪漫主义作家和二流诗人,从奈瓦尔^②到洛特雷阿蒙^③和兰波^④)。以这种方式趋向一种概念(也就是趋向一种理解)的城市形象通过神话、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揭示。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形象是一个维度接着一个维度,一种形式接着一种形式被揭示出来的。雨果描述并写下了那些能够从建筑、街道,甚至下水道(《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里读出的关于城市形象的象征物。波德莱尔提供和揭露了描述都市特征的一系列对立物(水和石头、静止和流动、人群和孤独)。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像巴黎这种与自然形成强烈对照的大城市,已经进入了扩张期。波德莱尔通过奥斯曼的都市规划见证了巴黎的变迁,就像兰波见证了巴黎公社这场都市革命一样。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早已成了叙事的一部分,叙事是被神话主题丰富的一种描述形式。人间乐土不再位于自然之中,而是位于原罪之前的开端。通过怀旧,一座人造乐园(波德莱尔语)取代了自然乐土,然而,这些人造乐园显然是都市的。虽然自然为这座乐园提供了某些要素(酒和毒品、建筑材料和金属、肉欲和暴力),但是在重新使用过程中却改变了它们的意义。

F146

① 有关该词的多重含义,参看本书第四章(F118/E88)。——中译者注

② 钱拉·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本名为钱拉·拉布吕尼(Gérard Labrunie)。——中译者注

③ 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 1846—1870),法国诗人,原名伊齐多尔·吕西安·迪卡斯(Isidore Lucien Ducasse)。——中译者注

④ 让·尼古拉·阿尔蒂尔·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 1854—1891),法国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之一,开启了超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中译者注

都市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它是形和光(一种启发式的潜在)，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实践，是另一个自然或不同于原初自然的那个自然的发源地和基础。都市凭借被混合起来的再现而生成，这种混合物在这种简要的分析面前会迅速分崩离析：神话和乌托邦，意识形态和科学。都市总问题式出现了。在这个大熔炉里，在这种创造力和暴力异常强烈的地方，这个到处充斥着金钱、矫情和奋不顾身的狡诈的地方，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城市显示了自身并且向外迸发。都市维护自身，不是作为某种形而上的实体，而是作为基于实践的一种单位。世界和宇宙这些古老的哲学主题，在城市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都市中相遇：世界，穿过阴影之路；宇宙，具有明亮轮廓的和谐脚手架。诗歌不再赞美宇宙之美，不再赞美它令人钦佩的“简约”，不再赞美心灵的奥秘，不再赞美独辟蹊径的意义。诗歌作品成了“正在开始的自我实现”[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①语]。学者与诗人走了同一条路。 E109 F147

关于奥斯曼的都市规划，有什么本该之前就已指明而现在要说的吗？奥斯曼按照计划把巴黎开膛剖腹，将无产阶级驱逐到城市的边缘，与此同时，创立郊区和居住地，使中心中产阶级化、人口减少，并使中心衰落。然而，我想强调这种都市规划态度的某些方面。它怀有一种阶级战略所固有的逻辑，并试图使这种起源于拿破仑一世及其专制国家的理性一致性最大化。奥斯曼毫不留情地使用直线来横贯整个城市，打造都市结构。这已不完全是

①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代表作有《黑暗的托马斯》和《文学空间》等。——中译者注

F148
E110

鲍豪斯学派和勒·柯布西耶^①所宣扬的直角的专制，而已经成了受直线、笔直排列和几何视角统治的组织方法。这种理性只能来自于一种制度。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制度，即国家干预。它强调源自于古代罗马，以及经过罗马的东方的一种趋向。从其起源到现在，国家通过虚空表达自身：空无一物的空间、宽阔的林荫大道和可容纳蔚为壮观的队列行进的大型广场。波拿巴主义仅仅通过将其应用于历史城市和一种高度复杂的都市空间而延续传统。于是，城市即刻被改变。这种理性决定了城市的逻辑、战略和理性。对于拿破仑的同时代人来说，奠定和支撑那种理性，使其仿佛具有无上权威的意识形态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大部分人对它赞赏有加。那些持保留意见的人往往遭到迫害：他们失去了美丽的景致，丧失了希望。他们是守旧的。无疑，那些想念过去的人遭到了批判，因为他们也对巴黎拆除棚舍感到痛心。他们的批判也不全错。然而，对他们同时代的人来说，真理（通过中产阶级化而使城市碎片化）并非人尽皆知。如果真理成了人尽皆知的会怎么样？巴黎公社被认为是一种革命性都市实践，拥有自己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自己的乌托邦（去中心化、蒲鲁东主义的联邦制度）。从城市中心被驱逐到其外围的工人，重新回到被资产阶级占据的城市中心。通过合力、运气和恰当的时机，他们掌控着城市。

当社会主义试图预测或设想未来（马克思不这么做，因为他构想的是一条道路，而不是一种模式）时，它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

^①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 20世纪著名的建筑大师、城市规划专家和作家。他是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倡导者, 机器美学的重要奠基人, 被称为“现代建筑的旗手”, 是功能主义建筑的泰斗, 被称为“功能主义之父”。——中译者注

改良的劳动形式(工作的工资水平和物质条件)。然而, 仅仅提供这些则未免显得缺乏远见。因为社会主义很快就发现它自身遇到都市总问题式时, 除了幼稚的概念和意识形态之外, 身无长物。人们还没有从这个视角对劳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比如, 都市问题对各种不同党派产生了什么影响? 或者说, 对第二和第三国际产生了什么影响? 市政自治社会主义(socialiste municipaux)缺乏远见, 目光短浅, 惨遭失败, 甚至比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失败得更迅速、更悲惨。没有形成社会主义(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只是产生了巨大的、强有力的国家。那么, 地方社会主义实现了什么呢? 它们的建筑师建立了住房补贴工程。它们在资本主义内部“凝聚”了阶级关系。这证明, 改革者以改革的眼光, 着手处理了一个尚未达到成熟状态和范围的问题。此问题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是如何被研究、解决(或未得到解决)的呢? 或者, 在二战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被研究和解决(或未得到解决)的呢? 在正在进行改革的中国是如何被研究、解决(或未得到解决)的呢? 为什么有人认为巴黎公社不是一场都市革命, 而是工业无产阶级走向工业化的革命呢? 这与历史真实不符。

在本书中, 我只能涉及这样的历史和政治问题。似乎新生的且不稳定的社会主义无法避免神话、意识形态或乌托邦。满怀信心, 对教条的论述深信不疑的社会主义思想声称, 它要超越伴随着区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城乡分立, 就像它相信它能超越市场、货币、价值规律、利润等一样。

我们如何超越城乡二元分立? 通过让大城市消失, 把商业分散

F150 到农村各地。在阿纳托尔·柯普(Anatole Kopp)^①看来,反都市的都市规划运动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即首次亮相。尽管这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建筑规划,但作为一项都市规划它失败了。苏联的城市继续在规模、生产力和政治重要性方面得以发展。换句话说,虽然乌托邦思想家付出了努力,那时他们认为他们是最现实、最理性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都市革命,其都市观念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他们的政治规划遵循着一条明显的反城市路线。甚至时至今日,在古巴和其他地方还是这样。

E112 有些人断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将消除城乡差别、农业劳动力和工业劳动力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些人的方法类似于马克思和苏联的意识形态论断,除了派知识青年下乡去参加体力劳动,在田间或邻近的工厂里干活儿,没有什么新颖之处。这就超越劳动分工了吗?几乎不可能。这种革命性规划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吗?都市结构的延伸、农村和农业劳动力的消失,难道能在没有工业化、机械化和全面自动化的情况下实现吗?既然如此,在这种程度上超越之前的状况能想当然地认为具有一种崭新的意义吗?与此同时,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责城市是专制权力的中心(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城市设立起堡垒和要塞直接与农民作对。大城市作为公司与银行的总部,作为商业与人类的交易中心,让数以百万的饥民趋之若鹜,这理应被摧毁。被世界农村和农民包围的世界城市将成为革

F151

① 阿纳托尔·柯普是《城市和革命:苏维埃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1917—1935)》(*Town and Revolution: Soviet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1917—1935*, trans. Thomas E. Burton, New York: Braziller, 1970)和《苏联的结构主义建筑风格》(*Constructivist Architecture in the USSR*, trans. Sheila de Vallée,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的作者。——英译者注

命活动的基底。公社(中国意义上的)将成为一种手段、一个台阶,通向农村的都市化和城市的农村化。据说公社设有医院和学校、文化中心、商业和休闲场所,没有棚屋,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公社独自就可以消化吸收构成它的群体以及组成这些群体成为集体的“我们”的个体。它避免了定居和流浪。技术不再是破坏性的,而是受集体掌控的。权力受到了限制。中国人的公社将能够取代过去具有阴柔之美的城市(她们是需要保护的、被动的),也能够取代过去具有阳刚之美的城市(他们是积极的、令人产生压迫感的)。至少这是某些“反城市”规划的拥护者的说法。

有几点理由可以驳斥他们的观点,因为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短期内用于促进某个既定的政策或一些短期政策),而且从传统上来讲是乌托邦的。今日之中国,类似昨日之苏联,城市连同经济以高速持续增长。由于人口、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城市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优势,这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并无二致。都市总问题式,作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都市规划、作为世界性趋势的都市化,都是全球性事实。都市革命是一种全球现象。 E113 F152

而且,如果“世界城市”引起“中国式道路”的理论家们的兴趣,那么,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最终的“郊区化”同样会引起都市战略的兴趣。然而,这一战略能假定农村将包围城市、农民游击队将领导对都市中心的突袭吗?如今,这种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的眼光或概念似乎过时了。与之相反,一种由“决策中心”做出的全面的空间殖民化似乎正在成形。财富和信息中心、知识和权力中心正着手创建封建属地。在这种情况下,分界线并不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而是在都市现象内部,在被统治的边缘和统治中心之间。

F153 全球化和都市现象的全球性本质——具体来说，即都市总问题式和关键时期——在被我们认识(或在形成我们所分析的以都市规划为名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的含糊融合)之前就在科幻小说中出现了。在科幻小说中，对都市现象的乐观预言极其少见；悲观预言倒是更为常见。内在于这些神话故事之中的意识形态不用澄清都市现象的全部内涵就常常可以提供工业规划的重要性。不过，这种普遍的悲观主义是都市总问题式的一部分。在科幻小说中，未来的城市是支离破碎的；它像疾病一样在人类和空间中传播，成为罪恶、畸形和暴力的媒介。

E114

目前，我们只能承认与都市现象相关的词条(解释)的多重性。都市神话填补了以实践为导向并通过实践获得知识的空白。它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混合，继续占据那个位置。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方式解读这种高度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形态学来解读(地理学家和可能的城市专家运用此法)。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方法来解读，寻求干预手段的行政管理者和政客运用此法。我们也可以通过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方法来解读，它提供给我们有限的存在，人类——变异的一种形象——通过都市生活提供，都市生活取代了围绕“驱动者”和狭义的价值传统的统一。也许，以前是哲学家和诗人的媒介，现在是科幻小说家媒介的神话故事，混合了与都市现象有关的各种“词条”，而无须太过担心这些词条是按照它们的出处还是重要性来划分的。也许，这种叙事与通过将其从语境中分离和孤立而得到的碎片化的读物和知识相比，不那么简约。也许，它只是通过掩饰其矛盾而投射出都市总问题式的形象。总之，未来的脚本尚待确定。

F154

第六章

都市形式

都市现象的本质或者实质究竟是什么？目前，我尚未给出一个基于实质或内容的定义。相关的功能、结构与形式(就该词的通常意义而言)虽然必要，但对于界定此术语来说并不充分。我们已经分类、寻找并考察了那些古典城市在经年累月中增长的政治与管理功能、商业功能和生产性(包括工艺的、制作的和工业的)功能。这些功能具有二重性特征：一方面，从城市领土来看，都市中心实施管理、统治并形成网络覆盖；另一方面，从城市自身来看，它被管理、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如此，也因为它正在实施统治)，并整合到生产和分配的网络之中。显而易见，都市现象的特征位于这些具有二重性功能的结合部上，即它们的连接点上。因此，仅仅列举那些功能是无济于事的。各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对它们所做的描述和详细分析相互分离，一直未能实现联合。只有区别机构与制度，区分出它们分别控制城市的外部功能和内部功能，并整合这些功能，对功能所做的分析才有意义。结构也具有二重性特征：它们是形态学的(包括地点与位置、建筑、街道与广场、遗迹、社区)和社会学的(包括人口的分布、年龄与性别、家庭、积极或消极的人口、社会职业分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就其形式，也就

F155/

E115

F156

E116

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几何的或塑形的形态而言，我们必须提及一种网状或中心辐射型的空间要素。不过，只有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流通，把都市总问题式限制在流通的问题域之中，这种空间安排才会变得显而易见。发明一些新的形式[X形的、螺旋上升的(spiral)、螺旋状的(helical)、凹形的，等等]仅仅是一种简单地解决都市总问题式的方法。

正如我们已领悟的，都市现象的本质乃是其集中性，但我们对集中性的理解是与创造和毁灭它的辩证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变成中心，这正是都市时间—空间的意义。不过，集中性并非对它聚集在一起的东西漠不关心，因为它要求某种内容。然而，此内容的确切性质并不重要。在仓库里堆放的物品和产品，市场里堆积如山的水果，人群或行人，形形色色的商品，一个挨一个，鳞次栉比——这是都市成为都市的原因。从阳台高处看，从塔顶看，从山顶看，从某个有利地点(作为能揭示都市自身的别处的高点)看，如果城市始终是一幅自为的景象，并不是因为观察者意识到了一幅外在于现实的画面，而是因为他的一瞥使其整合为一体。这恰恰就是都市形式被揭示了出来。发生于都市现实之中的一切皆是如此，似乎构成这一现实的一切都是可以加以比较的，且往往越来越是如此。都市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即混乱的方式)被构想、被认识、被揭示的。农业融入自然。它按照自然规律生产，引导自然顺势而为，而不是用强力塑造它。如果说自然从种子变为花朵与果实，周而复始，农民的空间与时间并没有打破这种循环；他们与自然整合为一体，紧密依靠自然的特性——土壤的构成、天然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生态平衡、小气候。工业征服自然但

并不尊重它。它对自然竭泽而渔、敲骨吸髓，巧取豪夺其资源与矿藏，破坏它以“生产”一些自然中没有的或非自然的物品(可交换的、畅销的)。工业并不受限于任何既定的地点，但仍然依靠地点。虽然它倾向于占领整个疆域，但它能做的仅仅是通过市场把一系列分散的碎片、公司联合在一起。

城市则有极大的不同。事实上，它并不仅仅是毁灭性的活动、消费活动；它变成了生产性的(即生产资料)，但起初是通过把生产要素联合在一起而做到这一点的。它把市场联合在一起(包括农业和工业产品市场——地方的、区域的、国家的以及全球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本身的市场，还有符号物和象征物的市场)。城市把通过自然或劳动，由别处产生的一切汇聚在一起：自然产物与劳动产品、产品与生产者、作品与创造物、活动与情境。那么城市创造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它只是将创造物集中起来。但它依然创造了一切。因为如果没有交换，没有联合，没有邻近(即没有关系)，一切都不会存在。城市创造了一种情境即都市情境。在那里，差异的事物一个接一个地产生且并不孤立地存在着，而是按照它们的差异性而存在。都市经常像自然那样冷漠，以其所具有的残酷方式，而对其包含的差异漠不关心。不过，正是因为都市把这些差异统一了起来，所以它也并非对一切差异都漠不关心。在此意义上，城市建构确定并传达着社会关系的本质：源于或导致冲突的互惠性存在与差异的表现。这不就是鼎鼎大名的城市或都市的合理性谵妄的正当性与意义之所在吗？由于距离、时间与空间导致机构与群体分离开来，(社会)关系持续不断地恶化着。它们

F158

E118

F159 在对这种分离的(潜在的)否定中得到揭示。这就是内在于都市中潜在的暴力来源,也是同样的节庆与假日的骚动不安特征的来源。沿着一条并不稳定的界线,一边是欣喜的狂乱,一边是残酷的狂乱,汇聚起巨大的人群,恍惚于游戏乐趣的掌控之中。如果没有某种“偶然”,某些无法预料的民众运动,大众的晕厥、踩踏、死亡,几乎不会有某种节庆发生。集中性作为数学的一个方面,也是戏剧的一个方面。它以统一一切事物的方式把数学与戏剧统一起来,包括象征与符号(包括联盟的符号)。都市的符号是集会的符号:推动集会的事物(街道及其表面,即石头、沥青、人行道)以及集会的必要条件(座位、灯光)。夜晚的灯光璀璨,最强有力地唤起了都市,特别是当飞越一个城市的上空时,令人眩晕的流光溢彩扑面而来:霓虹灯、街道指示牌、街灯,各式各样的骚动、财富与符号同时积聚。但就在它实现的过程中,这种集中化抽搐着、痉挛着。它需要另一个中心,另一个边缘,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都市所生产的这种运动反过来生产都市。造物反过来阻止创造的再发生。

因此,都市是纯形式的存在:一个遭遇、对抗、集会、同时发生之所。该形式并无特定内容,但所有事物都会在这里聚集和存活。它是一个抽象物,但不像形而上学的实体,都市是具体的抽象物,与实践密切相关。生物、工业的产物、技术与财富、文化作品、生活方式、情境、日常的调节与断裂——都市积累着一切内容。但它不只是积累,而且与积累有所不同。其内容(事物、对象、人、情境)是相互排他的,它们是多样的,但又是相互包含的,因为它们共存并包含着彼此的存在。都市既是形式又是容器,既是空的又是充实的,既是超物(super-objet)

E119

F160

又是非物(non-objet),既是超意识(supra-conscience)又是意识的总体性(totalité des consciences)。它与**形式的逻辑**相关,也与**内容的辩证法**(内容的差异和矛盾)相关。它与**数学形式**相关,在都市中,凡物皆可算术化、量化和程序化,除非那些被算术化、量化和程序化的要素之间的共存和再现形成了某种戏剧性的效果;与包括网格状的与环形的**几何学形式**相关,从而也与**对称和循环**相关(虽然时间是不可逆的,但道路是可逆的,因而也是**清晰可辨的**,都市同时也类似于文学作品,类似于共在要素的合理秩序)。然而,尽管有其社会逻辑,都市也无法构成一个**体系**。既无都市体系,也无都市向某种统一的形式体系的侵入,因为它(相对)独立于**形式与内容**。这就使我们不能从体系方面定义都市现象(都市)或将其作为一个体系来定义。我们也不能把都市定义为一个**客体(实体)或主体(意识)**。它是**形式**。因此,它趋向于:

1. **集中性**,不同的生产关系通过独特的生产方式相聚 一处——集中性作为一种趋势,已经在影响着“决策中心”,它是国家的化身,与之相伴的是各种相关的危险。 F161

2. **多元集中性**,全方位集中性,中心的破裂、解体——一种要么趋向于**差异中心**(相似且可能互补的)的构建,要么趋向于瓦解与分离的趋势。 E120

对于这个矛盾的运动,理解起来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掌握了。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其存在,也不足以将其用一种简化的社会逻辑,即一种“纯粹的”形式逻辑取而代之,或通过强调某

种特定内容(可交换对象的工业生产,如商业、信息流通、权威决策、自动循环,等等)的方式取而代之。

F162 内在于都市形式及其与内容的关系之中的辩证理性,既是精神的也是社会的,可以解释都市的某些方面。并不存在可塑意义上(而非逻辑意义上)的都市“形式”,犹如黑暗背景中的轮廓,它们脱离自然背景,使背景的模糊性得以显现。充裕、增殖,一切皆可辨识。被呼唤或召唤的要素相互交融。一切事物都清晰可辨。都市空间是透明的。一切事物皆有所意味,即使能指漂浮不定,因为一切事物都与“纯”形式相关,都被包含在形式之中。秩序与形式容易混沌不分,即使这种形式是被感知、被构思、被显现(被想象)出来的。但我们(主体、个人或集体,都是都市现实中的一部分,就像事物一样被聚集到这个地方)也会意识到这种透明性具有欺骗性。城市、都市也是神秘的、超自然的。密谋倚仗着财富与政治咄咄逼人的可见权力符号被策划出来,却掩盖了权力的合谋,它们躲在表面背后与透明性之下。都市从不缺少一种压抑性要素,直到一个新秩序的来临。这种压抑来自隐藏在都市中的东西以及隐藏那种戏剧性、潜在的暴力、死亡以及日常性的意志之中。都市这一压抑性方面被具体化到空间的概念之中;它支持越界的行为。在此,透明性与不透明性之间的关系区别于自然中或工业中二者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一种矛盾中的差异吗?社会的不透明性趋向于显现自身,表现为精神上的清楚明白。如果真理被隐藏并失去其意义,那么真理的意义则可能随时破裂。都市生活则在信息的解释与元语言之间犹豫不决、飘忽不定,前者基于某种(被认可的)符码,后者则满足于阐释众所周知的、

E121

重复的与冗余的信息。城市把自己书写在它的城墙之上与街道之中。但这种书写从未完成。这本书从未结束，而且其中有许多空白页或破损页。它只是一个草草写就的初稿，更像是东拼西凑的合集而不是一部作品。路程(*parcours*)与话语(*discours*)彼此伴随但从未相遇。都市词法(*paradigmatique*)，即一系列赋予事物意义的相关的对立面(中心与非中心、信息与冗余、开放与封闭、公开与非公开)到底能否终结?显然不能。特殊与差异等对立面是对直接经验的顽强反映，能够防止这一对事物走向终结。城市与都市、超级客体与超级符号，并不是完全基于客体与符号这样的概念之上的。然而，它们表明和包含客体与符号，以及指代那些客体与符号的概念。若要理解支配着都市现实中的客体与符号的规律，我们需要在那些概念(系统、整体、分区与布局、群体与组群的社会学)的基础上增加“网络”(交换网络、沟通网络)等特定概念。因为都市也可被定义为网络的并列与重叠、网络的聚合与统一，在这些网络中，有些是基于领土被建构起来的，有些是基于工业，而其他的则基于内在于都市构造中的其他中心。 F163 E122

通过这种方式，存在于都市及其先驱(即工业范围与农业范围之间)的“断裂”(*coupure*)一词(一种相对的中断)被具体化。通过进一步的考察表明，这种断裂不是认识论的或哲学的，甚至也不是或不仅仅是政治学的或历史学的。与此相比，它更为深奥。它同时引入并立足于一种知识形式、一个领域。当然，空间与时间变化着，但引入了一种形式使它们区别开来，在一种形式中区别它们，该种形式类似于逻辑形式，并几乎像逻辑形式(其与语言、话语、推理、分析、实效性活动相关)一样抽 F164

象和能动。该形式也像(价值和商品的)交换形式那样抽象和能动,但有所不同。这种形式将某些过时的内容归为过去;它通过知识和历史的结果(或剩余物)有选择地发挥着作用。它也吸收其他内容,并能动地把它们归并到某个总体性或潜在的综合体之中,而该综合体并不需要通过哲学来实现,它可以仅仅被当作一种行动的渠道(战略)。如果我们想理解这种形式及其干预模式,就没有必要从空间本身(既然它是被重新估量、重新加工的)或时间本身(既然它是变更的)开始。它是形式本身,作为潜在客体的产生者,都市,一切客体与主体的邂逅与汇聚、现存或可能,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探索。至于被征服的空间与积累的时间,我们也必须放弃把哲学、意识形态和制度性话语、通常的科学性作为出发点,它们把思想限制在现存的框架之中,阻碍我们通过形式对可能性进行探索。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约定俗成的模式排除在外(比如工业化、生产主义与经济决定论),因为它们已经被广泛采纳。那么我们该从何处开始呢?我们以某种形式化的逻辑概念和内容的辩证法为起点,其中包括根本的内容,即经济基础,以及处处相同却从不相同、始终是他者却从未是他者的根据:欲望以其压倒一切的能力和狡诈利用形式去认可自身并使自身被认可,利用形式来面对自己并在都市中进行斗争。

F165

E123

这样,从都市现实的零点延伸到整个过程(工业化、都市化)结束的空间—时间轴呈现出意义与范围^①。最初,当接近零

^① 有关“空间—时间轴呈现出意义与范围”可参看第一章 F14/E7 处相关内容。——中译者注

点时，都市仅仅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一粒种子，有点像一件工具、一个石头的或木头的俱乐部，或者首次被用来定义一个地方的语言和概念。随着对孤立四散于自然中的物的第一次聚集和收集，从第一堆石冢或第一堆果实开始，集中化便产生了，同时相伴而来的是其潜在的现实化。一开始，组合、集合和聚集便是社会实践的实质性要素；这是生产合理性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不与生产活动相一致，也不与生产活动相分离。这种中心的概念不同于自然里出现的实体，也不同于农业与工业活动的社会方面。这些农业与工业活动并不是建立在对时间与空间距离的潜在性的取消(否定)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此种意义上的行动与努力的基础之上。不过，这种中心的概念保留了一定的物理学观念，因为它与逻辑—数学概念有关，虽然不能与它们等同。

物理学家也以某个单独的点来设想弥散于宇宙之中的物质的集中化，这种物质的密度变得极大，而且分子与粒子之间的距离(空白与空间)彼此抵消。这种不可能性使真实情况得以清楚了。都市呈现出宇宙意义，它是一种全体化，即把作为昏暗的道路的世界，与作为光明的统一体的宇宙整合为一体。科幻小说经常会描绘城市的这种宇宙面容，这个被重新发现的物理空间被都市塑造为一件作品。通过城市及其各种类型的更迭，在萌芽阶段便已呈现为潜在性的都市变成具体的——但不需要形而上学的支持或超验性的统一。政治城市、商业城市和工业城市都具有这种二重性特征：形成都市的过程(又被都市塑造)，同时伴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条件强加其上的暂时性限制。通过这种辩证运动，都市反作用于那些先于它的东西和出自于它的

F166

E124

东西，并充当它的目标，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目的论意义。在此，还有那些无形式的、分散的、四散的呈现形式。这种形式肯定将自身作为目标，我们必须依赖知识来控制该过程。都市形式的统一力量并不是无限的。事实上它再现了有限之最大限度——界限。这种本身空无一物(类似于“纯”逻辑形式，或同义反复)的形式，不参与到那个可以归结为神性、超验理念、绝对理性的无限的力之中。因为都市将有限的处所和处所的界限(点、中心)中的有限要素联结起来，所以它便是有限性自身。它会消亡，它受到无意义特别是政治社会权力的威胁。都市形式确实趋向于打破那些试图限制它的界限。它的运动探索出一条道路。但都市形式并不能理所当然地绕过这些障碍。这场运动的辩证(矛盾)特征意味着它会遭受挫折，意味着特定的要素能够被用来反抗整个运动。都市——一个戏剧性的地方——能被转变为都市戏剧。隔离(即汇聚与邂逅的敌人)能够阻止这场运动吗？如果没有“惯用名称”(topics)，没有处所，没有对比，只有纯粹的中立，只有一幅关于都市及其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讽刺画，那么，同质化的空间能否扼杀都市现实？答案是肯定的。它甚至披上民主的外衣。都市民主意味着一种各种场所之间的平等，意味着一种参与全球交换中的平等。集中性会生产出等级，因而产生不平等。然而，分散不是依旧导致了隔离吗？革命剧变能够打碎都市现实的界限吗？有时是可以的。它是衡量对分离、隔离、空间政治以及更为普遍的都市规划进行激进批判的重要性尺度。

以上给出了差异空间理论的意义和范围。在空间中所确立的差异并不来自于空间自身，而是来自于居于此处的物，即

那些通过并在都市现实中聚集与遭遇的事物。对比、对立、重叠、并列取代了分离，即时空距离。这种理论大概是这样的：空间（以及空间—时间）随着时期、范围、领域以及主导性活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在空间中有三个层次——乡村空间、工业空间以及都市空间，它们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相互吸收，有时候其中一方会被另一方完全吸收。在农业时代之初，人们勾勒出某种特定的空间，为它确定方向和划分等级。都市空间思想会把这种特定的空间本身视为纯粹的自然，视为地理学的，但不经过思想重建就不能再实现它。最初的惯用名称或地名一旦确定，就进入一种精神的与社会的、实践的与言辞的二元性网格之中。这些处所（惯用名称）是自然的直接产物；人们按照土壤的特征来给它们命名，譬如物质自然、植物群与动物群、道路与小道的外观。取代自然环境异质性的是工业空间的同质化，毋宁说它意在同质化，与其量化的合理性一致。在某个被规划的空间中，这些惯用名称只是偶然的，只是民俗语言模糊不清的产品；所有地方都是同质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彼此间的距离。因为空间是客观的、可测量的，它只能以生产主义的标准为参照才能再现出来。虽然它在巩固生产的全部社会功能上具有优势，但也并不总是如此。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发现都市现象。第二种情况是，我们需要考虑额外的代价，譬如空间的消耗，物品和信息的转移。在原则上，最优的方案能够改进空间的使用。这些方案给予了工业合理性规划的一种科学的外观，譬如企业内部的组织以及“工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这些方法对都市现象漠不关心，但每次我们都成功地把生产与市场（劳动、资本与产品）结合起来，它

E126

F169

们就会每时每刻被纳入都市现象之中。

这种都市空间从根本上来讲不同于工业空间，正是因为它是差异性的(而不是同质性的)。即使最初的地籍与村名保留下来，都市空间还是彻底重塑了它们。对立与对比取代了独自的特殊性(与土壤相联系)。想一想巴黎的地图。地图上的许多名字都有乡土的来源，如鹤鹑之丘(Butte-aux-Cailles)、内河航运谷仓(Grange-Batelière)、绿磨坊(Moulin-Vert)。我们知道，拉丁区的街道有着乡间小路和公路的痕迹，巴黎的人们沿着这些街道来到他们的大草地、葡萄园和左岸的田地。然而，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网络变成了一座迷宫，变成了知识界及其骚动的中心，与商业道路和国家秩序的网格式的规划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奥斯曼(Haussmann)^①成功地把拉丁区切割开来，却未能消灭这种对抗。围绕市中心大厦的零售空间，沿着南北轴线被建立起来，而且充斥着手工制造的产品。该社会群体通过扩展到巴黎东部，直到贵族[马雷(Marais)]和王族成员居住地[在巴士底狱(Bastille)、兵工厂(Arsenal)等地附近]而造成威胁。即使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之后，沿着塞纳河伸展开来的东西轴线也从未完全建成。这个地点、这种情境解释了原因所在。塞纳河这个中立的都市空间，数世纪以来充当着交通中介，南北轴线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也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这种差别是明显的。东西轴线位于万塞讷(Vincennes)与协和广场(Place de

^① 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拿破仑三世时期的重要官员。因主持了1853—1870年的巴黎重建而闻名。——中译者注

la Concorde)之间,以建立在局部环流之处的游憩场所为标志,除了最新的协和广场与星形广场(Concorde, Place de l'Étoile)。它们是会面的地方,也是节日、游戏和散步的场所,如皇家广场(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 英文 Place Royale)、胜利广场(Place des Victoires)、皇家宫殿(Palais-Royal)、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与之形成对照,卢浮宫(Louvre)则延伸至西部的凯旋大道的起点。虽然起初它并不是一条商业道路,但它变成了展示皇室与帝国辉煌的场所[如杜伊勒里宫(Tuileries)、路易十五广场(Place Louis XV)、王后大道(Cours-la-Reine)、香榭丽舍大道(Champs-Élysées),以及后来的星形广场(l'Étoile)]。这样一来,主要社会群体的推力和压力通过不同的方式塑造着空间,当我们期盼同质化(就以巴黎这样的大都市为例)时也一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十字路口之外,南北轴线沿途没有游憩场或广场[如圣德尼路(Rue Saint-Denis)、圣马丁路(Rue Saint-Martin)、圣米歇尔大道(Boulevard Saint-Michel 和圣雅克路(Rue Saint-Jacques))]。 F171

这就是说,不能用都市社区的“生命冲动”(élan vital)来解释空间的结构,如马塞尔·波艾特(Marcel Poète)以柏格森式的语言来表达的那样。空间结构是历史的结果,我们必须将其视为社会“代理人”或“活动者”的作品,视为不断实施推动的集体“主体”的成果,它们间断性地(相对地)释放和塑造出空间的层次。这些主要的社会群体,由阶级和阶级的一小部分以及用阶级特征不足以对其界定的组织机构(例如皇室或市政当局)所组成,它们相互合作也/或彼此对抗。它们的交互作用,它们的战略、成功和失败引出了都市空间的质量与“所有权”问题。通过

将其汇集在一起，都市的一般形式包括这些形形色色的差异。如果说巴黎是一个例证，那么无产阶级仍然没有创造出一个空间。商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都在塑造着这个城市。工业家则毁灭了它。工人阶级从未拥有过任何空间，除了与之相分离——空间被征用、从空间中被驱逐出去。

那些具有可比较性的空间，它们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加以对照，（在地图里、在路线上、在或多或少地已经被“主体们”设计出来的图像中）能够加以讨论与解读，我们曾把它们称为同位空间（*isotopics*）^①。例如，在那些空间中有一个突出的同位点，它是由国家理性主义所创造的：宽阔笔直的路线、宽敞的林荫大道、空旷开阔的视野，为了占据土地而把从前的东西清理得一干二净，既不考虑小人物的权利和利益，也不考虑建设者的成本。这些迹象是非常明显的：从国王治下的巴黎空间，到帝国领导下的空间，再到共和国的空间。当我们沿着最近的轴线，即已经被工业化与商业化的古代王室与帝国路线一路走下去时，我们会发现它们在不断地扩大，但除了它们的平庸性，以及它们在意识中和在越来越可见的需求中服从于垄断工业之外，什么也没有。都市空间之中不再有生产单位，这些生产单位以某种有争议的方式来塑造都市空间，但这种方式至少是明确的。除了一间挨着一间的办公室之外，这里什么也没有。

同位空间是指同一性的处所、相同的处所、邻近的秩序。异位空间是指别处，他者的处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交织；有

^① 有关“同位空间”“异位空间”及“乌托邦相关定义”内容参看第二章 F54—F55/E38 处。

距离的秩序。它们之间有中立的空间：十字路口，通衢大道，那些与冷漠(中性)没什么两样的地方。这些地方通常是切割与缝合点(如宽阔的街道或大道，既分离又连接着两个邻近区域，两个相对的异位点)。被标注不同功能的空間相互叠加。同位点是与多功能性相联系的(从前体现为广场)。富有生气的环境(尤其是街道)是多功能性的(通道、商业、娱乐)。就小街道而言，缝合要比切割更加重要，而对于将都市空间交叉纵横和切割成块的大型通道和交通干线而言，情况则相反。同位—异位空间的差别只能动态地加以理解。在都市空间中，事情一直在发生，关系一直在变化。差异与对立导致冲突，或者被减弱、侵蚀或腐蚀。

E129
F173

都市空间作为一个整体，与乡村空间相比是异位性的，直到16世纪的欧洲，情况才开始反过来，这导致了都市结构对乡村的侵入。在同一时期，偏远地区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异位性。长长的、简陋的大街纵横交错，模糊不清的空间收容着出身不同的人口：马车车夫、雇佣兵、商人、战时常受怀疑且常会牺牲的被迫居于城外的半游牧民。经过一段时间，城市开始融入这些偏远地区，以同化它们、吞并它们并使其成为积极的邻里，那里居住着商人与工匠。这导致了都市凝聚与接续而来的强烈的民众统一感，这种感觉通过与君主制国家的斗争而得到巩固。但直到资产阶级兴起，这种趋势才反过来。世俗的因素被从中心驱赶至那些仍然是乡村的边缘的异位点，后者已经变成了“郊区”、居住的容器，具有非常清晰的异位点形式。在此意义上，异位点符合——但在有限的程度上——社会学家所讨论的失范。失范的群体建构起异位性空间，而这些异位性空间最终被占主

导地位的**实践**收回。

F174 何谓乌托邦、乌有之乡、无所发生之处、自身无所立足之处以及总是别处之处？在巴黎的地图上[所谓的1735年左右的杜尔哥(Turgot)①地图]，乌托邦既不能读到也不能看见，然而那却是它的全部荣耀。它正是远眺大城市的凝视所确定之处，一个含糊地被确定下来的地方，一个被仔细地构想和想象出来的(被反映的)地方，一个意识的场所；换言之，是一种总体性的意识。通常，这个亦真亦幻的地方，可在垂直物的边界附近发现，它是欲望、权力与思想的维度。有时它被发现深藏在由小说家或诗人想象出来的地下城之中，深藏在那座笼罩着阴谋与罪恶的城市之下。乌托邦兼近和远的秩序于一身。

E130

就其与内容的关系而论，都市形式创造了以上提及的矛盾(辩证法)，关于这一点，我将会更为详细地加以讨论。前面我注意到，在都市空间中某些事情一直在发生。空无、活动的虚无只能被显现出来；中立性是一种极端的情况。空无(一个处所)极具吸引力；它有这种意味和结果。事实上，任何事情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人群可以集合起来，物品可以堆积起来，节日可以展开，某一事件——恐怖的或者快乐的——可以发生。这就是都市空间何以那样迷人的原因：集中总是可能的。与此同时，这个空间可以自我清空，清除其他内容，变成一个纯粹匮乏的或权力的场所。可以根据它的固定结构来把握它，它被

①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1721—1781)，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如《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76)等。——中译者注

分阶段、划等级，从公寓建筑到整个都市，均被行政法令和命令、可见或不可见的界限所规定。它很容易被分为部分和不同区域，分为基本的客体和单元。都市空间可以供人们自由地使用，而且同样令人着迷的是，它也可以被事先划分为任意的单元（譬如在住房群和居住区旁边的是行政区和选举区之间的官僚主义界限）。 F175

要解决这种矛盾，我们可以想象完全的流动化，不是人口的流动化，而是空间的流动化。一个暂时被掌控的空间。因此每个地方变成多功能的、多价的、超功能的，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功能转换；在那里，群体掌控着很快就要摧毁的空间以便表达他们的行动与构想。（一个绝佳的例证是，被情境化地塑造的空间，即被群体活动所塑造的空间，是大型的展览空间，特别是在蒙特利尔的空间。一个稍纵即逝的城市从某个被改变的位置中产生，这是一个瑰丽的城市，在这里，日常性被节日所吸纳，都市以其华丽而变得玲珑剔透。） E131

以此方式，乌托邦^①这个富有启发性的潜在物已经出场，它将把各种各样的地方（拓扑）尽纳其中，并使其脱胎换骨。

乌托邦就像同位空间与异位空间一样是必要的。它无所不在也无处存在。对欲望和权力的超越，人们的内在性，象征与想象的无所不在，对集中性（把财富与人的姿态积累起来）合理且朦胧的想象，他者的在场，在场—不在场，对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在场的需要——这些也是差异性空间的特征。都市形式 F176

^① 汉译文中字面上失去了法文中“同位空间”(isotopie)、“异位空间”(hétérotopie)与“乌托邦”(utopie)之间的同源关系。参看本书第二章(F54/E38)页下注。——中译者注

把这些差异性统一起来，无论这种差异有多小或多大。这种形式只能在被整合化的差异（一切差异）的统一性中，并通过这种统一性来获得规定。这种整合化包含三种方式、三种地方（拓扑）——同位点、异位点与乌托邦。不过，乌托邦的超越性，纪念碑性的压倒性本质，以及空旷性（巨大的广场、夜间的广场）都体现了乌托邦，它们需要更为切近的考察。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冒昧地赞美这种要素，因为这种赞美一半是虚构的，一半是真实的，它会产生一种都市唯心主义。最后的这个观点我们已经有所论及：乌托邦看起来似乎已与某些特定的必要空间（如花园与公园）融为一体了。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空间看作中立性的（都市空间集合的中立要素）。公园与花园使得“别处”成为可感的、可见的和可辨认的，它嵌入都市的时间与处所中。它们是一种双重的乌托邦——绝对自然与纯粹人造。当（公共的）公园与花园不再屈服于某种源自生产主义和工业化的理性形式时，当它们不再中立，不再被降为“温室花朵”、一种贪婪与拙劣的几何学时，它们让人联想到一种绝对的与无法接近的自然（洞穴、风、海拔、大海、岛屿），还有人造自然（facticité）（那些修剪整齐且备受折磨的纯粹用于装饰的绿树）。花园和公园，它们作为绝对的对立面，被强制性地聚集在一起，但它们也以这种方式来呼唤自由和乌托邦的分离。日本有许多庭园艺术的例证。巴黎做的也很好，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果没有乌托邦式的象征，没有对高度与深度的利用，便没有都市空间；这种对高度与深度的利用是根据法则进行的，而这些法则并不是那些借助于绘画、雕刻或任何专门的艺术的功利经验主义或平庸美学的法则，因为这些法则是都市形式的法则。

E132

F177

我已经说过，我最想说的是关于差异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差异性空间保持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通过同质化空间的滤色镜来体验。我们已经做过了挑选。这种并没有被完全同质化的特殊性，是在某种不同的意义上重建起来的。它衍生出一个主要理论问题：对其最初语境中剥离出来的意义单元的再利用。此问题已经在之前的哲学、意识形态与神话学中出现过了。我们在空间讨论中又一次遇到了它。再一次强调，实践的作用是批判性的。只有都市实践能够解决此问题，因为正是都市实践首先向我们提出了此问题。

在都市实践中，有关城市的话语是被内外限定的；它指定行动、方向。我们能说这种实践是由一种话语所规定的吗？是由言谈和书写所规定的吗？都市现实提供了有限的但相当多的表达途径，仅仅是在此意义上，它为无穷无尽的言谈提供了场所。以前这种话语与自然的、历史的单位融为一体。虽然它可

E133

F178

值得讨论的是差异性(*différence*)、区别性(*distinction*)、分离性(*séparation*)和隔离性(*ségrégation*)之间的混淆问题。差异性与隔离性相互排斥，后者是对其拙劣的模仿。当我们说到差异性时，我们说的是关系，相近的关系可以被构想和感知，并被嵌入二重化的时空秩序之中——近与远。分离与隔离打破了这种关系。它们组成一种极权主义的秩序，其战略目标是瓦解具体的总体性，瓦解都市。隔离使复杂性变得错综复杂并进而摧毁了复杂性。

社会复杂化的后果之一是都市助长了实践理性，即形式与信息之间的联系。而综合又是什么呢？在实践要求信息自由的

程度上可以由实践得到，即每个地方、每个事件都可告知对方信息，而且反过来都能从对方那里获得信息。

差异性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它产生了形式，最好的形式来自于最优的信息。而分离与隔离切断了信息，它们产生了非形式。它们所提供的秩序只是表面的。只有意识形态会用它来抵制信息、交叉和集中化的这种无序状态。只有有限的工业化或国家理性主义，才会通过分离的手段，通过把它的“光谱分析”投射于地面之上，把都市搞得四分五裂，这样，都市便由相互脱节的要素所构成，在那里，信息交换不再可能发生。

F179 既然我们对都市形式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理解(包括它的实践的方面)，现在便可以转向它具体的表现了，也就是都市战略^①。

① 这种都市形式理论包含并发展了我在《城市权利》(*Droit à la ville*, éd. Anthropos, 1966; *Right to the City*, ed. Joan Ockman, New York: Columbia Books of Architecture/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3)一书中做出的分析。在《城市权利》一书中，城市被理解为：第一，一种(空间的)客体；第二，(近距与远距秩序的)中介；第三，(与艺术作品相类似的由群体塑造的)作品。形式把城市的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如果仅仅与权力决策和行动有关，“城市权利”变成了集中化的权利，一种并不把都市形式排除在外的权利。我还证明了：

- a. 树状图是严格的、有限制性的结构，它仅仅为进入预定路径提供方便；
- b. 此结构既是精神的，也是社会的；
- c. 它给地面投射了一个官僚(等级制)的社会概念；
- d. 它的“科学性”掩盖了意识形态；
- e. 这个图式是都市现实的简化；
- f. 虽然它正在进行隔离，但是它被都市规划者普遍接受为都市秩序的典型。

这些话题我将在《都市空间理论》(*Théorie de l'espace urbain*)一书中做进一步讨论。

——原注

第七章

刍议都市战略

当今的理论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马克思当时所了解的情况相比较。激进批判理论早已为思想与行动扫清了道路。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把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时代法国关于革命行动及其目标(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为其出发点。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经济学、历史及其意义的批判，使得他既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设想成一种总体性，也将其作为总体性变革的一个环节。否定性会产生一种新型的乐观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激进批判的否定性，在理论性与实践性上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否定性极为类似。这种状况与 20 世纪下半叶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与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来说，我们现在增加了对还原论和碎片化科学这些已经专业化和体制化理论的激进批判。只有通过这种批判。我们才能把其中每门科学对正在显现的总体性所起的作用区别开来。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批判才是达到总体性的唯一途径，而不是通过把这些科学的“实证性”结果汇总或并列在一起。单独来看，这些科学中的每一门都纠缠在断裂或混淆之中，纠缠在教条主义或虚无主义之中。

F180/

E135

F181

E136

都市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法表现为：第一，这种形式的

存在确保了“真实”的合理化，即它因此能够被概念化地分析；第二，形式就其本身而言变成最高层面研究的基础；第三，内容从属于分析，而分析会把原本多样化的内容切割成碎片：这就是碎片化的科学。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对这些代表着合理性(整体化)形式的科学展开批判或自我批判。

对专门化科学的批判包含着对专门化政治、经济基础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每个政治群体，特别是每种经济基础，都通过它所发展与培育起来的意识形态进行自我辩护：国家主义或爱国主义、经济主义或国家理性主义、哲学主义、(传统的)自由的人道主义。它倾向于掩盖本质问题，主要是那些与都市社会及其转变(转型或革命)相关的问题。这些被误用的意识形态来自于更早的时期，来自于工业理性主义以及在这种背景下的智力劳动的分工。在此，我愿意再次使用层次分析的方法来区别策略与结构。我们可做如下阐述：

第一，在设计与规划的层面上，计划(elaboration)与执行(execution)之间总存在某些距离。在此语境下，我们应当在需求(demands)与争辩(disputes)之间做出区分，因为二者经常被混淆。争辩揭示所涉及的集团或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征，包括为设计、意识形态化的都市规划做出贡献的意识形态(或诸多意识形态)。“争辩者”的干预把冲突引入社会逻辑[作为观念—逻辑(idéo-logique)的社会—逻辑(socio-logique)]之中。争辩的可能性使这些逻辑将自身显现为意识形态并推动了对抗，而这种对抗是都市民主程度的试金石。这些被卷入其中的人们的消极行为，他们的沉默，他们的谨慎的聪明，都是都市民主缺失的标志；换言之，是具体的民主缺失的标志。都市革命与具体的(发

达的)民主一致。集团与阶级的都市实践(即他们的生活方式、形态学)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对抗都市意识形态。于是,通过这种方式,争辩逐步发展为需求。

第二,在可以被称作认识论的层面上,我们能够提出认识的问题,可以是形式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就总问题式被规定的方式而言,已经掌握知识的“主体”似乎是不可能形成的。总问题式支配着科学性,直到一种新的秩序生成。换言之,意识形态与知识携手并进,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努力对它们做出区分。然而,每门科学都可以把自己看作理解都市现象的一个派别,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提供专业的概念与方法;二是放弃帝国主义,这一要求意味着一种持续不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

F183

毫无疑问,伴随着社会学出现了大量的专业概念,如“意识形态”(及其批判性含义)、“制度”以及“失范”,还有所有它们暗含的概念。显而易见,这里并没有一张穷尽无遗的名单,而我之所以特别提及这些概念,仅仅因为它们批判的典型主题。需要进一步讨论确定被格奥尔格·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①所阐述的某些概念——比如骚动的行为(*conduite effervescence*)或者时间的多元性(*pluralité des temps*)——是否有助

^① 格奥尔基·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 1894—1965),生于俄国诺沃罗斯斯克(Novorossiysk)的法国社会学家[长期在法国国家都市社会学研究院(Institut de Sociologie urbaine)任职,也是列斐伏尔的好友与同事——中译者注]。他是一位著述甚丰的高产的社会学作家,其作品包括《知识的社会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Knowledge*, trans. Margaret A. Thompson and Kenneth A. Thomps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以及《法律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 London: Paul, Trench, Trubner, 1947)。——英译者注

E138 于分析都市现象。不过，集中化的概念与表象、都市的肌理，以及都市空间，并不能被局限在社会学领域(尽管我的评论不应被解释为对概念自身的批判)。

F184 在最高的理论层次，我们需要考察所谓的工业社会到都市社会的转变(或转型、革命)。这种转变规定着总问题式，即真实的总问题式特征。我们能够说在既定的整体框架(制度性的与意识形态性的)中，与工业化相关的现象已经完全被都市现象代替了吗？我们能够说前者现在已经从属于后者了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我们不当把趋势与现实混为一谈。今天的社会正经历着一次**转型**，而且在此意义上社会才可以获得最好的理解。工业的现象与内涵只是现在才开始衰落。在此水平上，我们发现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转变制度以满足工业生产需求：对合理性进行改进，制订计划和做出规划。在此，资本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赶上了它们。都市总问题式是整体性的，但我们接近它的道路却依赖于国家经济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结构，及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表明，它们在都市化方面的主动性(或者多少成功的)与它们在工业化方面的主动性显然并不是一样多。

F185 只有通过**都市实践**的自觉构型及其自身的合理性，以替代现在已经充分实现的工业实践，都市现象的认识论才能变成一门科学。只有通过这个复杂的过程，分析才能够勾画“对象”或建构“模型”，这一切都是必要的，都是能被修正或批评的。这里假定了此前提到的、存在于都市意识形态与社会集团和阶级的都市实践之间的冲突。在没有排除我们所拥有的几近乌托邦理想即“纯粹”想象的事物的条件下，它也假定社会与政治力量的

E139

干预和创造力的解放。

我要再次强调，必须要颠覆因循守旧的观察事物的方式。战略的可能性实际上与这种颠覆密切相关，但它在其中被制定的阶段导致了预见与规划的困难。一般而言，都市化表征着工业化这种占统治地位现象的后果。城市或居民点(大都会)因此进入到工业化过程的考察之中，都市空间进入到总体化部署的空间之中。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都市与都市化过程无非是(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而已。人们常常认为，在都市现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并无交互性。只有当我们把工业化视为迈向都市化的一个步骤、一个时机、一个中介和一种工具的时候，视野的颠覆才会发生。正是在工业化—都市化的双重进程方式中，继第一个术语(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之后，第二个术语(都市化)才变成主宰。只有如此，我们的“城市”概念才不再被局限于工业化的“最大化”及其后果，我们才不再仅仅抱怨工业社会中的异化(无论是通过异化形成的个人主义还是过度组织化)，或渴望向古代(无论是古希腊的还是中世纪的)都市共同体复归。这些所谓的模式仅仅是都市规划意识形态的变种而已。

F186

在此语境下，日常生活批判能够起到令人吃惊的作用。它不只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次要方面，一个可以被批判性研究的“对象”，或一个“主题”；它并没有可明确圈定的领域。它利用经济学与经济分析，就像它利用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一样。然而它并不会就范于这些范畴中的任何一个。而且，虽然它并没有覆盖工业时代实践的各个方面，但它利用了最重要的成果。此时代导致了一种日常性的构成，即一种复杂精密地剥削和小

E140

心周密地控制着的受动的社会环境。日常性不存在于“城市”本身，而是存在并贯穿于广泛的分离之中（活动与生活的瞬间的分离）。批判的方法包括对象与主题的批判、部门与领域的批判等。通过展示人们如何生活，日常生活批判对导致这种后果的战略提出了控诉。批判性思想打破了关于人类现实的各种专业科学之间的界限。它阐明了这些科学的实际用处。它表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实践的出现和紧要性，它将不再是“工业社会”的实践而是都市社会的实践。在此意义上，日常生活批判作为一种行进中的批判，有时是自发性的自我批判，有时是通过概念阐述的，它给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实质性的要素。它通过比较真实性和可能性（可能性也是一种“现实”）而得出它的结论，但它并不需要依赖于某个客体或主体，依赖于某个固定的体系或领域。假设以此为方向，我们甚至可以预测，通过需要和功能性的批判、经济基础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局部和还原性的实践，有一天都市社会学会有其一席之地。需要加以发展的社会实践，即都市社会的实践，与目前所说的作为都市规划的社会实践几乎毫无瓜葛。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市规划掩盖了其战略。对都市规划进行批判，需要对都市规划师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作为局部的实践，即还原性实践与阶级战略）进行批判。这种批判能够阐明都市实践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即为了形成和解决某些都市社会问题而进行的笨拙的、愚昧的种种努力。对于这些被深深地掩盖在阶级逻辑——空间的政治，经济决定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之下的战略来说，它取代了相关的战略。

通过一种彻底的批判形式把哲学提升到新的水平，并使所

有科学反过来面对自身的阐述，对都市现象的思考便可界定为一种战略。在此视野内，我们可以合理地界定这些思想的局限性和交汇点，各种独立的思想路线明显交汇于此。

F188

这种战略表现为二分法形式。不过，二分法式的分离并不会掩盖某种出自于如下事实的根本统一性，即瞬间聚焦于某个总问题式之上的充分认识，战略因此变成了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的词汇、关于政治性(都市)现实的科学。而在相对的意义，战略变成了知识性与政治性的，但也不会相互分离。

难道都市现象的科学不应该回应实用性要求和直接需要吗？策划者、程序设计者，以及使用者都需要解决方案。为了什么呢？为了使人们快乐。这是一种奇怪的阐释快乐的方式。假若不冒险来证实那些由意识形态与权力强加给它的外在限制，都市现象的科学便无法回应这些要求。都市现象的科学利用理论假设、实践经验以及确立的概念逐步建立自身。但如果没有想象，即没有乌托邦，它便无法存在。它必须承认，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情形，在某些情形下，人口统计学主宰着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认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统计学在策划者的帮助下将变成主宰者，但它毕竟有一种声音，或者说它有权力或权利决定未来。在另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借助规划者起决定作用。但这样做时，经济学却惹火上身，为激进批判打开了通道，虽然后者并不适合此领域，但它具有不可否认的功效与创造力。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也将在这些批判的发展方面发挥作用。城市与都市现象研究，有可能让我们建立起一个宏观的社会学模型。在此以战略为导向的过程中，重新思考其范畴和概念的一般社会学与都市社会学，或许可以生成大量主要与总问题式相关的科

F189

E142

学认识。尽管如此，在一种工业框架之内，这些“学科”只能在为私人或公共的利益卖力的角色之间，与为竞争者或被竞争者辩护之间来回摇摆。无论如何，手段都不能替代目的，部分都不能替代整体，策略都不能替代战略。任何与既定的专业化相关的策略，一旦试图成为某个全局层次上的战略——帝国主义，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

知识的战略不可能与世隔绝。它致力于实践，换言之，它不断地与经验对抗，并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实践即都市社会的实践，这种实践使时间和空间适应于人类，是一种关于自由的高级模式。

不过，在新秩序到来之前，社会实践仍将属于那些通过制度与体制控制它的政治家。专业政客们喜爱他们自己的职业更甚于政治，这就阻碍了更高级的理性化即都市民主的形式。他们在非常制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框架内活动，而这些框架是需要被克服的。这使情况变得相当复杂。知识战略是备受限制的。因为它不得不考虑政治的战略，需要对这些战略有所了解。它怎么可能避免拥有关于这些客体与主体、体系与领域的认识论呢？政治社会学与对管理和官僚制的制度分析，在这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战略活动可以包括给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派系、党派提供建议。这并不意味着批判性认识论告退而为这些职业政治家让路。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不放弃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批判性分析，怎么可能给他们提供规划与方案呢？假如我们以压制回应他们的压制，我们怎么可能劝说与强制他们？虽然解决的方法远非那么简单，但如果认识论放弃了对决策与制度的批判权力，这将是致命的。每种失败都会引发一个

很难逆转的过程。在此，退却的是民主而不是科学与科学的制度。

战略包含着一个关键要素：最优与最大限度地使用技术(所有的技术)来解决都市问题，从而改善都市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暴露出日常生活变革的可能性，正如我们通过一种对机器与技术的理性使用(也包括对社会关系的变革)所理解的那样。在现存事物秩序中通过某些“体制”而恢复首创精神(每一种首创精神)，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倡导不能被用来清理与照亮某条道路。经济学预测与国家权力很少正视如何基于当代经验整体，实现资源、技术或科学工具的最优利用。只有在舆论、突发事件或直接挑战的压力下，它们才有用武之地(假定它能够起作用)。这就是预算和财政上(即“经济”上)要求的结果。这些要求掩盖了一些并不明显的动因。权力拥有其自身战略，体制拥有其自身利益，它们常常把这些重要问题归结于背景之中。 F191

仰仗哲学绝不意味着对过去怀有一腔怀旧之情。在此，哲学思想与元哲学之间的区别，呈现出意义与重要性。元哲学是一种新的语境，其中，理论与概念，即脱离其哲学语境的意指单位，呈现出某种别样的意义。而要想对当前总问题式的范围，即作为总问题式的现实性有更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运用哲学思想——如果我们正在实现从古典哲学到元哲学的转变。 E144 F192

那么总体性是什么呢？辩证地说，它就是现在在场。它又不是不在场。它存在于每个人的活动之中，也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一切瞬间都包含于其中：工作与游戏、认识与休息、努力与享乐、快乐与悲伤。但这些瞬间需要在现实与社会之中加以“对象化”。它们也需要某种阐发形式。在此意义上，总体性

接近于鲜活的直接性和视域，但它也与此有所不同。都市社会超越了由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创造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它终结了那些使总体性不可能的事物：无法解决的分化、绝对分离、程序化的隔离。不过，它只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而不是某个总体性的模式。这是传统哲学而不是元哲学的方法，对于元哲学而言，道路与模式有鲜明的对立性。

要发展都市战略只能通过使用政治分析的一般规则，这种政治分析大概从马克思开始便已存在。这种分析涵盖了条件与周期，还有某种情势的结构要素。我们如何以及何时，应该把明确的都市对象，与那些同工业生产、规划、收入(剩余价值)分配、就业、企业和劳动的组织等相联系的事物区分开来呢？最严重的错误就在于将这些对象过早地分离开来。

F193 事实上，工业革命与都市革命是同一个世界剧烈转变过程
E145 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同一过程、同一观念即世界性革命的(辩证统一的)两个要素。事实上，第二个方面的重要性已经增强，以至于它不再从属于第一个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第一个方面突然不再起任何重要作用或不再具有现实性。政治形势分析，它的“真实性”与琐碎的和最常使用的“真实性”一词毫无关系，而是建立在真实、可能与不可能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基础上的；从而使看似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任何接近于真实的分析必然会接受政治机会主义。任何分离出来又极其靠近不可能性(走向平庸意义的乌托邦)的分析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个被认可的事实是，美洲已经进入一个都市游击战时代。北美洲技术的发达及其对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此大陆领先一步，至少从我关注的观点来看是如

此。正像马克思以他对英国人与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分析为基础一样，都市转型的政治分析是建立在对北美与南美的具体研究基础之上的。北美与南美的都市游击活动并没有相同的特征。通过比法律整合更有力量的社会隔离形式，美国黑人被锁定在都市贫民区之中，他们已经开始孤注一掷。其中的许多黑人，以及年轻人，总的来说已经拒绝任何政治议程，并考虑寻找某种反抗纲领。他们要痛痛快快地将暴力发泄一番。目前，暴力行为尚未与美洲社会陷身其中的都市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那里的社会并没有经历过任何一场工业时代的根本危机。它试图而且继续围绕着商业合理性组织其自身，同时保持工业增长之前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与都市的)形式。在此整体语境中，地方权威、联邦政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复杂。最大的城市(纽约算是典型的了)已经变得无法控制、无法治理，大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显而易见，战略要想成功，必定要把反对压迫性社会的“否定性”的反抗力量，与能“肯定性”地解决大都市问题的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该社会进入都市革命阶段，并不意味着都市总问题式能够很容易地被解决。它仅仅意味着，如果一个高度工业化社会，不能通过某种转换来解决问题进而对都市总问题式做出回应，它将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种混乱被意识形态所包裹，似乎人们生活在秩序和满足之中。然而，理论分析的困难与解决方法的发现，不应阻止思想和行动。类似的情形发生在以工业总问题式为基本特征的20世纪初。20世纪后半叶，也许会让人们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的乐观论述心生疑问，但有意放弃这种信念还为时过早。乐观主义有一样东

F194

E146

F195

西于己有利，那就是它的韧性。

在南美洲，都市游击活动正在贫民区或棚户区发生。这些地方已经变成了斗争的发泄区、被剥夺的农民与工业劳动力之间的过渡带。切·格瓦拉(Che Guevara)^①很有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他试图为农民游击活动创造一个中心的努力来得太晚了。早些时候，这在古巴仍然有可能取得成功。而南美洲农村人口空壳化了，最好的农民都移居到已然拥挤不堪的城市的郊区。截至目前，都市游击活动的对象并没有显得非常清晰(至少在获得额外的信息之前是这样的)。

E147 那么，亚洲的情况又如何呢？亚洲不是已经结束了农业时代与工业转型吗？大城市的存在是一个并不充分的标记。它与农村联系的总体性需要认真考察。在这里，不平等发展的概念对于分析来说也许有用，尽管这种分析与列宁的著作不符，却是对它的进一步阐述。数量庞大的(潜在的或暴力的)农民引起的压力、农业改革与工业化的问题，都继续掩盖着都市总问题式。这种情形有助于解释这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世界城市”若没有能力进行变革活动，将沦为“世界斗争”的牺牲品。

F196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有三种可能性。第一，都市总问题式被工业生产的意识形态所扼杀，无法被人们意识到。官方的都市规划，将继续被误认为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解决方案，尽管它与资本主义都市规划并非截然不同。其中，它们的不同点在于，官方的都市规划不太强调交换的集中，它可以更加自

^① 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

由地利用土地，因而可以更大规模地利用“绿色空间”，这些空间是都市现实的零度。第二，都市现实的压力将会冲破生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暴露出国家哲学的荒谬性。这种国家哲学主张，生产与生产劳动所拥有的意义与终极目的不再基于利润。它将产生一种生气勃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意识，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融合，以对后者有所裨益。在此意义上，都市社会将重塑市民社会，并导致政治社会被吸收到市民社会之中，即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的消亡”。第三，一种战略性假设：合法的机构与制度将不断强化都市总问题式意识；转型将逐步通过合法手段发生。

既然我们并不了解该如何去做，我们就无须在这三种战略之间做出选择。唯一有权进行选择的是那些愿意冒风险和担责任的 *E148* 人。在这里，我的意向无非就是概括出各种可能性，指出 *F197* 一条道路，并对各种战略做出区分。

在法国，当都市对象（并没有实际分离）从工业对象中分离出来时，这样的时刻或许会到来。这意味着要么一种新型政治党派形成，要么努力把现有政党纳入都市问题的政治化之中。在此意义上，“左派的危机”可以被解释为：它没有能力分析这些问题或者已经把它们限定得过于狭窄。都市问题不再是市政问题，而变成了国家的与全球的问题。把都市简化为住房以及基础设施，是右派和左派政治生活的狭隘之处。如果它是切实可行的，那么法国“左派”（它的剩余物）必须得了解的最为重要的政治真理便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都市议程，此议程也是日常生活变革的规划，将不会与压迫且单调的都市规划和国家发展规划的局限性有进一步联系。

巴黎的中央广场^①可以起到典范的作用吗？如果是这样，这将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实际上，巴黎中心的命运已经在几个世纪之前就被决定了：奥斯曼的都市规划以及巴黎公社的失败已经决定了其命运。该中心即中央广场(Le Halles)周围的区域，已经再次呈现出令人惊讶的隔离性缺失。各色人等各显其能(人口的比例接近于国家的平均水平，他们分别是：手艺人、商人、劳动者、各种专业人员)。这与邻近的贫民区[如蔷薇街(Rue des Rosiers)以及周边区域]里显而易见的隔离的情况形成了奇怪的对比。不过，手艺人与小店铺的数量开始下降。有钱人阶层回到了中心，他们是让郊区人厌恶的人，就像传统的资产阶级居民厌恶郊区人一样——换言之，这种与生产分离的都市中心的精英式资产阶级化过程，已经持续好多年了。只是最近的到来者，即自由职业者(从事与电影、戏剧、服装以及艺术相关的工作)才会对这个地区房屋进行“现代化”改造，而这些房屋从前是资产阶级的储备品，随后被他们所抛弃[如在马雷

F198
E149

① 这是一块位于巴黎市中心占地十余公顷的空地，自十二世腓力二世定名为中心广场(Le Halles)以来，被反复地改建与重新命名或改换功能。它像一块被诅咒过的永恒工地，不是在重建中，便是在准备重建中，近一百多年来已经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全面拆除和重建。从第二帝国时代末建成即遭拆毁的“市场堡垒”(The Fortress of Le Halles)一直到戴高乐总统时代的“巴黎大堂”(Forum des Halles)，最终沦为人们心目中“巴黎大坑”“市场大洞”(Le Trou des Halles)、“大麻广场”“城市规划的灾难”以及各种暴力和犯罪的策源地。对此广场及其周边建筑物列斐伏尔曾经在其著名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也做过专门分析。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把历史上的政治空间生产为满足于商业交换价值这需要的抽象空间的范例，也就是历史空间进行异轨性改造与使用(retournement/diversion)和再利用(reappropriation)的典范(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p. 167)。——中译者注

(Marais)^①]。虽然这些邻近地区也被看作生机勃勃、如诗如画的，但在这些混居人口中，有相当多一部分生活在贫民窟中。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人组建委员会来反对投机活动、反对巴黎中央地区的拥挤和反对驱逐最贫穷的房客，但这些委员会的存在，就像委员会里面的那些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组织者和成员一样，并不会受到这些活动的威胁。那么这些人怎么了？他们在等待什么？他们等着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工作或者更简单的工作。而另外一些群体代表着所谓的私人利益；他们从事各种活动但不能从事强有力的政治活动。虽然在技术规划上存在着可疑之处，但参加者的态度已经被非常清楚地勾画出来了：这些当权者想在巴黎中心建立一个巨大的金融部门，它将会变成一个政府决策中心。所谓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希望看到有便宜的居住场所建造在这些地点上。两种庸人彼此攻诘对方，一方是官僚式的，另一方则是选举式的。

F199

认识论的战略包含：(1)对所谓的都市规划的彻底批判，包括它的含糊性、矛盾性、变种，公开声明的以及隐藏的；(2)发展关于都市现象的科学，以其形式与内容为开端，目的在于通

① 马雷(Marais)是巴黎一处拥有众多名胜古迹的地区，位于第三与第四大区。该区是17世纪巴黎最为时尚的部分，因此很快便被巴黎贵族与富人们所居住。该区域变成了艺术与文化的中心。不过马雷经历的是从18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这一段衰退时期，因许多居民搬迁到更为时尚的圣奥诺雷区(Faubourg Saint-Honoré)和圣日耳曼区(Faubourg Saint-Germain)而得以复苏。这些新街区提供了明亮与开放的空间，这一度是马雷狭窄街道与小院落所短缺的。在经历了贵族成群结队的迁徙之后，该地区主要被轻工业者与手工业者所占据，并居住着大量的犹太人社团，主要沿着蔷薇街(Rue des Rosiers)依顺排列。马雷在1962年被划为名胜古迹区，从那时起便开始了一场复原历史的努力。而在近些年内，该地区又一次变成巴黎中心最为时尚的街区。——英译者注

过这两方面的统一而达到趋同。

E150

政治战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把都市总问题式移至前台而将其引入(法国的)政治生活中。

第二，以一种**普遍自治**的形式为开端，发展一项议程。已经被引入工业中——并非没有困难——的自治可以“引发”都市自治。这也能够移至前台转而引发工业中的自治实践。但都市生活与工业二者都要求的不仅仅是自治。光靠自身的力量，指望每个孤立的单位，注定是失败的。都市自治问题与那些工业自治问题不可分离，却比后者范围更广泛，因为它们也牵涉市场与对投资的控制，即一项总体的议程。

第三，把都市总问题式引入到扩大的、变革性的和具体化的“**城市权利**”(droit à la ville, 英文 *right to the city*) 契约系统之中，这种权利不会在中心性及其运动中被排挤出局。

第八章

都市幻象

我们现在可以给出一个关于都市规划(l'urbanisme, 英文 F200/
urbanism)的客观性定义,可正式将其界定为“人类居住于大地之 E151
上的石头、水泥或金属等物理性踪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概念
工具对这种活动做出激进批判,即主张控制都市化和都市实践进
程并使其安分守己。我们对这种活动的知觉不同于其对自身的察
觉:同时既是艺术又是科学、既是技术又是知性的。然而,这种
统一的特征是一种幻象。事实上,当近距离审视都市规划时,它
便会变成碎片。有几种都市规划:人道主义的都市规划、开发商
的都市规划、国家及其技术官僚的都市规划。第一个群体主张一
种抽象的乌托邦;第二个群体兜售都市规划,即幸福快乐,一种
生活风格,某种社会身份;而第三个群体的活动一如国家的活动,
是分解化活动,它把意志与表象、制度与意识形态分解开来。这
些同时来自于国家都市规划的两方面压迫,并未提供一个它声称 F201
拥有的统一的、严密的秩序特征。有些人可能要反驳:“如果没有
都市规划专家,就会出乱子。”虽然会有混乱,但它是某种强加的
秩序导致的后果。由于缺少一种合适的方法论(辩证法),都市规 E152
划专家的理论,无法解释都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二重性,即其极
端复杂性和冲突性的特征。虽然都市规划专家很早就认识到,由

于空间、时间、地点和自然“元素”的匮乏会带来新的紧要性与问题，但很难说这就是都市规划专家的功劳。

都市幻象与另外一些幻象密不可分，由于使用同样的知识战略，其他幻象也会受到指责。“幻象”一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极性。它并非某种形式的人身侮辱，或某种尤其是为反对任何人做出的归谬论证^①。那些对幻象做如此解释的人，不过正承受着出于内疚的折磨而已。难道有人能够摆脱一切幻象吗？最为持久、最为有效的幻象是阶级的幻象，与知识性或个人性的错误相比其起源更为高级和遥远。尽管这些阶级幻象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但它们的轨迹却超出了头脑的想象。

F202 哲学的幻象来自于部分哲学家的信念，他们相信能够把世界纳入某个他们自己设计的体系之中。他们假设自己的体系是基于先例的，因为它包罗万象并且被打造得严丝合缝。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超出任何哲学体系之外的东西。哲学活动并不是唯一尊贵的活动。多少年来，哲学与艺术不分高下，因为它占有着某些属于作品的无与伦比的东西：某些独一无二的、极其珍贵的、无可替代的东西。无限期地构建体系，不断地失望又不断地修改，这难道不是一种幻象吗？当一种体系化的无限完美性的观念，与体系本身的内在完美性的观念发生冲突时，哲学幻象便可被意识到。

E153 国家的幻象是巨大的与荒唐可笑的规划的一部分。国家能够管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事务。它乐意指导我们的意识，似乎它是某种高水平的管理者。凑巧的是，国家作为人格化的神，会成为

^① 归谬论证(argumentation ad hominem)也可译作“人身攻击”。——中译者注

地球上的事物与有意识存在的中心。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幻象只要被阐明便会土崩瓦解。但这并不是实情。国家幻象置身于如下人物的规划与雄心之中，他们很渴望成为且自封为被选举的行政官员、高级或低级的管理者、政治领导人。国家观念正好体现出这样一种规划，即它是仅仅被秘密地承认的。一旦这种规划丧失了信誉，一旦它被思想与意志所抛弃，国家便开始衰落。

都市幻象与以上讨论的两种幻象密切相关。就像古典哲学，都市规划声称是一种体系。它自称接受、包括与占有一种新的总体性。它想成为现代的城市哲学，而后者已经被(自由的)人道主义证明合法，并正在为一种(技术官僚的)乌托邦作辩护。 F203

反过来讲，无论是善良的意志，还是良好的意识形态动机都不能成为借口。事实上，良好的用心与高贵的灵魂只会使局势恶化。我们如何界定都市规划的根本空白点，即究竟是私人性的知识还是公共性的制度呢？那些反对和排挤都市实践的人，实际上对它并没有过多的研究。但对于都市规划专家来说，这种实践正好是我在稍前处所讨论过的那种盲域。他们靠它过活，他们身处其中，但他们就是没有看到它，当然也就不能如其所是地把握它。他们完全心平气和地用空间、社会生活、各种社会群体及其关系的表象来取代实践。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表象——也就是他们所提供的逻辑与策略——来自何处或者意味着什么。而如果他们确实知道，那么他们的知识便是不可原谅的。他们意识形态外壳的破裂露出一具怪异的裸体。

在官僚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性活动完全脱离了规划者与开发者的控制。技术人员与技术官僚被要求提供建议。人们至少在大多数时间是彬彬有礼地坐在周围聆听的。但他们并不是决 E154

F204

策者。尽管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僚做出了努力，但他们无法摆脱已经赋予他们的地位，即压迫集团或等级的地位，他们已经变成一个阶级。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官僚而言，空间是他们未来的剥削地盘，他们的胜利区域。空间是可用的。为什么？因为它几乎是空的，或者说看起来是空的。企业、生产单位以及建立起来的网络，被嵌入空间但并未塞满它。自由空间属于思想和行动。技术官僚的思想在空洞的空间表象与弥散性空间之间摇摆不定，前者差不多是几何学的，只被概念以及高度理性的逻辑与策略占有，后者则被这些逻辑与策略的后果占据。他们竟然未能察觉到每个空间皆是产物，这种产物并不能从概念思想中产生，因为概念思想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是直接的生产性的。空间作为产物，来自于被某个活动集团所控制的生产关系。都市规划专家似乎对以下事实毫无察觉或者有所误解：他们自身在生产关系中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使空间生效，却不能控制空间。他们服从于某种社会命令，这种命令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对象或产物(商品)，而是指向一个整体的对象，它是最高的产物和最终的交换对象——空间。现在看来，商品世界的展示所影响的不仅仅是物，还有它们的容器，它不再局限于内容或空间中的物。最近，空间本身开始被购入与出售。不是土地、土壤，而是社会空间本身，因为这种目的或者合目的性(可以这么说吧)而被生产出来。空间不再仅仅是中立的媒介、地点的总和，在那里剩余价值被创造、实现和分配。它变成了社会劳动的产物，非常一般的生产对象，从而是剩余价值的构成物。生产就是如此在其新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中变成社会性的。在过去，这还是无法看到与无法预言的事情，因为那时生产与生产的社会本质

F205

E155

还仅仅是根据企业和企业的生产劳动情况来考察的。今天，在空间的社会生产中，这种体现在生产力之中的生产劳动的社会性（整体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久前，除了某种物的生产之外，我们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去想象“生产”，这是定位于空间中的某个地方的物：一件普通的物品、一台机器、一本书、一幅画。今天，空间作为产品，以购买、出售与交换的方式，使其各个部分作为整体进入到生产之中。不久之前，土壤作为一种可定位的、可辨认的空间，仍然属于神圣的存在整体——大地。它属于某种被诅咒的、因而也是神圣的角色、所有者（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是家园的所有者），是某种来自于封建时代的遗留物。今天，这种意识形态与相应的实践正在解体。某些新的事情正在发生。

就其本身而言，空间的生产并非什么新鲜事。统治集团总是在生产一种特殊的空间，古老城市的空间、乡村的空间以及所谓会变成自然风光的空间。所言之新，是指世界性与总体性的社会空间生产。这种生产活动的大规模扩张为的是那些发明它、管理它并从中获利的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已经筋疲力尽。它在征服空间中——在微不足道的条款中，在不动产的投机、资本的规划（城市的里里外外）、空间的买卖中——发现了新的灵感。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情。这是（无法预见的）生产力社会化的道路，空间本身生产的道路。资本主义为了幸存，首创了这种方式。这种策略逐渐地超越了简单的出售空间的范围。它不仅把空间纳入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而且试图将生产完全重组从而使其从属于信息与决策中心。

F206

都市规划容纳了这项巨大的操作，但掩饰了它的根本特征、意义与目的。在其人道主义与技术决定论的善良外观之下，都市

E156

规划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策略：控制空间，扼制一般利润的下降，等等。

F207 这项战略吞没了“用户”“参与者”和单纯的“居住者”。人不但被还原为只是作为一个居住者而发挥功能(居住作为功能)，而且被作为空间的购买者，一个实现其剩余价值的购买者来看待。空间变成了各种功能得以实施的场所，其中最重要和最隐蔽的方面在于，它以各种新颖的方式构成、实现和分配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是使剩余价值普遍化)。

都市意识形态夸大了它所鼓励的所谓规划活动的重要意义。它给予那些使用这些表象的人们一种印象，即以创新的与实证的方式管理人与物的印象。不知道是否出于天真的缘故，许多人相信他们决定着并创造着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人类关系)。在此，城市幻象唤醒了有些催人昏睡的建筑师的神话。在新的意识形态中，旧的神话彼此相互适应且相互支撑。这里出现了一系列的寄生物(有些是癌性的)，它们被嫁接到真实的知识与具体的实践之上(这种来自于用户的实践，依然依赖于使用价值)。

E157
F208 意识形态及其运用(通过相应的制度)淹没了现实的实践。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商品世界、交换价值的逻辑和语言、与每一个对象挂钩的符号和意义系统)，使用(使用价值)被弃置一旁，淹没在都市表象之下，淹没在大量涌入的刺激和动机之下。使用的实践消失了，陷入到沉默和被动之中。由于既得利益的消极性，令人吃惊的悖论由此产生了。有很多原因促成这种情况。在此我将考察其中一个，当然并非是最无关紧要的：作为(栖居、都市现实的)实践的简化的都市意识形态。事实上，任何意识形态都不会满足于只充当单纯的简化者。它会系统地进行推广和推断，似乎它

控制与掌握着一切问题的要素，似乎它依靠并通过某种总体理论、一种直接可以运用的理论，已经解决了都市总问题。

一旦这种推广趋向于某种治疗性的意识形态时，它便会泛滥成灾。都市规划专家想象自己正在呵护和治疗一个患病的社会、一个病态的空间。他感觉到空间的疾病，这种空间最初被抽象地构想为某种可利用的空白，而后被碎片化为局部的内容。最终，空间自身变成了一个主体。它忍受着病痛，日益病弱不振，它必须关注自身从而使自己恢复(道德的)健康。都市幻想到达了谵妄状态。空间以及空间的思想，引导着思考者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它变得精神分裂，并想象一种精神疾病——社会的精神分裂——即把它自身的疾病、空间疾病以及精神眩晕投射在社会之上。

如果去看一看形形色色的都市规划师的建议，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没有走得太远。他们局限于把空间切割成方格与四方形。技术官僚对他们头脑中与工作观念中所要进展的东西浑然不知，从而深深地误判了在他们的盲域中正在展开的以及没有展开的东西，最终，技术官僚精密地组织了一个**压迫性空间**。对于这些，他们具有清楚意识。但他们对空间包含某种意识形态(*idéologique*) [更确切地说，一种**观念逻辑**(*idéo-logique*)]全然不知。他们对以下事实全然不知或装作不知，即具有国家的一种功能并依赖于技术和知识客观性外表的都市规划，是某个阶级的都市规划的形式，并包含着某个阶级的战略(某种特殊的逻辑)。在此领域中，它是作为“技术阶层”(technostructure)而在企业中发挥效应的吗？(这种效应包括维持着现存的生产关系，确保着它们的幸存与发展)。E158

我们有理由怀疑。因为确切地说正是在这个部门中，从属于经济与

政治的权力机构[加尔布雷斯(Galbraith)^①语]的技术阶层与“补偿权力”实现了其效益的“最优化”，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让逻辑与战略隐藏起来，使战略表现为逻辑，从而使战略获得必要性的特征。

F210 都市规划作为现行的框架之中的存在，即作为功能性整体(虽然这不会而且也许不可能得到承认)而存在，它已经不可能逃脱以上所描述的持久的危机，并仍然处于一种受辱状态。都市规划专家不能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也不能找到自己的角色。都市规划发现自身处于特殊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处于那些依照“私人利益”而做出决定的人，与那些依照更高的制度与权力而做出决定的人之间。在新自由主义(作为“自愿”或“双方同意”而介入规划与行动之中)和新干预主义(为“自由企业”留下活动空间)之间，它依靠做出妥协为生，即都市规划专家陷于两者的冲突之中，陷于开发商与权力机构的裂缝之中。对于都市规划专家来说，最理想的状况是表象与意志之间发生(无意识的)冲突，而这包括政客之间的冲突。都市现实及其总问题式在面对理论和分散的表象(“环境”“基础结构”)以及技术(咨询公司、办公室以及制度)中的实践时便会解体。都市规划与都市规划专家能够接受的仅仅是这种碎片化；实际上他们也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在他们行动时，它就一直具有一种“官方的”能力。与此同时，都市规划自称是一种学说。它在理论、逻辑、策略上趋向于统一。但当一种统一化的功能表现出来并发生作用时，这种统一性便消失了。这就是利润的策略，或者说工业空间的逻辑、交换的逻辑和商品世界的逻辑。

^①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译者注

辑……

都市规划作为一种表象形式，无非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 E159
根据语境，要么声称是“艺术”，要么声称是“技术”，要么声称是
“科学”。这种意识形态假装是直截了当的，然而它混淆是非，藏
匿不可言说之物：这就是说它掩盖它所包含的作为意图的有效
的形式。都市规划包含着两方面的拜物教。首先，它包含着一种满
足的拜物教。何谓既定的利益？它们一定是被满足的，从而它们
的需求一定是要取得理解与迎合的，且是不可改变的。这些需要
一次又一次地被修改。隐性的假设是，因为那些既定的利益表达 F211
过它们的需要，或者因为专家们对需要有过研究，因此我们能够
认识需要。我们能将需要归类。我们要为每一种需要提供一种对
象。这一假设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特别是因为它忽略了社会需
要。其次，它包含着一种空间的拜物教。空间是一种创造物。谁
创造了空间，谁就创造了空间中的填充物。场所造就了事物，好
的场所造就了好的事物。这种空间拜物教导致了模糊、误解、一
种独特的摇摆不定。

要么是空间出现了问题，该受到指责的不是人类而是空间的
职能；要么是在好的空间中，人类出现了问题而且不能被饶恕。
空间拜物教也并非没有矛盾，因为它无法解决使用与交换之间的
冲突，即使当它粉碎了使用与使用者双方时。

我与其分析空间的矛盾，不如阐明都市规划以及更一般意义
上的置业公司(投机活动与结构)在新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挥的作
用。房地产作为第二部门(即与资本主义生产并行的一个循环)，
服务于非耐用资产市场，这些资产并不比“建筑物”更耐用。这种第

E160
F212

二部门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在该部门，几乎没有“乘数”^①(multipliers)，也很少出现。资本与房地产捆绑在一起。虽然整个经济(所谓的国内经济)不久会变差，但该部门的作用与功能会继续增长。由于最重要的循环——当前的工业生产与流动资产的结果——开始慢下来，资本移向第二部门，即房地产。更有甚者，房地产投机变成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换言之，成为实现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在工业中形成和实现的整个剩余价值，它的百分比开始下降，正因如此，百分比的创造与实现是通过房地产投机与建筑业的增长完成的。第二次循环取代了第一次循环，变成根本性的东西。正如经济学家常常所说的，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况。房地产发挥的作用在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在西班牙与希腊)经常得不到理解，很少有人将它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机制中加以理解。它是问题的来源。在此，之前讨论过的“补偿性权力”开始起作用了。不过，都市规划作为意识形态和制度(作为表象与意志)，掩盖了这些问题。它似乎包含着一种回应，并因此妨碍了他们理论研究的需要。都市规划被置于两个部门之间的交错点上，即动产的生产与房地产的生产的交错点上，它掩盖了这种交错。

F213

都市规划是阶级的，虽然人们对此并不了解。当都市规划专家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会变成犬儒主义者或者干脆顺从一切。作为一个犬儒主义者，他可以出售自由、快乐、生活方式、社会生活，甚至共同体生活，为满足现代的暴君设计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村庄。

都市规划因此遭到激进的批判。它掩盖了某种情境，隐藏了运作，遮挡了视野，阻塞了通往都市认识与实践的道路。它导致

^① “乘数”是宏观经济学的—个术语，指每单位外生变量(如政府支出或银行储备)的变化所带来的引致变量的变动情况(如GDP或货币供应)。——中译者注

了自发的城市和历史城区的衰退。它包含了权力的干预，而不仅仅是知性的干预。它仅有的整合性的逻辑，就是国家的逻辑——空洞无物。国家只能是分化、瓦解、挖空的巨大的空洞。广场与林荫大道建立在它所具有的想象之中，形成一幅力量与制约的画面。 E161

都市规划阻止了思想对可能性进行考察、对未来进行反思。它把思想封锁在某种状况之中，在那里，三种术语——批判性思想、改良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极左反对派——相互冲突，这是一种思想必然从中逃脱的状况，一种都市规划与都市规划专家防止它从中逃脱的状况。

然而并非一切有关都市规划的事情都是消极的。更为特别的是，它无非是“炫目的(aveuglant)与被蒙蔽的(aveuglé)”之间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都市规划者相信自己变成了具有广泛观念的、跨学科的人，空间与人类关系的创造者。更有甚者，都市规划专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与信息。都市规划者预料到了新的匮乏的出现，并对它们进行了偶尔的探索：空间、时间、欲望以及要素(水、空气、地球与太阳)。当然，都市规划者试图回避关于匮乏的(社会)管理的这一具体和基本的问题，这种匮乏(在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取代了旧的匮乏。都市规划者时常意识到人们要求的“自然”与人的本质问题的重要性。他对空间的解读鼓励其去解读自然，也就是如何破坏和毁灭自然。事实上，勒·柯布西耶的文本就是在此意义上(即“症候性地”而不是文字性地)被解读的。某些所谓的都市规划者的著作，虽较少为人所知，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都市规划的话语有时候通过都市实践的话语来表达。某个关于未来与可能性的已经变形的画面，仍然包含着它们的踪迹与标志。都市规划专家规划中的乌托邦部 F214

E162 分虽然通常被广泛地当作技术与技术主义的滥用所掩盖，但作为某种先驱的征兆并非全然无趣，它标志着—个没有解释的总问题式。这绝不意味着存在着某种都市规划的认识论、一种可以现实地产生某种都市实践的理论内核。并非如此。事实上，我所阐明的论点恰恰相反。眼下，作为走向未来的一个漫长时代，最为需要的是归类概括，我们要提供验证的概念(范畴)，我们要探索可能的不可能性，而我们要想到这一点就要通过传导法。

F215 问题在于都市规划是否能起到意识形态在 1845 年左右(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所起到的作用，当时有关工业现象的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革命的)思想正在形成。这种貌似粗糙的解释包含着一种溢美之词。教条主义的都市规划师有如黑格尔、傅立叶、圣西门、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眼界吗？即使我们拿他们与那些不重要的意识形态家(如鲍威尔^①与施蒂纳^②)相比，而不

① 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 1809—1882)，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与神学家。1848 年革命之前，他曾是一位左翼黑格尔派成员，并对黑格尔的共和思想做过阐述。作为一位神学家，他把宗教描述为一种异化形式。在革命之后，鲍威尔拒绝了黑格尔并断言欧洲出现文明危机，其著作据说对尼采、恩格斯以及卡尔·考茨基产生过影响。鲍威尔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他的著作很少被翻译成英语。可参考的著作如下：*Christ and the Caesars: The Origin of Christianity from Romanized Greek Culture*, trans. Frank E. Schacht (Charleston, S. C.: Davidonis, c. 1998) 以及 *The Trumpet of the Last Judgement against Hegel the Atheist and Antichrist: An Ultimatum*, trans. Lawrence Stepelevich (Lewiston, N. Y.: Mellen Press, 1989)。——英译者注

② 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 1806—1856)，原名 Johann Kaspar Schmidt，德国反国家主义哲学家，许多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他的著作中找到了思想的启发。他有时也会被视为 20 世纪存在主义的一个来源。与鲍威尔一样，施蒂纳一开始是左翼黑格尔派，但他抨击了鲍威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思想，认为他们是激进主义。施蒂纳认为唯一的现实是个人的自我。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英语，其中最有名的是 *The Ego and His Own: The Case of the Individual against Authority*, trans. Steven T. Byington, ed. James J. Martin [New York: Dover (1973)]。——英译者注

是与伟大的理论家相比，我们也仍然把目标定得太高了。更严格地说，都市规划可以与普通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相比较。这些经济学家对批判性观点几乎没什么兴趣。有时候，他们用其他语言说着和马克思主义相同的东西。例如罗斯托^①，他把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原始积累”概念称为“起飞”(takeoff)。他们的方案时常包含着一种策略性因素，即他们称为“可操作的”事物。这种策略的特征很容易通过分析或运用而被察觉。更为经常的是，被经济学家使用的抽象模式被安全地闲放在抽屉里。商业总经理与政治家做他们的乐意之事。都市规划专家不也是这样的吗？

都市规划因其模式依然存在着一一种障碍。这再一次反映了当代政治思想与科学思想中的一种内在的冲突，也就是道路与模式之间的冲突。为了清理出一条道路，我们不得不毁灭模式。 E163

如果说周围的意识形态是混沌一片，那么需要强调的是，我对都市规划的批判是一种左派的(来自于左派的)批判。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批判，均将都市规划斥责为一种制度却颂扬开发商的主动精神。这为资本主义的开发商留下了通道，他们现在能够在不动产部门做有益的投资；都市幻象时代已经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适应的机会。对都市幻象的激进批判为都市实践以及与这种实践相关的理论开辟了道路，都市实践及其理论将会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携同进步(只要这种发展比经济增长及其 F216

^①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 W. Rostow, 1916—2003)，美国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提出经济增长五阶段的理论模型，包括他所谓的“起飞模型”，它建立在18、19世纪西方(主要是英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参见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英译者注

意识形态与战略有更大的重要性)。

无论是从私人企业到国家，还是从个人主动性到政治家长制，在谈论这些方面时，这种来自于左派的批判，相对于仅仅是拒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做法而言要走得更远。这种批判只能通过拒斥国家、国家的角色、国家的战略以及空间的政治这些做法，来达到这种激进性。为此，它需要证明都市的升级与以下几种观点同时联系在一起：拒绝把经济(量的)增长作为自身的目的，根据生产的方向来实现其他目的，把(质的)发展的优先性放在经济增长之上，把国家(这一典型的限制器)限制到一个从属的地位上，简而言之，它是对国家与政治的彻底的批判。

F217 最糟糕的乌托邦依然是无名之物。都市幻象属于国家。它是国家的乌托邦：就像阻挡山路的一片乌云。它既是反理论的，也是反实践的。

E164 什么是都市规划？它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一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与“组织化的资本”并非一回事。换言之，它是一个消费引导型官僚社会。都市规划组织是一个看上去自由与通畅的区域，向合理性活动开放(即居住空间)。它控制着空间与居住的消费。作为上层建筑，它必然不同于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身。在都市规划与“都市”之间，即在都市实践与都市现象之间，存在着一些混淆。这种混淆可以用来解释一种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虽然它表面上提出了有力的和严厉的批判，但在它那里都市现象本身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而已。这些意识形态把实践与意识形态、社会与制度关系混为一谈。尽管如此，只有从意识形态与制度性的观点来看，都市规划才向批判性分析展现了它所隐藏并促成其实现的都市

幻象。就此而论，都市规划表现为某种有限度与有倾向性的合理的媒介，在此合理性中，欺骗性、中立化与去政治化的空间构成某种对象(实在事物)。

第九章

都市社会

我们在前面把都市社会概念当作一个(科学的)假设来阐发, F218/
现在可以沿着有所不同的方向前行。它已经从以前的理论位置 E165
中解脱出来, 我现在希望读者对这一事实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不过, 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而如果做出那样的声明, 将会是一种
教条主义。如果我们非要这样做, 那就意味着把“都市社会”
概念塞入一个可疑的认识论之中, 对于此认识论, 我们应当警
觉, 因为它尚不成熟, 它把范畴凌驾于总问题式之上, 因此,
应停顿一下, 并且转换一下, 当务之急是把都市现象引向认识
的地平线。

都市社会概念已经把自己从绑架它的神话与意识形态中解
脱出来, 且不论它们是源自于历史的与意识上的农业社会阶段,
还是源自于法人团体领域(工业理性主义)表象的过度膨胀。神
话变成了文学的一部分, 它们的诗性与乌托邦特征的吸引力一
点儿也没有减少。我们也知道, 意识形态在广为人知的都市规
划学说体系的发展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若要继续在盲域中进
行探索, 我们就得抛弃此晦暗的、沉重的体系(身体): 即作为
整体的都市化现象。 F219
E166

有时候, 无意识(被误解者与误解者之间的界限)表现为对

过去的乡村与工业所表现出的迷惑与眩晕，有时候则表现为对正在溜走的都市现实的失落感。

由此方式，某种**关键的领域**(*zone critique*)概念或关键的阶段概念进入眼帘。在此领域中，地形展现于我们面前，而脚下则布满雷区，陷阱重重。虽然旧的概念不再奏效，新的概念却开始形成。现实并非唯一要离去的事物；思想本身开始退却。

不过，我们依然成功地阐述了一个严密的话语，即非意识形态的，以及既是都市的(内在于一个正发生的城市宇宙中)又是关于都市的(描述它、勾勒它的轮廓)话语。这种话语从来不会走向终结，它的不完备性是其存在的本质部分之一。它被界定为对未来的一种反映，包括在时间中以及空间中的操作：是**传导**(*transduction*)(对潜在对象的构造)以及对可能事物与不可能事物的一种探索。被知识论与认识哲学清除的时间维度正在被成功地重新引入。然而传导并不是一种展望。像都市规划一样，展望已经备受质疑；像都市规划一样，展望包含着某种战略。它把意识形态与科学性混合在一起；毋宁说，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科学性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移植在真实的但又是碎片化的知识之上的赘瘤。像都市规划一样，长期的规划也是从一种还原论的立场上推断出来的。

在此探索过程中，都市现象表现出某种超出了(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之外的东西。我这样说是为了回应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形式，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变种之一。都市总问题是世界范围的。这些问题连同失败的回应，同样可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发现。都市社会只能被界定为全球性的。事实上，它通过重造自然而笼罩了整个星球，后者已经被工业对

F220

E167

自然资源(物质与“人类”)的掠夺彻底摧毁,即被所谓的自然特性之毁灭摧毁。

再者,都市现象深刻影响着生产方法: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在一个全新的平面上,它同时扩大和增强了生产性劳动的社会特征及其与所有者即生产资料私有者之间的冲突。“社会的社会化”持续不断,换言之,都市化并没有消除工业矛盾。它并没有解决矛盾,唯一的原因就是它已经成为统治者。除此之外,还有生产内部的矛盾(即在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包括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还有“社会主义”社会)阻碍都市现象,妨碍都市发展,制约它的增长,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行动与国家社会主义的行动而言特别真实。 F221

综上所述,随着从乡村走向工业以及从工业走向都市,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这个多方面的复杂化,既影响着空间也影响着时间,因为如果没有时间与持续发生于时间之中的复杂化,那么空间的复杂化与占据着空间的物体的复杂化便不会发生。

空间被一连串受干预的网络与关系所把持。一方面,其同质性与制度、一体化的战略以及系统化的逻辑相呼应;另一方面,其同质性又与其还原性与持续不断的简单化、表象化相呼应。与此同时,寓于这种空间之中的差异性愈来愈受到强调,这种空间像任何抽象空间一样倾向于同质化(即成为数量化、几何学化与逻辑化的空间)。这反过来导致了一种冲突和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感觉。因为这种空间倾向于实现一种独特的符码、一种绝对的体系、一种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体系、一种逻辑的事物体系和一种事物的逻辑体系。与此同时,它充斥着次生体系、 E168

F222 局部符码、讯息与能指，它们无法变成统一程序的一部分，即空间以各种方式所规定的、预定的与铭记的东西。

复杂化的主题被哲学性地呈现出来。而有时它至少针对特定的作者(如德日进^①)而言是存在的。在这里，复杂化的主题与一种科学认识联系在一起，这种科学虽然是碎片化的，但是却十分有效：譬如信息理论、讯息理论、编码与解码。因此我们可以再次声明这个复杂化主题是元哲学性的——既是整体性的，也是连接性的(articulée)理解。

复杂化主题持续不断地起着作用。它理论性地建立于增长与发展的区别之上，建立于由时代、经历、后果考量所造成的差异基础之上。马克思之所以把增长与发展区别开来，仅仅是因为他想避免任何把质与量混淆的做法。但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数量化的)增长与(质性的)发展应该而且必然是同时发生的。不幸的是，历史表明并非如此。增长可能是在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有时发展却可以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发生。半个世纪以来，增长已经在世界每个角落起着作用，与此同时，顽固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却依然保持着现状。虽然苏联在1920—1935年间经历过一个快速发展期，但生产力并未跟上上层建筑的膨胀，增长被视为一种战略目标——手段变成了目的——简而言之，这些客观的“要素”做出了它们的报复。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列宁所说的不平

F223

①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本名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德日进系其中文名字，曾在中国生活过二十余年。——中译者注

衡发展会被延伸、扩大，并按照一种它可以为增长与发展的冲突做出说明的方式被规划，20世纪的进程暴露了这种冲突。

复杂化理论企盼着发展对增长的报复。这同样适用于都市社会理论。这种报复才刚刚开始。这个命题依然是一个悖论：增长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如果没有灾难的发生，手段依旧会变成目的。 E169

这些思考呼唤着都市，也就是说都市社会将以其潜在性与地平线席卷全球。毫无疑问，这种延伸与扩张并不会免除问题。实际上它表明都市现象倾向于冲破边界，而贸易交换与工业和金融组织似乎一度取消了这些领土边界(通过跨国的全球市场)，现在看来在重新固化它们。无论如何，工业与金融(过度生产的危机、金融危机)中的某种可能的断裂所产生的影响，会由于都市现象扩张与都市社会的形成而加剧。

我已经引入的“世界城市”(ville mondiale)概念，通常被归属于毛主义者所为，假使不是毛泽东本人的话。我现在来阐发此观念。这种世界城市把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概念与形象扩展至全世界范围：一种管理、保护和经营某广阔疆域的政治中心。这适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框架之内的东方城市。而都市社会却不能单单依靠古代城市的废墟建立起来。这种碎片化(扩张与内爆)应该被视为都市社会的前身(先驱)。它是都市社会问题框架的一部分以及先前的关键性阶段。不过，作为一个已知的战略，它特别利用了都市规划，倾向于把政治城市作为**决策中心**来展示。这个中心显然不能局限于收集上游信息并将其分发给下游。它并非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决策中心，而且是一个**权力中心**。然而权力要求财富，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在我们正在分析的战 E170

略中，决策中心将是一个连结点，连结到高度组织化和严格体系化的国家的土壤之上。从前，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而言，整个大都市领地发挥着中心作用，它榨取财富，强制实行其固有秩序。今天，统治被固定在一个物理位置、一个首都(或者一个决策中心，即不一定需要与其首都完全协调一致)之上。结果是控制遍及整个国家领土，此国家领土被转变为半殖民地。

F225 初看起来，我的分析似乎部分证实了所谓的毛主义者对世界城市的解释，但这种解释遭受了许多异议。这并没有妨碍权力中心从遭遇的障碍与失败中挣脱出来。此外，任何矛盾不再发生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权力中心与其他中心形式之间，在“财富—权力”中心与边缘之间，在一体化与分层化之间，基本矛盾转移到都市现象本身之中去了。

对于关键性阶段的完备考察将远远超出本书能胜任的范围之外。例如，古典的历史与历史性的概念还能留下什么？关键性阶段可以留下的既不是这些概念，也不是与之相关的现实。都市现象的扩张，全球范围内的差异性时空的形成，难道会与我们一直称为“历史性”的东西有任何关系吗？

E171 这个关键性阶段与复杂性的出现、新功能和结构的出现相伴随，但这并不意味着旧的必然会消失。因此，我们需要反复分析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而且要不断完善这种分析。这里我把自己限定在最基本的轮廓上，此轮廓构成一个便利的标志
F226 与指导性的箭头。最为重要的事情是阐明辩证法是能够复仇的。辩证法正在复仇。辩证法思想被企业理性主义与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的)战略弃于一边，被可操作的辩护术所取代，被那些重视还原与普遍化(主要是结构主义)的程式所反对，它需

重申自己的权力。如前所述，关键问题在于要想充分和精确地理解“集中化”一词，需要一种辩证的分析方法。对空间逻辑的研究引向对其矛盾(还有时空的诸矛盾)的研究。没有这种辩证的分析，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一种掩饰性策略，掩藏于表面的科学性背后。在理论层面上，对都市规划学说最为严厉的批判之一是(并不完全成功)，批判它保护了某种社会逻辑与某种战略，同时从总体上抽空了辩证的思想，特别是与都市规划相关的独特的辩证运动。换句话说，既是旧的也是新的内在矛盾(彼此激化与掩盖)。

都市现象是社会学家长期孜孜以求的总体社会现象吗？既是又不是。说是，是因为它趋向于未曾实现的总体性，本质上是总体化(集中化)，但这种总体化从未产生过效果。在此意义上，并没有局部的决定论和零碎的知识可以穷尽它；它同时是历史学的、人口学的、地理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符号学的，等等。都市现象作为总体既“是”那些学科对象又是它们之外的更多的东西(物或非物)：例如形式。换言之，某个真空，但却是一个需要或要求内容来填补的真空。如果说都市是总体性的，那么它并非那种把内容积累在一起意义上的事物形式的总体性；而是思想方式存在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持续不断地进行无限地集中化活动，但从未控制与维持这种集中化状态；它持续不断地收集着要素，并以一种新的和不同的集中化形式来探究所收集的东西。集中化确定了乌托邦(它无处可在却一直在寻寻觅觅)，乌托邦也规定了集中化。 F227 E172

但我们不能用碎片与内容的隔离状态，或通过把它们混为一团，来规定(和表达)所谓的都市现象。因为都市现象是总体

性的阅读，是把地理学家的(部分是阅读性的)词汇、人口学家的词汇、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词汇、符号学家的词汇和其他人的词汇并为一体。这些阅读发生于不同的层面上。都市现象并不能被视为这些阅读的总和、综合或叠加物。在此意义上，它并非一个总体。与之相似，它克服了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隔阂，但偶然与必然的综合并不能规定都市现象，假如说这种综合是不可规定的话。这不过是都市现象悖论的重复，这种悖论并不逊色于思想和意识的基本悖论，因为它必定是同一的。都市是特别的，它被局部化与聚焦化。它被局部地增强，而且如果不被局部化或集中化便无法存在。思想与思想活动将不会发生，除非它们将自身定位。事实、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它是被给定的。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要求。近距秩序围绕着一个点出现，这个点被视为一个(瞬间的)中心，它是被实践制造出来的，且可以通过分析加以把握。这表明一种同位化。与此同时，都市现象是巨大的；它惊人的延伸—扩张是无法被掌控的。当近距秩序被包围之时，远距秩序群体则以其别致的特殊性，按照它们的差异化即异域化的方式聚集。但同位点与异位点在各个地方一直发生着冲突，正在生成着别处。差异的集中性就其本性而言虽然在所难免，但其后果会被再吸纳到时间—空间的结构中。在此意义上，特殊的与巨大的、地点与无地点(别处)、都市秩序与都市无序的辩证运动呈现为形式(将自身展现为形式)。

F228

E173

都市并非像农业或工业社会那样被生产出来。然而，作为一种聚集与分配的行动，都市确实是创造性的。与之相似，制造业一度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和经济范畴，这仅仅是因为它把劳动与工具(即技术)整合在一起了，而从前它们是处于分散状态

的。在此意义上，都市现象包含着某种实践(都市实践)。就其本身而论，都市现象的形式不能被归结为其他形式(它并非与其他形式和结构同构)，但它却可以吸收和改变它们。

作为某种形式去接近都市现实的那套程式，一旦完成了任务它就会自动地颠倒过来。因此我们可以运用语言学来规定同位化与异位化。这些概念一旦出现于都市文本中，就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这难道不是因为人类的居住方式获得了它的形式并且呈现在话语之中吗？存在着都市的话语(*discours*)与路径(*pa-icours*)。难道不是因为这种理由或形式因，语言才具有了不同的话语和路径吗？它们彼此不可分割。虽说彼此不同，但语言与居住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惊讶地发现，存在着一种都市的词法(高级的与低级的、私人的与公共的)，就像存在着一种栖居的词法(开放的与封闭的、私密的与邻近的)一样，尽管都市和居住皆不能通过某种简单话语或某个体系来加以规定。如果说在都市与居住中包含着任何内在的逻辑，这也并不是某种体系(单纯的主体或客体的)逻辑，而是思想(主体)的逻辑，它在寻找某种内容(客体)。因此，我们对都市的理解要求我们，既要放弃主观性的幻想(表象、意识形态)，也要放弃客观性的幻想(因果性、局部决定论)。

F229

虽然都市强化了差异性并在其聚集起来的诸多事物之间形成差异性，但它不能被视为某个差异性的体系。“体系”一词要么意味着完成与闭合且完全可以理解，要么意味着只是某种内聚性。但都市现象是作为运动显现出来的。所以，都市现象不可能终结。它所暗示的集中性和辩证矛盾排除了终结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它拒斥固定性。即使语言表现为某种封闭的体系，

E174

F230 对语言的使用以及话语的生产也会粉碎这种观念。随之而来，我们也无法通过一种(确定的)体系来界定都市。例如，将都市界定为围绕着某些不动点而出现的一系列偏离。事实上，正是这种概念阻止着我们去限制那些简化或压制差异性的事物。毋宁说，这种概念包含着生产差异(相异并创造差异)的自由。

都市正在被加固。作为某种形式，都市改变着它集合起来(集中化)的事物。在并没有意识到差异存在的地方，都市形式有意识地创造出差异来：原有的只是相区别的事物，只是此场域中曾属于特别性的东西。它强化了一切事物，包括决定论、异质的事物与内容、先验的秩序与无序、冲突，以及先在的交流和交流的形式。作为一种改变的形式，都市催毁并重构其要素：譬如讯息与符码这些在工业与农业领域中产生的东西。

都市也包含着某种否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很容易显示出其危害性。自然、欲望和我们所谓的文化(以及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所谓工业时代，而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自然和文化是水乳交融的)，在都市社会中被重新整合和集中在一起。如果这些内容是异质性的，甚至是不规则的，它们需要接受检验。因此，农业开发(农场)与企业(它是伴随着制造业而出现的)都接受了检验，它们被改变了，并在某种城市结构中被赋予新的形式。我们能够想到这样一种二阶的创造(诗性)形式，而农业与工业的生产具有一阶的创造形式。这并不意味着都市现象等同于二阶的话语、元语言、注释或者关于工业生产的评论。都市的二阶创造和第二自然性对于创性活动而言是一种增加，而不是一种简化或反映。这就提出了在已有含义(而不是类似现象的单元，缺乏含义的声音或符号)的要素中生产(创造)意义的活动

F231

E175

问题。由此看来，都市将会创造出情境并像它创造客体那样发挥作用。

从其要素或条件出发去规定都市(它所归整到一起的东西——内容与活动)，并无模式可循。不管是能源领域里的模式(来自于那些能够获取有限的但相当多的能源的设备)，还是信息领域里的模式(只使用少量的能源)，在这里都不合适。换言之，如果我们想寻求一种模式，那么一种对都市的分析研究就可以满足。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遵照某种路径(感觉与方向、定位与视野)而不是某种模式。

这就意味着作为形式和现实的都市毫无和谐可言，因为它也包含着冲突，包括阶级冲突。而且，相对于试图通过对空间中的要素进行分割来解决冲突的隔离，它只能被概念化。这种隔离导致物质和社会生活的解体。为了避免矛盾，以便达到一种和谐，一定的都市规划形式宁愿选择社会关系的解体。都市将自己展示为一个冲突与对抗的场所、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此意义上此概念包含辩证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重大修改过的，因为它现在属于某种心理与社会的形式而不是一种历史的内容)。

F232

因此我们可以把都市界定为矛盾的表现场所，它颠覆了场所之间的分离：在这些场所里，矛盾难以表现，寂静无声，充满了分离的征兆。都市也可以被界定为一个欲望之所，在此，欲望从需要中浮现出来，欲望因为被承认而被集中起来，爱欲与逻各斯能够(可能)被发现是比肩而立的。自然(欲望)与文化(被归类的需要以及被简化的真实性)在相互的自我批评过程中走到了一起，该过程产生了充满激情的对话。在此意义上，人类的不成熟特征和早熟特征形成，并被交付于爱欲与逻各斯的

E176

斗争，虽然这种形态对成熟的成人发展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具有悖论意味的是，都市作为实践中介将会起到一种教育学的作用，不过它与通常的教育学大为不同，后者是基于所获知识的权威性、才华横溢的成年人。

F233
E177

由此来看，工业时代(换言之，所谓的“工业社会”或者类似的说法)看上去与它过去表现出来的模样完全不同。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看，它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在统治自然的过程中，它用生产的自由取代了物质的决定论。事实上，它是极端矛盾与冲突的。毋宁说通过对自然的统治，工业蹂躏自然，完全毁坏了它。工业声称用一致的合理性取代自发的混沌，它孤立并瓦解了任何它所接触到的东西，它通过建立起一个同质化的秩序王国从而摧毁了联系。对于工业而言，手段变成了目的，而目的变成了手段：生产变成了战略，生产主义变成了一种哲学，国家变成了圣物。工业时代的秩序与无序再生产了早期的、充满血腥的混沌；实际上工业及其影响让情况变得更糟。意识形态的拥护者(特别是都市意识形态的拥护者)认为，他们仍能把上层组织的原则置于工业时代及其理性化的基础之上。对于他们而言，问题是克服秩序及无序并创造出一个更高的却源于已确立原则的秩序。把企业的原则一成不变地扩展到作为整体的社会是一个战略，这种战略现在已遭到审判和谴责。因为有别的东西(一个差异性的非一物)我们必须承认，即对一切事物进行质疑，这就是问题本身……

工业理性化导致的分离也发生在众多子系统——价值、决策以及活动与行为模式——之中。这些子系统的多元性能够容纳或创造某种凝聚性吗？整体凝聚力的意义似乎来自于企业的

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可是还需要其他东西，以便使分离的功能——决策、希望以及规划——能同时发挥作用。当社会学家在功能和结构上对这些子系统进行区分时，他们是正确的。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未能展示出秩序及其内在的无序，这些部分及其分离可能包含着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并形成一个整体，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总体。显然，就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而言，美国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拥护者的还原论方法失败了。不过，这种内在的整齐划一性只能从某种逻辑中产生。这种社会—逻辑隐藏于社会学之后或社会学之下。这种社会—逻辑仍然是商品和商品世界的逻辑，虽然它以商品的语言伪装其本身(却并不存在)，但是依然呈现在每个被购买、出售和消费的对象之中。它同样且仍然被认为(或自认为)是无所不知与无所不在的国家或权力不可调和的逻辑——这种逻辑就其本身而言也被掩饰在国家的伦理威望之下。

F234

压制性空间的逻辑重新确立了一致性。这导致社会内在的错乱与焦虑，都市社会及其透明的逻辑正在缓慢地、一步一步地摧毁着这个社会，只要我们能够把这种逻辑表达出来，它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只要我们把其他的社会—逻辑表达出来，它们就会(在理论上自然而然地)消失。

E178

F235

我们现在可以确认并阐明一系列都市法则了。这些法则并不是肯定性的，它们不属于某种“最高律令”，不属于某种需要我们去遵循或模仿的平衡模型或增长模型，也不属于某种能够自动推断出结果的最初断言，抑或是某种能够做出归纳陈述的最终分析。相反，它们首先而且本质上是一些否定性的法则和信条。

1. 我们必须打破那些阻碍道路的路障，并坚守住那些被眩晕的盲目(l'aveuglant-aveugle, 英文 blinding-blinded) (特别是就经济增长的量的方面而言)所奴役的都市领域。

2. 我们必须终结分离(séparations), 终结那些会导致多种形式隔离(ségrégation)的人与物之间的分离, 终结讯息的、信息的、符码的以及子码的分离(简而言之, 即阻碍质的发展的分离形式)。但在现存的秩序中, 分离的力量自视为牢固的; 离散的力量自觉到它的权力; 分化的力量自视为肯定性的。

3. 我们必须克服以下障碍: 那些使透明性与晦暗性之间的不透明性与对抗性关系加剧的障碍, 那些把差别归类为有区别(分离的)的特殊性的障碍, 那些将差异限制在预构空间中的障碍, 那些把生活方式的多价性掩藏于都市社会(日常生活和栖居之中的模式和变调)中的障碍, 那些违反规则的恣意隔离的不法行为。

F236

E179

这些否定性的法则反过来包括一系列肯定性的法则:

1. 都市(都市生活、都市社会生活)已经包含契约性习俗的替代物。契约法规定了交换的框架以及交换的互惠性框架。一旦人们之间开始有相对剩余物的交换(商品世界是准备就绪的), 并且这种交换在逻辑与语言中达到最高级的表现, 这种法律便会在农业社会中产生。不过, 在都市社会, 包括了使用风俗并使风俗凌驾于契约之上。都市事物

的使用(这条边道、这条街道、这条人行横道、这个灯具装置)是习惯性的,而不是契约性的,除非我们愿意假设持久的准契约或伪契约存在,用来分享这些事物并且把暴力性缩减到最低限度。当然这并不表明契约体系不能够被改善或转变。

2. 都市观念也力求对人类的时间、地点、事物的条件进行再**利用**,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这些条件都被剥夺了,人类只有通过购买和出售的方式来重新获得它们。

时间——价值所在以及空间——交换中介可以在一个更高的统一体即都市中被重新统一起来,如此假定合理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清晰地指出每个人已经知道的:此统一体是一个乌托邦,一个非一地方,一个可能的不可能;但它是一个赋予可能性以意义、赋予行动以意义的统一体。作为交换中介的空间和作为价值所在的时间、商品的E237
空间和作为至高商品的时间,不可能被连接起来,它们各走自己的路,这反映了所谓的工业社会的不一致性。创造空间—时间的统一体将是可能的、可确定的,其中之一E180
便都市和都市社会。

3. 就**政治方面**而论,如果没有区域性统一体中的生产与企业自治的存在,这种前景简直无法想象。这是一种困难的引申。“政治地”一词是混乱之源,因为普遍的自治包含着国家的消亡与政治本身的终结。在此意义上,就其本质而论,国家与都市之间的不兼容是根本的。国家只会阻碍都市的形成。国家必须控制都市现象,不是助其实现而是阻其发展,把都市现象推到制度的方向上,并使这种制

度扩展到整个社会之中，通过交换与市场，通过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类型，通过经济增长时期所设计的制度，并且把量的（可量化）目标放在首要地位。但对于都市而言，它只有颠倒国家的秩序，颠倒那种以强制性与同质化的方式展开的空间整体化战略，进而消化吸收都市和栖居的各个次要的层次，都市才能建立起来并且能够为栖居服务。

F238

正如我已经试图表明的那样，都市规划是一种面具与工具，它是一种国家与政治行动的面具、一种利益的工具，即在战略与社会逻辑范围内被掩饰的工具。都市规划并不努力去把空间塑造为某件艺术品。它甚至并不打算像它声称的那样和其技术的帝国主义保持一致。它所创造的空间是政治性的。

第十章

结 论

通贯全书，我已经考察了都市总问题式的方方面面。不过，其中最让人烦忧的问题仍然存在，最直接牵涉的就是那些受规划影响与战略支配的人们超乎寻常的消极被动。为什么这些“用户”这般沉默不语？如果有人愿意去考虑的话，他们含糊不清的话语中为什么包含了某些“渴望”？在这种奇怪的情境背后究竟潜藏着什么？

F239/

E181

本书中，我已经把都市规划本身作为意识形态与制度、表象与意志、压迫与压抑来批判，因为它建立起一个压迫性空间，而此压迫性空间被描述成客观的、科学的与中立的。显然，这种解释虽然是必要的，却并不完备。这仅仅是一系列矛盾中的一个矛盾事实的一部分解释或阐释。最后，我想在我的论证中总结出一些松散(不精细)的结论，并对都市规划补充些许额外的想法。

第一，那些可以而且应该“诗意地栖居”(荷尔德林语)的居住者的被动性，与建筑师和都市规划专家的思考所遭遇的奇怪的僵局，这二者之间难道不正好形成一种对比吗？似乎他们的规划受到了某些奇怪的诅咒的影响，仿佛他们所取得的进步不过是对图形与技术的运用而已。他们的想象力的翅膀被折断了。

F240/

E182

这些规划的作者显然并没有成功地确定以下两个原则的交集：(1)如果没有乌托邦，没有对可能、异乡(ailleurs)的探索，便没有思想；(2)如果对实践不管不顾，便没有思想。(这里的实践是指栖居和使用的实践，但如果居民与使用者仍保持沉默该怎么办呢?)

如果当事人大规模地参与其中，那么这种状况就会发生变化。那些在门前还似乎犹豫不决的建筑师和规划专家，他们的思想和规划能入门吗？也许能。然而，那种参与从未发生过，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迹象看出他们对此产生了新的兴趣，但是不见任何政治运动的踪迹——这种运动就是把这些问题和“建造”的目标政治化。

这种堵塞来自何方？问题切入到了事情的核心之处。就理论层面来说，机制问题相当明显：具体空间已经被抽象空间所取代。具体空间是栖居的空间：举止与道路、身体与记忆、符号与意义、(人类)不成熟—早熟的艰难的成熟、欲望与需要之间充满矛盾与冲突，等等。此具体内容，即时间镌刻于空间之中，一种不明白其自身名状的无意识的诗性，也正是被思想所误解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它蜕变为视觉的、几何学的抽象空间。那些绘图的建筑师与创作街区规划的都市规划者好高骛远，轻视了他们的“对象物”，即建筑和街区。这些设计者与绘图师在一种纸墨空间中活动。只有这种日常近乎完全简约化之后，他们才回到生活经验中来。他们确信自己已经表达了生活经验，即使他们是在二次抽象中完成规划与计划的。他们从生活经验转换到抽象，再把这种抽象投射回生活经验之上。此种双重替代性与否定性创造了一种幻觉意义上的肯定：回到“真

实的”生活。这样，某个场域便进入了一种令人炫目的暂时被遮蔽的状态，它似乎会被阐明而实际上却是一个盲域。

如果没有直接经验的反抗，没有日常生活与实践的反抗，我们如何终止这种替代的**观念—逻辑**？它深藏于技术性论证之中，被专业技能证明为是合理的。那些“充当”技术官僚与专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谓的客观的空间实际上是**观念—逻辑**的空间与压迫的空间。

第二，出现这种状况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几百年来，城市、旧城一直令人着迷。人们形成了目光短浅的政治或乡土观念。他们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会对空间的组织感兴趣，才会建立各种群体来生产出某种空间。一般来说，正是那些“著名人士”才相当自然而然地有兴趣将他们的“利益”纳入那种形态学与社会的框架之中。这种态度远没有在小城市与中等城市里消失。不过，支撑它的最强有力的动机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种(关于社会空间和时间，即关于对时间的使用)进攻性的、生产性的态度已经变成一种防御性的、消极的态度。反对中央权威与国家镇压的战争正在发生。但我们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别处，最重要的决策是在别处做出的。这导致了城市现实中的失望感，因为我们知道，那些有关小城市或中等城市的现实是某种过时的东西，即它正在陷入到某种窘迫之中。但如果不经过一个漫长的迷失方向、无所适从的时期，我们怎么可能实现从城市向**都市社会**的转变呢？要知道城市维持着其形象，可谓有心脏、有头有脸，还有“灵魂”。

F24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经历了一个创造性活动的井喷期，特别让人吃惊的是，俄国社会通过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E184

变化，成功地(从深处)形成了全新的惊世骇俗的上层建筑。这恰恰是几乎每个领域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政治、建筑与都市规划。这些上层建筑远远先进于现存的结构(社会关系)与基础(生产力)。为了弥补它们的滞后，现存的基础与上层建筑本来能够通过革命性的创造性过程，追随并达到那些先进的上层建筑业已达到的水平。在列宁的最后岁月里，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关键问题**。然而在今天，事情难道不是变得一目了然了吗？即那些结构与“基础”并没有迎头赶上。矗立于糟糕地或不恰当地修正过的基础(农民的、落后的)之上的、由革命的天才建起的上层建筑倒塌了。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戏剧吗？建筑的与都市规划的思想不能从单独的思想或理论(都市规划的、社会学的或经济学的)中产生。它只能在被称为革命的这种**总体现象**中出现。在苏联，革命时代的创造物很快地消失了，很快地被消灭和被遗忘。那么为什么用了四十年，为什么我们不得等到今天(一个以速度、加速与眩晕而标榜的时代)，在阿纳托尔·柯普(Anatole Kopp)著作中才承认苏联在建筑学与都市思想以及实践中的成就呢？^① 尽管存在着有利的条件(在1968年的法国也发生了“总体性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苏联发生的现象可以相提并论)，但并不清楚这种知识是否已被同化。我们忍受着革命的遗迹被埋葬在技术的废墟之下这一后果。

F243

E185

目前这种消极与阻碍有其历史原因。面对都市现象的我们，与一个世纪之前那些适应日益增长的工业现象的人们，处境相

① 关于阿纳托尔·柯普，参见本书第五章(F149/E111)页下注。——英译者注

似。那些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看到的仅仅是混乱，即互不相关的事实。这不仅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真实的，而且对于“受过栽培的”个人也是如此，包括经济学家在内。他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孤立的单位、企业，每一个都处于管理者(老板、所有人、企业家)的掌控之下。在他们眼前，社会被原子化了，分离为个体与碎片。甚至市场也似乎成了一连串无关的偶然事件或这些事件的集合。既然总体性不是思想或行动的一部分，既然计划的概念仍有些模糊，那么就不存在反对这种关于社会的原子化和分子化的视角。我们不知道如何把握事实，也不知道如何根据这些事实来行动。这种情况今天同样适用于与都市现象相关以及与都市社会相关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接近它们，我们只能根据空洞的空间与空间的虚无去思考和行动。我们难以达到充分的认识。它逃脱了我们的掌控。或者不如说，在任何思想或行动试图理解它之前，它已被无限地分裂成碎片。思想在一种自我扬弃的充分性与向它挑战的虚无之间漂浮。 F244

需要严肃对待这种消极状态的政治原因。意识被一种强大的压力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定量化已经意识形态地、技术地和政治地变成了准则、规范与价值。我们怎样才能逃避定量呢？在商业中，代表工人阶级的身体也是以薪水和一周的工作时间这种量化的方式表达其需求与渴望的。定性化被废弃了。任何不能量化的都被淘汰。普遍化、量化的恐怖主义强化了压迫空间的效应，这种恐怖主义正在不断加强它的压迫，而且它有它的理由(观念—逻辑)，它的科学性似乎无所畏惧、无懈可击！在这种情势下，因为定量化从未受到严肃的质疑，工人 F245 E186

阶级没有政治行动的眼界，就都市规划而言，它不能带来任何结果。

尽管都市规划不能建构学说体系，尽管在人道主义者与技术专家、私人企业家与政府议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纠纷，但都市规划反映了整个局势，并在运用观念—逻辑与政治压制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它只能通过一种不间断的自我批判过程才能避免。

第三，消极性的理论方面是什么？这些方面与都市现象的碎片化有关。如前所述，这里存在着悖论：都市现象只能被解读为一种总体性，但其总体性却无法被理解。它逃离我们，它总在别处。渐渐地，我试图详尽阐述此悖论的本质，我指的是集中性的辩证法、都市实践，以及都市革命。这三重特征受到了意识形态和“实证主义”的伪科学性的拒斥，它们要为最极端的碎片化状况和最具讽刺意味的区域化情况做出解释。某些看似（在操作层面上）精确的和全面的伪概念，试图为碎片化和区域化作辩护。可以以环境的伪概念为例来说明，它究竟指的是什么？自然？一个周遭环境？这个概念虽然清楚但十分普通。周围的事物？到底是什么事物，它在什么事物的周围？没人知道。城市有它的环境；这环境被叫作农村。个人有他的环境：它是一系列薄膜、皮肤和外壳（亚伯拉罕·默雷^①语），它把人包裹

F246

① 亚伯拉罕·A. 默雷(Abraham A. Moles, 1920—1992)，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法国工程师与社会学家，曾经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主任(1945—1954)，后来在瑞士的赫尔曼·舍尔兴电子音乐实验室担任主任。他在多个国家中讲学，1966年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社会心理学研究所。他出版了许多著作，包括 *Information Theory and Esthetic Perception*, trans. Joel F. Cohe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6)。——英译者注

在里面，从他的衣服到他的居住区。住房群和居住区有它们自身的环境，并反过来充当环境。这是城市的边界？或者作为边界的城市就是我们所说的环境？如果不是，又是为什么呢？只要我们试图成为特别的，我们才会成为一个专家、一名技师。于是，这里就有了一种地理环境、一个场所、风景、生态系统。E187 这里就有了一种历史环境、一种经济的与社会学的环境。符号学家将要对那些环绕在个人与群体周围的象征系统和符号做出描述。心理社会学家描述作为个人的环境群体，等等。最后，我们得到一些局部性描述和分析性陈述。我们或者将其搁置，或者将其一股脑儿地全部装进同一个袋子。这就是我们的环境。事实上，这种形象是从生态学与形态学那里借来的，也就是说是有界限的，描述和这种借用已被粗心大意地延伸，因为它简单，易受影响。它已经被用来作为惯用的和广为人知的（尽管在正式的意义不为人所知）推断和简化的操作方法。

虽然比起环境一词来说基础设施这个概念更为技术化一些，但结果仍是换汤不换药：各种功能被孤立起来，被分别投入到实际之中，这种程序摧毁了整体的现实，导致了碎片化的分析。都市生活据说被定位于丰富多彩和能够满足任何问题的多样化的基础设施之中。事实上，功能性定位忽视了如此大量的要素，而且难以实现其目标，以至于不值得从理论的观点进行批评。F247 与之相似，我们仅仅需要提及数量不断增长的当权者、技术、服务，以及与都市现实相互隔离的要素有关的政府部门。这里科层制以及科层制的碎片化，也仅仅触及它们的内在界限。它们会持续扩散直到它们无法发挥功能为止，也无法摆脱它们自己在机构中设立的各种职能之间的纠缠。如果这不意味着一种

隔离化的实践，意味着在实际中把整体的所有被孤立的元素分离开来，那么这种状况将是滑稽可笑的。

E188 第四，当然，这种现象，即那些受影响的人们的消极性(缺乏参与)也有其社会学的原因，参与的意识形态绝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把我们的利益授权给我们的代表的历史源远流长。政治代表并不总是发挥其作用，有时他们的角色会被取消。那么，我们该将自己的权力与实际的和社会生活的代理人授权给谁呢？给那些专家与那些有技能的人。他们反过来能彼此商议并控制与功能化的“定居”有关的一切。栖居与居住者在其决策中不起任何作用。决策权掌握在制定决策者的手里。活动退回到最初所忍受的日常的、静止的空间和物化中，然后被接受。

F248 那些用户怎么可能感受不到被排斥在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的对话(假定他们之间存在对话)之外的滋味呢？有时会发现他们是同类人，有时会发现他们是相互隔离的，有时会发现他们是有分歧的。他们经常确立一种契约，一种准契约，或者他们之间的一种君子协定。什么才是用户的最好处境呢？就是这两类人之间的冲突不太剧烈。目前用户多久能够享受到一次这种环境的好处呢？实在是少之又少。*

谁是这种用户呢？情况似乎是他们(技术熟练者、代理人、权威人士)考虑到交换的利益而非常排斥使用性，以至于把这种使用(usage)与高利贷(usure)混为一谈了。在此情况下，用户怎么能够被察觉呢？因此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用户？他作为令人厌恶的角色，玷污了那些贩卖给他的最新的商品，他在损毁，他在破坏，他幸运地成为一种功能，也就是把事物引入到必然的更换的过程之中，引入到淘汰的过程之中。这并不能作为他的借口。

译后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名著《都市革命》的中译本，是根据法文原版（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并认真参考该书英译本（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reword by Neil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由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三人合译的。

其中刘怀玉与张笑夷的博士论文是专门研究列斐伏尔的。而郑劲超的博士论文则是专门研究当代法国后现代理论大师利奥塔的，他曾在巴黎第八大学留学一年，法语阅读与翻译水平较高。所以由我们三人合译这本小册子，应该说还是有理由与资格的。其中第一章由郑劲超博士根据法文原版译出，刘怀玉根据英译本重新做了校订；第二章与第五章由张笑夷博士根据英译本译出，刘怀玉参看法文原版及英译本做了认真校订；第三、四、六、七、八、九、十章则首先由刘怀玉根据英译本译出，然后由张笑夷博士根据英译本重新进行了译校；郑劲超博士又根据法文原版对译文重新进行认真校对；全书最后由刘怀

玉作译序，统一译名、译文，并补充了重要的中文译注。本书的翻译工作始于2014年冬天，因为大家都忙于其他工作，再加上列斐伏尔经常如在“云中漫步”的特殊文风，让人摸不着头脑，所以进度较慢，可谓时断时续，步履艰难。

最后，作为译者，其中的甘苦不用道说了，但本译著自始至终都是在本套丛书的两位主编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杨生平总编辑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强乃社副编审的指导、关心与督促下进行的。在此，我们对丛书的两位主要领导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深表感谢。

刘怀玉

书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南大和园陋室

2016年11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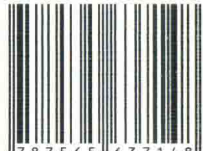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
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上架建议：哲学·学术



ISBN 978-7-5656-3714-8



定价：48.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521237

SS号=14521237